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

袁鹏◎著

中国高端智库学者，畅谈国运，远谋天下

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基辛格

FROM WESTPHALIA TO A NEW WORLD ORDER

U.S., China and Their Strategies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作者:袁鹏

ISBN:978750866684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受天下之善；

平其心，论天下之事；

潜其心，观天下之理；

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前言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不管承不承认，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只是这种变化不是靠世界性战争实现的，而是一种改良式、渐进式、“温水煮青蛙式”的变化，在量变和质变之间甚至看不出明显的界线。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回溯过去，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华盛顿—凡尔赛体系以至“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再到冷战后漫长的过渡式“后后冷战时代”，我们今天正面临第四次历史性变迁，我们正见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构，正所谓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前三次历史性巨变都同世界性战争（热战或冷战）直接相关，因此体系之坍塌或构建都是疾风骤雨、大开大合式的，基本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新一轮秩序之变，则既与一系列局部性战争（如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地区性冲突（如朝核危机、伊核危机、乌克兰危机、东海南海摩擦）相关，也同国际力量格局的自然变动攸关——所谓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非国家行为体呼风唤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等，从不同侧面冲击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而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于世界，它们相互激荡、互为因果、连锁反应、推波助澜，你方唱罢我登场，东边日出西边雨，剪不断理还乱。对执政者来说，面

临的任务千头万绪，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纵然使出百般武艺，最终白了少年头，也未必招人待见。对普通民众来说，面对一天一变的网络资讯和难以适应的气候变化，面对日新月异的国事家事天下事，常常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

而对善于冷眼看世界的战略思想家而言，这个时代给他们思考、写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于是诞生了所谓“单极说”“多极说”“两极说”“无极说”，产生了所谓“后美国时代”“中国崛起时代”“信息技术3.0时代”等。一批高质量、有深度的作品连番问世，即以近两年为例，法国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注]、日裔美国人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英国人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注]、中国台湾学者朱云汉的《高思在云》等，从历史的纵深、政治经济的结合部、人类政治的发展前景等多角度考问我们的时代、探寻未来的秩序。然而，他们提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多，他们的困惑似乎比芸芸众生还更多几分。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年逾90的基辛格博士，他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敏于思考，勤于著述，善于沟通，指点迷津。他的《世界秩序》[注]一书悄然面世，似乎是一个阅尽世间沧桑的老人在告诫世人，我们所处的世界真的已经变了，而我们却都没有做好重塑新秩序的准备。旧的秩序濒临坍塌，新的秩序将建未建，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的事实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各国都忙于自己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而无暇静下心来重整地球村这个共同的家园，则世界表面的经济繁盛和技术进步到头来恐将带来更具毁灭性的后果。

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大历史性时刻，各国都在积极筹备、隆重纪念，红场阅兵、天安门广场阅兵、联合国大会……人们似乎期待以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为分水岭，总结过去、正视现在、面向未来，内心其实都在

呼唤一个更加与时俱进同时富有活力的新世界秩序的到来。然而，谁将是世界新秩序的引领者或缔造者？

二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同时也是既有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美国自然希望继续主导这个世界。奥巴马无论怎么“谦逊”，在继续领导世界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来都不含糊。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继续领导世界，而在于如何领导”，“美国决不当老二！”“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不管如何包装，内核都是“实力”，美国追求的永远是实力至上，目标则是继续领导世界100年。

问题是，世界已不是过去那个世界，美国也不是昨天那个美国。就军事实力而论，美国仍占据绝对优势，相较逐渐老化的俄罗斯军力，美国的军事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冷战时期更胜一筹。其他如科技力、网络力、战略力、文化力、情报力、同盟力、智慧力、地缘力等，仍令其他大国难望其项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从经济实力角度看，美国的绝对领先优势至少面临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挑战。就单个国家而言，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10万亿美元，达到10.2万亿美元，离美国17.4万亿美元虽差距仍大，但全世界超10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毕竟不再只有美国一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平价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而更多的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国经济超美只是时间问题。从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看，则美国面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内部问题，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愈演愈烈，以致曾经高呼“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写下《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公开表达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失望和无奈。制度优势和社会活力一直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软实力，也是其对外实行霸权的国内基础，如今看来，面对2016

年总统大选出现的“特朗普现象”“桑德斯现象”，不得不承认这个基础正在出现大麻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屡遭批评或掣肘，绝非偶然，而他在应对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利比亚危机、伊拉克危机、“伊斯兰国”等问题上的作为不力，实在是因为他不想管、不敢管也管不了。毕竟，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推上台的奥巴马，当务之急是经济、经济、经济！结果，美国的经济终于走出危机，再次步入复苏增长轨道，但蓦然间美国人也发现，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却在无情地下滑。在这种实力与影响力并不同步的情况下，靠美国单极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显然不切实际，尽管少数美国人仍在做着“美利坚帝国”的迷梦，但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实力的限度是心知肚明的。

欧盟能否构成世界的另外一极姑且不论，但其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现代化水平程度最高、全球治理水平和能力最强的力量组合，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或重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首访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传递出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那就是中国认同欧盟作为世界政治一极、经济一极、文明一极的独特分量，也希望通过深化中欧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然而，自冷战结束后，“欧盟往何处去”就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领导人。美国人所形容的“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状况虽有所改观，在叙利亚、利比亚冲突中欧洲人甚至冲锋陷阵跑在美国人前面，但总体而言，欧盟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还面临不少困难。高福利制度和外来移民增多带来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下的经济复兴问题、乌克兰危机背后折射出的战略安全困境，等等，显示“后现代”的欧洲也免不了“战争与和平”“发展与复兴”等现代国家习以为常的那些事儿。而近两年来欧洲主要大国恐怖袭击不断，更让欧洲一夜之间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和全球难民的集散地。总之，欧盟作为国际政治事务中的整体性力量，如何整合实力、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是个大问题。否则，欧盟主要大国只能各怀心事，劲有时并不往一处使。德国最具实力，但默克尔很有分寸感，不愿挑

头；法国有意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但作用有限；老牌帝国英国则如美国著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言，“正在放弃全球大国身份”，一场谁也不在意的“脱欧”公投竟然出人意料地弄假成真，让人对大英帝国是否从此变成“小”不列颠开始认真思考。欧洲大国如此，中小国家能做何指望呢?

另一个堪称一极的大国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最具争议。中国人和美国人、欧洲人在如何看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中国人大多看到的，是俄罗斯广袤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强大的军力、厚重的文化，以及充满魄力和魅力的普京，因此往往对俄罗斯高看一眼，一直将它视为另一个世界级大国而倍加重视。这背后，恐怕多少同中国与沙俄之间的历史积怨、与苏联之间的历史恩怨等记忆有关。毕竟，我们曾是受害者、受伤者或弱者，因此容易放大对俄罗斯实力的认识。美国人看待俄罗斯，则完全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问起华盛顿的战略界人士，十之八九会说“俄罗斯不会有什么用了”。一些学者甚至觉得，冷战后的美国历任总统总在试图从羞辱俄罗斯的过程中享受某种快感。美国朝野弥漫的这种“俄罗斯不行论”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镜中的俄罗斯从来就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平庸者。在成功化解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曾经心有余悸地告诫后任美国领导人：“核大国在捍卫自身利益时，应避免出现让对手必须在耻辱的退让与核战争间做选择的情形。”不管怎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面临巨大难关，俄罗斯毕竟是世界政治中谁也不能小觑的战略性力量。更何况，俄罗斯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能源、国土规模等天然优势。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缔造者之一，俄罗斯对当今及未来世界秩序有一套全面的看法和阐述，需要人们仔细聆听和认真解读。

在世界大国俱乐部里，不应忘记的还有印度、日本和巴西。三国虽各具特色，但在期待成为被人尊重的世界级大国方面则同气相求，联手“争常”即是重要标志。但毕竟，印度崛起的光芒不如中国闪亮，

目前合纵连横多意在经济发展，对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缺乏必需的意愿和能力。日本安倍政权虽无日不在“俯瞰地球仪”，但志大才疏、心胸狭隘、缺乏担当，在美国的羽翼下尚难称得上是一支完全独立的战略性力量。巴西虽不甘偏安南美，但与世界政治的中心地带相距遥远，且自身面临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世界杯、奥运会的光环掩盖不了巴西深层的矛盾，巴西的再度崛起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其他如南非、土耳其、伊朗、沙特、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韩国、阿根廷等中等强国，对世界秩序的构建越来越有想法和发言权。它们有望成为新秩序构建的生力军，但指望其成为推动构建新秩序的主力军，似乎勉为其难。

三

相较欧、俄、印、日、巴等诸强，中国的优势是明显的。不仅经济发展态势最好，而且政治社会总体稳定，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坚持正确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盛一日。正因如此，中国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视为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下一个超级大国。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它标志着中国人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这是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之后又一标志性事件。除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美国重要盟国都积极参与其中，这似乎印证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新现实，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在复苏，但国际影响力却在下降；中国的经济在减速，但国际影响力则在上升。综合评估，实力对比中升美降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然而，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集中体现为所谓“老二综合征”。尽管中国只是在经济总量上位列第二，但国际社会倾向于认为中国在综

合国力方面也是“老二”，于是中国终于“被老二”了。问题是，这个“老二”与“老三”“老四”“老五”的差距没有实质性拉开，却与“老大”的差距依然巨大；既要面临来自“老大”的挤压，也要适应来自“老三”之后诸强的羡慕嫉妒恨；既要继续跨越新兴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要努力超越与既成大国美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防范在中亚、西亚、北非一度上演的“颜色革命陷阱”，更需处理一系列国内、周边问题交织混杂的“成长中的烦恼”。习近平主席讲，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恰如黎明前的黑暗，越接近光明，面临的问题、困难、风险、挑战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而不会成为颠覆者。

但在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看来，“亚投行”“一带一路”东海南海强势维权……凡此显示，中国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改造既有国际和地区秩序，在表面维护既有体系的同时打自己的小算盘，搞自己的小体系。同样，在中国部分学者眼里，美国无节制无原则地偏袒日本和菲律宾，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滥用“量化宽松”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也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颠覆自己一手打造的战后国际秩序。于是乎，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秩序之争越来越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核心问题。这恐怕是中美关系过去三四十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不只如此，世界各主要力量也都在思考如何修复、改革世界秩序。

四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世界秩序？

对于各国的决策者、执政者而言，所谓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等，无外乎就是如何把握世界大势的另类表述，而不太在意严格区分这些概念之间的微言大义，更多是不求甚解、大

而化之。对于学者或研究者而言，上述概念的区分则是有意义的，为此他们往往不遗余力，甚至皓首穷经。中国知名学者阎学通教授近期对这些概念的研究非常有见解，给出了清晰的界定和解释，值得学习、借鉴。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倾向于基辛格的态度，既有一定学理阐述，又不过多纠缠于概念本身。在他看来，世界秩序其实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构想、一种愿景，与既有的国际秩序不尽一致。理由很简单，因为真正的世界秩序到今天并没有存在过。今天绝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往往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主要原因在于它确立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准则，比如，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这些准则虽然此前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并没有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那样被明确地规范，进而具有超越区域而成为所谓的普适性的准则。但从历史的大视野去看，一方面，这个体系所规范的相关国际关系原则是不全面的，更多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和经验之下的。另一方面，它规范的更多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准则，而对非国家行为体则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组成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各国1648年构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世界还存在几个并行的体系，比如中国的朝贡体系、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体系，而此时的非洲、美洲、大洋洲板块，则远离这些体系，尚未全面觉醒。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的只是欧洲部分板块，对世界并没有广泛的约束力。

从中国的视角看问题，中国传统体系出现裂痕，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其中1592年的中日壬辰战争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公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日本而言，这是其发动海外侵略战争的起点；对中国而言，则是自唐朝以来一直学习中国的好学生——日本——开始动手打老师了。[注]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将日本的这种战略意图当作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略转折，而依然沉醉在天朝王国的幻象中；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人

依然处在半梦半醒之间；再及至日本人在1894年重演壬辰战争的那一幕，通过甲午战争将天朝大国的尊严打得体无完肤，中国才“猛回头”，完全惊醒。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裹挟进所谓现代文明体系，再被当年自己的学生羞辱得颜面扫地，华夏体系已无法维系。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百年屈辱，由此开端。此后，中华民族开始了漫长的救国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建设进程，并最终走上通过改革开放迈向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

中国人的秩序观、体系观与西方人相比，自成一格，是不争的事实。中西方之间在所谓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和隔阂由此变得更加深刻，也是源于两种不同秩序在不同轨道上的自我演进。而等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尤其是跟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在“一战”和“二战”战场上并肩作战，两种体系才有了正式的正面互动。然而，这种互动对西方而言是主动的，对中国而言则是被动的。虽然中国也以战胜国身份参与了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的共建，但仅分得西方列强的残羹冷炙，遭受的却是更大的屈辱。“二战”后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中国终于能与美、英、苏等列强共建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这是建立在西方对中国未来政治方向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之上的。而一旦中国的国内政治方向出现另一种面貌，西方的脸色即为之一变。新中国仍然被西方视为旧世界，被孤立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体系之外。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曾经一度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再次带来期望，认为中国从此走上融入西方体系的不归路。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的命运始终还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几十年之后，中国既没有“西化”，也没有“分化”，中国虽不再是那个封闭的中国，但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苏联，虽在崛起，却坚定地奉行和平崛起；虽坚持独立自主，却不全面挑战既有国际秩序；虽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却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比西

方更坚决。对于这样一个中国，美国人和西方人既爱又怕，想全面接纳却心有不甘，想全面遏制又难以做到，想放任自流却风险太大。怎么办？奥巴马在思考，希拉里在思考，美国战略思想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但迄今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不论怎样，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将世界各国历史性地拉近，使得全球第一次可以开始思考共建一个所谓既建立在国与国平等基础之上，又必须思考非国家行为体，既要应对所谓“高政治”的政治、经济、安全问题，又必须面对所谓“低政治”等非传统全球性新问题的世界新秩序。

五

如何构建新秩序？既然没有一家能主导新秩序的构建，就只好依赖国际社会的再度合作。但现实情况是，除少数战略思想家在思考这个问题外，各国政要多忙于政务，疲于应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个过于形而上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中美在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是合作者还是竞争者抑或对抗者，将直接攸关新秩序的成败。为此，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伯格斯滕、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在内的国际战略家们纷纷建言献策，从不同侧面勾画中美合作的蓝图。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政客以旧的思维预测甚至鼓噪中美冲突的未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提出“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理念、新思想、新倡议，体现了在世界秩序重构进程中中国人不同以往的包容、大气、主动、自信。但一个巴掌拍不响，探戈需要两个人跳，全球共同的事业需要世界各国共建。

在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一名从事国际战略研究和美国问题政策研究的中国学者，作者不揣简陋，将自己在近十年来对世界秩序、国际

体系、美国实力、中国战略、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并呈现出来，发出中国的声音，权当沧海一粟，希望能为中美与其他各国共建世界新秩序这项新的伟大事业贡献些微智慧。

---

1. 《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已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中文版已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3. 《世界秩序》中文版已于2015年8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4. 杨海英：《历史意识与现实交响》，载《光明日报》2015年6月3日。

第一部分 四百年未有之变局

第一章 新时空：第四次历史变迁

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之后，世界正在经历近四百年来第四次历史巨变，国际政治经济正步入新的时空。这场巨变起自何时？经历如何？主要特征又是什么？

冷战终结之后

一般而言，如果延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这样一种时间脉络，那么新一轮体系的变迁似乎应该以冷战的终结为标志。冷战何时终结？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和东欧剧变是标志性的事件，但冷战真正的终结是以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对于苏联解体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国迄今研究得并不彻底。一个偌大的苏联帝国，倏忽间坍塌，不仅苏联自身措手不及，中国也百思不得其解。而在当年，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历史性悲剧在中国上演，尽管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政治话题，但实际上多停留在高层官员和部分学者的小圈子内，没有在全中国范围内甚至没有在全体中共党员内展开全国性、历史性、全面性的深刻反思和研究。而到今天，随着时空领域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对这场事件的认识必然会打上新的时代烙印，从而离真相越来越远。随着包括叶利钦在内的许多亲历者先后离去，对苏联解体之谜的破解恐怕只能留给历史学家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随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自信满满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迫不及待地要打造“世界新秩序”。但冷战的结束似乎并不自动意味着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遗迹依然残存，甚至借尸还魂，逆势生长。

欧洲的北约东扩、亚洲的美日同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升级换代，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化。苏联虽然解体，但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并没有泯灭帝国梦，美国、欧洲对俄罗斯还是一千个不放心。美苏冷战虽然终结，但美俄之间的战略较量、战略博弈依然深刻难解。欧洲的冷战虽然告一段落，但亚洲的冷战没有结束，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这些因冷战而人为割裂的现实没有改变。

更重要的是，一度令西方欢欣鼓舞的“自由资本主义+西式民主”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广大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而没有成为“普世价值”，“历史并未终结”。意识形态的冲突、较量或明或暗，依然像幽灵一样在这个世界徘徊；结盟政治、集团政治等冷战式行为仍然很有市场；军备竞赛变相轮番上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之势甚至比冷战时期犹有过之。因此人们总说，这个时代依然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冷战思维”。国际战略家们于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个词——“后冷战”——来界说冷战后的时代，无非是想表明，冷战和后冷战之间绝不会因为苏东阵营的解体而一夜之间冰火两重天。

此后，虽然围绕如何给新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从未中绝，但“后冷战”的提法并未遭遇大的挑战。不过，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10年后的现实。

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其中关于“和平与

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

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注]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语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秩序观、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的基调。

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则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治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

政治、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正当其时，2001年“9·11”事件突发。“9·11”事件使得人们更加严肃地思考，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美国突然放下身段，降低美中、美俄战略博弈的调门，高举国际反恐联盟大旗，试图营造一个全球合作反恐的新局面。而各大国也积极回应，放下私怨，集中精力合作反恐。一时间，反恐怖、反扩散、反贫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美关系迎来了新机遇，俄美关系似乎也柳暗花明。“全球反恐时代”“大国合作时代”“后‘9·11’时代”等各种解读不一而足。

“后后冷战时代”的来临

在这种背景下，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小布什新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后后冷战时代”。根据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政治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其“新”处有三。

其一，“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

体后一直动荡不安，现在这种过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

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传统威胁”（潜在大国的挑战）与“非传统威胁”孰轻孰重的辩论因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而暂时告一段落，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很明确地摆在了威胁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关系经过冷战后10年的相互磨合，在“9·11”事件后基本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稳定化。尽管这一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但那时的两国关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为特征。而此时，俄罗斯正式成为西方八国集团的成员，与北约的关系实现了由“19+1”到“20”的转变，美俄在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也展开合作，表明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似乎超越了先前的不确定性。显然，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将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其二，美国的安全观和战略观发生了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重大变化。尽管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9·11”事件无法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但多数人认为“9·11”是“美国改变的一天”。赖斯（她一位同窗好友死于这次袭击）称：“‘9·11’后，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天真无知业已终结。”[注]拉姆斯菲尔德（“9·11”当天他正在五角大楼，亲身体验了恐怖袭击的冲击）说：“我们国家已经习惯了的安全环境已随之消失。”[注]

自1812年来，本土安全首次成为美国的中心安全问题。相应地，小布什政府宣布组建专注本土安全的第十大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第十四大部级单位——国土安全部。对于讲求“小政府”的共和党而言，这些举措无疑是革命性的。在这种安全观的影响下，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政府的职能、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关系美国民生乃至立国之本的问题也被一一检验。美国的战略观也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军事、国防、安全战略由“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注]，由准备“敌人来了怎么办”到设想“我是敌人该准备什么”[注]，由倡导“预防性防务”到强调“先发制人”；[注]核战略则以“单方面确保摧毁”取代“相互确保摧毁”；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也最终结束辩论开始上马。“布什主

义”、“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反恐划线”等一系列新的军事外交术语不断涌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人的战略观确实在变。一句话，“9·11”后的美国危机意识上升，更加信奉军事实力和强权即公理。（赖斯说：“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至关重要。”[注]）正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使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战略观完全改变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形成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外交传统，是在追求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战略观”。[注]

其三，世界进入一个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新时代。布什称：“今天，大国由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越来越团结……我们必须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注]赖斯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世界不再被大国间竞争所困扰’的时代的转折点。”[注]鲍威尔也一再强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注]这些言论反映了美国政治人物对“9·11”后大国关系的新视点，经布什外交团队反复商讨由哈斯提出来的所谓“融合战略”（doctrine of integration），即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以反恐联盟为平台构筑新的大国关系格局，以“融”和“拉”的一手将主要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世界共同体”。[注]

为此，世界被分成“善”与“恶”、“秩序”和“混乱”两大阵营；恐怖主义及其庇护国、“邪恶轴心”国被划归坚决打压的“恶”或“混乱”阵营，其他国家则均属“善”类，被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在确立了此种二元对立的阵营之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中心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笼络与“恶”势力对立的国家，然后以是否反恐、是否接纳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将其进行再划分，以超强实力为依托、以主动出击为手段，对其分门别类进行整合，从而塑造反恐时代下新的国际关系秩序，超越老布什“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完成美国霸权战略的最终布局。世界各主要国家客观上站在反恐阵营一边，美俄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布什政府整合大国关系的意愿。

然而，“后后冷战时代”这一概念毕竟仍保留了“冷战”二字。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后冷战”前一再加上一个“后”字，而不以一个超越“冷战”的新名词取而代之，从布什等人的思维出发，一方面表明，这个世界的许多冷战遗迹并没有因“9·11”和美俄关系调整而消失殆尽。以美国为首的大国继续扩充军力，印巴连续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诸多区域性冲突不断出现和升级，等等，表明冷战遗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性问题仍很严重。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布什班子不同于克林顿政府的政治理念和思维特点。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那里，即使在“9·11”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也更愿意用“全球化时代”概括依然带有某种冷战色彩的新时代，显示出超越冷战的意愿；而布什政府的“后后冷战时代”观虽力图跳出“冷战”框架，却宁愿在“冷战”二字前再加一个前缀，结果仍然在“冷战”框架内兜圈子。

布什与克林顿时代观的差异，恰是两届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认知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布什等人看来，克林顿高唱全球化大调，积极奉行与前敌手、未来对手全面接触的方针，是以牺牲美国安全利益换取天下太平，牺牲美国经济利益换取全球繁荣。结果，潜在对手在逐渐壮大，“无赖国家”在继续作乱，同盟国家则渐行渐远，致使“后冷战时代”为美国提供的所谓“战略机遇期”被白白地浪费。

“9·11”事件对美国造成了深度冲击，世界各国虽一样受到震撼，却未必像美国人那样感同身受。但是，时代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即使没有“9·11”，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9·11”则显然加速了这一变化。道理很简单，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变了，世界局势当然也就跟着变；世界局势变了，“后冷战时代”的终结自然就有一定道理。这是“后后冷战时代”观被国际社会部分认同的一个根本前提。

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同时从“后后冷战时代”观中窥出了美国人的两面性。因为“9·11”后短暂的大国合作幻象很快就被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击毁。人们从这场以反恐为名打响的战争中看到的，是小布什公报私仇，以及美国携大国合作的有利态势，实现其清除异己、控制能源、主导中东的战略企图。更有甚者，小布什将反恐的清单越拉越长，从恐怖分子到恐怖主义到极端伊斯兰主义，再到所谓邪恶轴心、暴政前哨、恐怖主义庇护国……于是乎，反恐战争已经被异化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手段。及至美国新保派们抛出所谓“单极时刻”和“美利坚新帝国”等口号、理论、理念，一度合作反恐的大国和谐局面再度被撕裂，甚至出现法、德、俄联手反对小布什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9·11”事件并不具有划分新旧时代的分水岭意义。

2008年登场

世界进入了2008年。这一年，世界发生了三个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如果说此前10年人们还纠结在“后冷战”“后后冷战”时代的话，那么2008年这三个历史性事件足以真正向冷战时代告别。

头两件事几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发生。这一天，对中国人来说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富丽堂皇的超级场馆建设，壮丽恢宏的奥运会开幕式表演，高效文明的赛会接待和管理，以及“北京欢迎你”背后所展示的中国人的自信与大气，使得2008年8月8日似乎是在告别1840年以来中国的百年屈辱，似乎是向全世界高调宣布中国重新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北京奥运会及随后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及上海世博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崛起的成人礼。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新作《大国雄心》注，成为这一时期的畅销书。人们开始以“中国崛起时代”来描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几乎在中国举国欢庆北京奥运开幕的同时，俄罗斯的坦克开入了格鲁吉亚。“俄格冲突”以另外一种方式宣告另一个国际社会的主角——俄罗斯——也强势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俄罗斯的强势，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敢怒、敢言、不敢战。更令全球大惑不解的是，一心打造美利坚帝国的小布什总统似乎不为所动，携一家五口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之后，流连忘返于沙滩女排活动和山地自行车运动，三天后才返回美国处理危机。俄罗斯强势拿下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似乎标志着被冷战击溃的苏联如今以俄罗斯的面目恢复了元气，准备重整旧河山。

就在中俄以一软一硬两种方式强势占据国际新闻的头条以及高调回归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突然在美国华尔街上演。至今经济学家们仍然在探究“次贷”何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连锁反应和冲击效应。但不论怎样，这场危机是真实的。一时间，“两场战争、一场危机”成为对美国处境最流行的描述，“美国衰落论”开始甚嚣尘上。由此，冷战后曾经辉煌的“单极时刻”成为昙花一现，宣告破灭。

具有历史意味和戏剧色彩的是，这一年的美国大选，一个“60后”的美国黑人“青年”，居然能够在强手如林的竞选对手中脱颖而出，入主白宫，成为名副其实的“黑马”。奥巴马上台以后，寻求“多伙伴”世界，奉行“巧实力”战略，厉行“微笑外交”和“伸手外交”，一心结束两场战争，开始全球战略收缩，呼唤出口倍增和制造业回归，总之，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前任小布什的全新理念。这也似乎表明，一个强势、单极的美国开始让位于一个柔性、内敛、韬晦的美国，美国从单极霸权变成了同侪之首（first among equals）。

2008年在中、美、俄三大国发生的戏剧性、历史性事件，终于使这个世界跟“后冷战时代”及“后后冷战时代”挥手从兹去。但是，新时代毕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量变到质变究竟会有多长，

到何时算个临界点，众说纷纭。新时代的来临同时并不必然等同于新秩序的构建，新秩序相对于新时代往往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效应。比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真正成形甚至要到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2014年因为是“一战”百年和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曾经给人们诸多联想；2015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则更像是对旧有秩序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和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无形期待。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书，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运而生，似乎也想说明，现在终于到了面向新时代、思考新秩序的时候了。

新时代特征

尽管新的时代刚露出曙光，新的秩序还尚待建立，但一些重大的带有标志性意义的新特征已经展露无遗。

其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跟过去四百年大国兴衰单打独斗的模式不同，今天是群雄并起的时代。不只是中国在崛起，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都在同步崛起或复苏。所谓“金砖国家”“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等，大约有十四五个新兴大国和新兴中等强国在同步崛起，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等。一度沉寂的非洲板块、拉美板块也呈现出少有的热闹景象。美国著名政论家扎卡利亚以“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来形容这种现象，虽然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但却道出了这个新时代最鲜明的特征。

其二，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尽管用“西方的衰落”既言之过早，又言过其实，但整个西方世界最近几年呈现出整体低迷的状态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遭遇地震、海啸、核辐射三重打击，安倍虽射出“三支箭”想尽快复兴日本经济，但谈何容易！欧洲在欧盟团结这个政治问题、债务危机这个经济问题与防务能力这个安全问题上同时面临难

题，处于冷战后最深刻的变革阶段。英国“脱欧”之发生，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即使看美国，处境也不如以前。美国在金融危机和两场战争的拖累下，挣扎了大约五六年，元气大伤。奥巴马将脱困疗伤和重整经济作为工作重点，几年下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美国经济再度复兴，三大股指一路高扬，页岩气革命、新能源革命方兴未艾，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美国依然独领风骚。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看美国，看到的则是政治极化下的两党恶斗以及美国政治功能的某种紊乱。而从福克森小镇到巴尔的摩街头，从警察杀黑人到黑人杀警察，从“占领华尔街”到力挺特朗普，这些都表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贫富差距、族裔矛盾、代际隔阂、区域分化乃至性别异化使美国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时候。已故知名学者亨廷顿出于对以WASP（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为核心的美国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是否还能延续的深度忧虑，发出“谁是美国人”的叹息。如何解决这个从未有过的深层次的社会性问题，目前尚看不出有好的答案。

其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恐怖分子引发的“9·11”事件、基辅独立广场上的“百人团”、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巴勒斯坦“哈马斯”、中东“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乌干达“圣灵解放军”、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频频制造国际热点，执政当局应对乏术，国际斡旋苍白无力。华尔街金融寡头酿成的“9·15”金融海啸，全球公民社会在西亚北非变局、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展示的独特作用，推特（Twitter）、脸谱网（Facebook）等网络媒体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左右逢源，默多克、乔布斯、索罗斯等“商界巨鳄”对全球政治经济的控制力或干预力，均表明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具影响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盛行，由此，国际安全法律保障严重缺失，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备受冲击。马航MH370离奇失踪，MH17莫名遭袭，乌克兰总统被街头政治赶下台，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日本毫无顾忌地解禁集体自卫权，美国凭一己之念决定“量宽”的进与退，等

等，无国际组织和机制出面负责，无权威机构主持正义，以致问责、善后旷日持久甚至不了了之，使人的安全得不到应有保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领土完整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全面侵蚀。非国家行为体如此深刻地影响地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是这个时代有别于以往的最鲜明特征之一，也是人们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秩序而从更宏大的世界秩序思考问题的重要原因。

其四，世界三大地缘战略板块同时异动，产生共振。美国推行“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重心东移，使得太平洋上不太平。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全新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作为也牵动各方敏感神经。日本不满战后70年的陈规，安倍以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为指导，突破集体自卫权等禁锢，试图逆势而动，改变战后秩序和地区格局。印度的东进、俄罗斯的南下和澳大利亚的北上使得原本浩瀚平静的亚太板块显得躁动和拥挤。越南、菲律宾等中小国家在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美俄因素的内外夹击下不甘寂寞。缅甸、尼泊尔、柬埔寨等国也都面临新一轮的政治社会生态的变革。不安定的朝鲜往往“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始终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亚太大国小国、域内域外、陆地海洋同时热络，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几十年少有的景象。一个曾经和平、繁荣，远离战火，以经济一体化如火如荼为特征的亚太，开始为形形色色的军事冲突、外交博弈和安全困境所累，这是世界秩序大变动在亚太区域的一种反应。

乌克兰危机则打破了过去20年“西线无战事”的现实。“后现代”的欧洲蓦然发现，他们也存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危机背后凸显的俄乌冲突实际上是冷战的遗迹在新时期的死灰复燃。美俄矛盾、欧俄矛盾在俄格冲突之后再度激化，所不同者，是美欧之间更加貌合神离。俄罗斯更加自信，参与的角色更加复杂，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危机绝不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而可能伴随着新一轮世界秩序重组的始终。

相较于亚太和东欧板块，中东板块则有碎片化之虞。被美国以“反恐”名义打乱的中东，终于开始饱尝美国仓促撤军后留下的恶果。一个比“基地”组织更强大也更有抱负的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搅得周天寒彻”，将19世纪初英国人划定的伊拉克、叙利亚国境线打得支离破碎，使伊叙面临“国将不国”的危局。巴以和谈彻底失败，宣告中东和平更加遥遥无期。也门、利比亚陷入内战，相对稳定宁静的海湾国家则遭受国际油价惨跌，前景难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街头政治赶下台的前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最终被宣判无罪，埃及依然是军政权的天下。“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

在三大地缘战略板块同热之际，曾经相对超脱于国际政治视野的非洲、拉美板块也在发生巨变。尤其是拉美，经过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华盛顿共识”的破灭，目前也开始全面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巴西的领头羊地位逐渐确立。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给巴西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毫无疑问，巴西的国际地位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提升。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也都在艰难摸索。即使是古巴也在进行模式更新，一边在摸索内部改革，一边在寻求古美关系正常化。拉共体、南共市、太平洋联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呈现出一派活跃的局面。拉美总体经济形势受美国影响而起伏不定，但拉美积极拓展同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域外大国的全面关系，使得拉美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

其五，全球性问题空前得到全球性关注。诸如气候变化，由欧洲人、日本人和太平洋岛国的关注发展为全球性的共识是近几年的事，以至于各国都确定了不同版本的减排计划、新能源政策、气候变化政策。哥本哈根峰会、利马峰会、巴黎峰会成了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聚会的场所。这种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流行性疾病的防控也成了全球治理的新话题。从SARS（“非典”）到埃博拉再到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致命性疾病的防控、救助以及国际合作成了各国合作的新亮点。国际反恐从“9·11”以后由美国人主导变成了各国共同的问题，反

恐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各国合作的最重大领域之一。国不分东西、地不分南北，都将恐怖主义视为人类的公害，制定战略，进行立法，展开合作。其他诸如能源、粮食短缺、水资源的保护、人口老龄化等等问题，这些所谓的低政治已经登堂入室成为高政治，使得传统与非传统领域已经没有明显的界线。而所谓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问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牵动各国战略走向，影响大国关系乃至发展战略的中心话题。

其六，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等“五化”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相互激荡，将世界各国、各色人等裹挟在一起，尤其是信息化的大潮，一面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使地球村终成现实，一面又可能进一步拉大“数字鸿沟”，造成人类精神世界新的困惑。而由此引发的网络安全新难题更可能改写国际关系的旧版图。凡此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前人没留下现成的答案，需要新世代自己去摸索。

上述时代新特征将意味着，“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再是一种对读书人的期许，而将成为这个时代有思想有抱负的人们的一种必需。

否极泰来还是走向深渊?

2014年是“一战”100周年和甲午战争120周年，联系到乌克兰危机和中日较量，有关“一战重演论”“甲午再战论”一度甚嚣尘上，占据国际国内舆论场。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些舆论与其说是某种情绪的宣泄，不如说是对现况的忧虑。毕竟，2014年的国际形势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混乱、混沌，国际秩序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无序、失序。

2015年恰逢“二战”结束70周年及联合国成立70周年，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年。战后70周年既可能成为各国静下心来重理国际乱象、重塑国际秩序的契机，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撕裂国际社会、加深国际分化的导火索。因此，一个岌岌可危的国际秩序究竟是因此而否极泰来还是继续走向深渊，是观察未来国际形势的起点。

然而2015年开年传来的却似乎都不是好消息。法国《查理周刊》惨剧预示着欧洲反恐形势恶化，欧洲领导人携手并肩走上街头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壮之气。只有他们内心最清楚，在全球化、信息化大潮裹挟之下，自诩为“后现代”的欧洲绝非世外桃源，也存在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自然包括乌克兰局势。2014年乌克兰局势几乎牵动国际战略全局，2015年情势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还有恶化的迹象。乌克兰政府与反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俄西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一个也没解决。下一步乌克兰局势的演变，除了乌本身国内政治的演变外，将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美欧对俄制裁是否继续加码，抑或还有制裁之外的其他手段跟进。二是美欧之间是否依然团结。从最近的表现看，欧美之间在对形势的判断或对俄态度上已然出现分歧。三是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遭遇美欧制裁和油价惨跌的俄经济能否撑得住，是影响乌克兰局势的一大变量。

2015年的中东局势是以沙特老国王去世及沙特政局变化开始的。迄今为止，中东之乱主要乱在伊拉克、叙利亚、巴以和伊朗，“海合会”国家虽也受到冲击，但相对还算稳定。沙特作为中东第一大国、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之一以及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其政局变动自然牵一发动全身。联系到此前有关全球油价惨跌背后有沙特与美国博弈的“阴谋论”传言，沙特未来的政治走向及政策动向值得关注。极端“伊斯兰国”斩日本人质、烧约旦飞行员，激起公愤。约旦报复性轰炸，美国组织空袭，到底是会将“伊斯兰国”打垮，还是会招致更猛烈的反弹，尚未可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今日中东之乱，与当年小布什不负责任地扩大反恐战线、对伊拉克开战有关，也同奥巴马不负责任地

仓促从伊拉克抽身有关。换言之，对美国而言，无非是个战略失误与战略调整问题，而对一个被打乱的中东而言，则是无尽的灾难。伊拉克、叙利亚被内战和“伊斯兰国”搅得国将不国，巴以和谈遥遥无期，伊朗核问题仍处搁置争议阶段，能否如愿和平解决，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如此看来，中东局势依然堪忧。

回眸亚太，危险性、动荡性虽弱于乌克兰和中东，但博弈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却非其他区域可比。其中中美之间的竞合博弈最为关键。中美元首“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私叙”这几年几乎一年一次的深度会晤和沟通，表达了共同稳定中美关系的强大政治意愿和决心。但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能否在外交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能否在两国民众间获得积极呼应，还需要做艰巨的工作。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博弈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将加剧和深化。美国横下心来决定在亚太永驻，中国崛起首先也是从亚太出发，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化解虽无历史经验可循，却有历史教训可鉴。囿于自身实力与战略之间的局限性，美国在亚太更多依靠盟国、伙伴及其努力拼凑的关系网来对中国进行所谓“软制衡”，无形中加大了中国同亚太相关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得中美与所谓“第三方”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十足的战略定力才可化险为夷。东海、南海冲突的引信一个也未根除，未来几年无非是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继续演变，要想毕其功于一役也不现实。曾经沉寂的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则开始出现重大变局，有可能成为亚太局势最大的变数。

没有人希望国际一片乱象，各国都着眼拼经济、强民生。但显然，各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杠杆是不一样的。美国携美元霸权的独特优势，借量化宽松的进与退，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间肆意游走，加之页岩油气革命天赐良机，2014年经济发展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令美国战略界欢欣鼓舞，也使美国领导世界的底气再度大增。但冷静分析，美国全年2.4%的增速并非如此前许多人预测的那般惊人，甚至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0.2个百分点。它提醒我们，既不能因一场

危机轻易断定美国将走向衰落，也不可因一时的经济复苏而再度陷入对美国的顶礼膜拜。毕竟，美国的政治、社会问题之严重为近20年来之最，它们对美国经济长远影响如何，还要继续观察。

令人担心的是，美国借“量宽”的进与退获得重大收益，却未带动西方国家整体经济复苏，更遑论全球经济面貌与美国经济复苏形成鲜明反差。美国这种“吸入式”增长凸显了美国霸权的自私性，但反过来却诱导欧日纷纷效仿。目前，“欧版量宽”又开始粉墨登场，国际媒体普遍预测，这势将触发全球新一轮货币竞相贬值，不仅将助推美元霸权进一步强化，而且可能促使大宗商品价格不确定性增强。姑不论欧洲央行大规模量宽能否像美国那样刺激欧洲经济复苏，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对世界经济绝不是福音。

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经济“新常态”。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7.4%引发全球热议，唱衰中国经济论者再度沉渣泛起，尤其是对比美国经济的强势回归，许多人断言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可能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事实上，放在世界宏观经济发展的大局下对比中美经济增长，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结论。其一，美国经济表现抢眼，中国经济增速也依然不俗。7.4%相较于此前30年每年10%左右增速虽显低迷，但在全球仍独占鳌头。其二，美国经济增速依靠的是美元霸权、能源及科技优势，结构性、体制性变革则不尽如人意，后劲如何还需观望。中国经济减速则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主动作为，是中国经济走向健康稳定发展前的“刮骨疗伤”，前景似乎更值得期待。其三，美国经济是与西方阵营“抱团取暖”的结果，暖了自己，凉了别人，所以被称为“吸入式”增长。

中国经济则是“发散式”增长，无论是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的“亲诚惠容”之“惠”（指中国发展要惠及他国），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将中国发展同多国发展联结起来，体现的都是新时期中国大战

略的新风格和新气派，其中核心要义，就是“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正确义利观”指引下的“合作共赢”理念。

这种新思想、新理念乃至“新常态”在中国才刚落地生根发芽，就给乱象纷呈的国际社会吹进了一股暖风。如果各大国都能秉持合作共赢的思想，暂时放下私利，谋划全球共同发展，则新一轮世界秩序重塑大有希望。

---

1. 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另见《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期相关文章。
2. 美国方面大讨论的主要观点，参见Foreign Policy，Summer 2000。
3. 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002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02年1月1日。
4. 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5. Samuel Berger, “Diplomacy in Globaliz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0.
6. Richard N. Haass,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 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 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Mark Hotel, New York, June 1, 2001.
7.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 SAI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 April 29, 2002.
8.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 SAI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pril 29, 2002.
9. 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2.
10.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30, 2001.
11. 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再围绕打败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计划而建设美国的武装力量，而需要审视我们的弱点。像腓特烈大帝在其《战争通则》中所说的那样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定怎样的战略？’然后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革。”Donald H. Rumsfeld,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2.

12. “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New York, June 1, 2002.

13.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 SAI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pril 29, 2002.

14. 部分美国学者认为“9·11”后布什的战略观出现了有别于美国传统的七大根本变化。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15. “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New York, June 1, 2002.

16.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 SAI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 April 29, 2002.

17. Richard N. Haass,“Defining U.S. 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 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April 22, 2002.

18. 主要防范传统威胁的北约在“9·11”后开始实现功能的转化，根据北约多位领导人的说法，北约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反恐联盟”。

19. 《大国雄心》中文版已于2016年3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第二章 春江水暖鸭先知：美国的应对

从探讨新时代的特性，到分析新时代的矛盾，再到思谋如何应对，应该说，西方人走在中国人前面。原因无他，既有国际体系是西方人主导的，未来世界秩序当然西方人仍想继续主导。

美国人眼中的世界主要矛盾

从分析主要矛盾入手观察世界政治，一直是把握时局的关键。因此，随着冷战后美苏两极对立矛盾的突然消失，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必须解决一个最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不分国界，但问题的答案则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其中，美国战略家凭借赢得冷战胜利的“王者之气”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学术传统，率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由于具备超强综合国力，同时受称霸世界的思想影响，美国战略家们在看待世界政治主要矛盾时，往往将美国自身看作矛盾的主体，然后以此为前提寻找美国的对立面。在他们眼里，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自己与美国在建立霸权秩序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之间的矛盾。

日裔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明确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将是自由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因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影响历史发展的“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注]换句话说，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无非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如何巩固并扩展自由民主成果的问题。福山的思想代表了相

当一批美国学者的观点，转换成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的语言，便是认为世界从此进入美国独领风骚的“单极时期”。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可被视为“单极论”的始作俑者。注

然而，无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克劳萨默的“单极论”都没能完全解释冷战后十几年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的巨大活力及广大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发展路线等诸多现象，表明“历史”远未终结。俄罗斯的东山再起，更使这种论调不攻自破；而美国虽实力超群，却并不能在所有重大国家问题上我行我素，也至少说明“单极世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于是乎，另有一批战略家对时局进行了更为谨慎的诊断。其中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人最为引人注目。三人都承认美国的单极优势，但都同时意识到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存在，因此不同意“历史终结”说，也不赞成美国利用单极地位推行单边主义路线。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别从“文明冲突”、传统地缘政治和新自由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了关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各不相同的结论。

亨廷顿认为，旧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虽然终结，但新的“文明间的冲突”则取而代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将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转为“西方对非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抗。亨廷顿并不否认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但他强调：“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他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注于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在他眼里被简化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中东世界为主体的“儒家文明+伊斯兰”之间的矛盾。

布热津斯基则更倾向于强调地缘政治的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将围绕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及在此过程中美国与各大

力量进行角逐而展开。在这场矛盾冲突中，日、欧盟国是美国借重的力量，中、俄两国则是潜在的对手。美国的主要战略就是利用空前绝后的优势地位，团结盟国，将中、俄融进西方体系，完全控制欧亚大陆。[注]因此，世界政治矛盾的主体将是美国及盟国为一方，俄罗斯与中国为另一方。[注]

约瑟夫·奈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言人。他一贯认为，冷战后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传统国际关系的主导形式（即主权国家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了新内涵。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新的视角看待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国际格局。他在著名的“三维棋盘论”里指出，美国只是军事层面的超霸，经济层面实际是美、欧、中三足鼎立，而在跨国关系层面，力量则更为分散，可谓多极并存。[注]因此，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新威胁，美国与世界各主要政治力量不必然构成矛盾的对立面。

除了从美国全球战略大视野观察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外，美国另有一大批学者直接从谁是美国的“主要挑战对手”角度审视国际格局，分析主要矛盾，并因此得出了多种不同看法，概括起来有三类。

（1）美中矛盾是主要矛盾。理由是，中国综合国力最被看好、地缘上与美国存在现实冲突、意识形态与美国相左、反美情绪与日俱增、与西方文明很难相融等，其代表言论是“中国威胁论”，代表作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龙年》《大国政治的悲剧》《百年马拉松》等，代表人物则是美国媒体、智库、国会、政府内的所谓“蓝队”成员，以及理论界一批现实主义学者。

（2）美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看法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现实主义战略家头脑里根深蒂固。除了认为俄罗斯是唯一能对美构成现实军事挑战的国家、“帝国雄心”没有泯灭[注]、占据欧亚大陆主体位置

等原因外，更主要的理由是，俄罗斯民族和文化中有中华民族和文化所缺乏的“侵略传统”和“掠夺本性”。正是这一传统，使得当年的苏联共产党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天壤之别”[注]，也使得俄罗斯的挑战潜力比中国更让美国担心。

（3）美欧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此最雄辩的论证出自两位学者，一位是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另一位是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前者认为，随着欧洲作为一个联合的政治力量的崛起，美欧联盟终将分裂为北美和欧洲两部分，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分裂成罗马帝国和康斯坦丁堡帝国那样。“尽管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但东、西两个帝国成了死对头”[注]，因此，美欧矛盾可能成为今后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后者指出：“现在是我们停止假装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拥有一个同样的世界的时候了。”[注]这一论调引起了大西洋两岸激烈的论争。

“9·11”事件的发生，在极大撼动美国内外战略的同时，也促使美国战略家们进行适度的战略反思，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新思想，大体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美利坚帝国主义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矛盾，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矛盾都退居其次。[注]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充斥美国报纸杂志。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一倾向可以看出美国思想的实用主义传统。

第二类认为，恐怖主义固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但传统大国威胁仍不容忽视，因此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同时应对恐怖主义与大国挑战这两种威胁。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2001年9月30日发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该报告的起草者们一方面谈论恐怖主义的危害，一方面则一再提及所谓“地区强国”的威胁，尤其提到亚洲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个“拥有惊人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倡导的军事改革基本是根据这一思路。曾任美国知名智库国

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总裁、希拉里主要外交顾问之一的坎贝尔，在其作品《硬实力》中也强调这一点。

第三类思想可以说是福山“历史终结论”和克劳萨默“单极论”的深化，即是一度在美国甚嚣尘上的“新帝国主义论”或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该论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美国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又有反恐提供的绝好时机，就看美国领导人敢不敢于“承担责任”，建立“新帝国”。[注]

战略家们对世界矛盾的分析显然影响着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决策，但政府的决策毕竟更讲求平衡性。因此，冷战后发布的所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力图在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之间、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之间寻找平衡，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画出一条不偏不倚的路线图。不过，在对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把握上，仍可看出冷战后几届政府之间的重大差别。

克林顿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深，其对外战略更多是布热津斯基的新地缘政治论、亨廷顿的“单极—多极”格局论、约瑟夫·奈重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作用等思想的糅合，强调美国实力的有限性，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待大国关系，主张重点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小布什政府则更多受福山、克劳萨默思想及“新帝国主义论”的影响，布什称“20世纪自由与极权主义的伟大斗争，最终以自由力量和国家取得成功的唯一的可持续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注]，这简直就是福山“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翻版；而他强调“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注]，则无异于鼓吹单极论。

在克林顿那里，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与大国协调，借助国际机制的重塑，共同应对全球化到来的新挑战，建立美国主导的

世界新秩序。在布什那里，主要矛盾是美国如何整合大国，消灭“失败国家”，缔造美国主宰的“新帝国”。

他们的一致性在于，都希望利用美国的实力塑造对美有利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长治久安。奥巴马政府显然更多回归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世界观和威胁观。

西方政要的新时代观和战略选择

“春江水暖鸭先知”。敏于时事、耽于忧患、勇于变革者，往往“于无声处听惊雷”，更善于捕捉“青萍之末”的风声，做出及时的应对。西方大国在这方面历来占有优势。探讨世界主要矛盾虽是美国和西方战略界惯常的战略套路，但对新时代、新秩序、新战略的集体性探索，则是2008年以后的事。这一年，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西方衰败成为热门话题，而“9·15”金融海啸的爆发将讨论推向高潮。

以欧洲为例。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新三驾马车”亲自坐而论道，评估国际体系的变迁，运筹下一步棋局的走势。萨科奇抛出“相对大国时代说”，认为单一大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大国都只具有相对实力，大国之间注定只能合作，不能搞单边主义。其继任者奥朗德似乎继承了这一思想，与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同中国的合作意愿明显增强。英国前首相布朗提出“全球性欧洲说”，认为在美国一超与世界多强并存的世界，欧洲只有走向全球才可防止被边缘化；默克尔则提出“经济北约”新思维，期望与美国实现全面捆绑，应对体系变迁带来的深层挑战。

欧洲大国还乘势推出“划时代”的战略报告。法国在过去14年来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英国则推出历史上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德国联盟党发表《亚洲——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挑战和机遇》等

重大报告，力图在国际体系变迁中占得先机。萨科奇还借“重返北约”、组建“地中海联盟”等行动给未来定坐标，并身先士卒，在利比亚、叙利亚冲突中发挥主力作用，试图借此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9·15”金融海啸之后，法、德领导人发起改造既有国际金融体制、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二”的倡议，学界则开始系统反思“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并从制度、文明等深层次探讨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里斯本条约》终获通过，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各国在国际体系变迁大背景下同气相求的结果。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但战略思维却未必能对现实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欧洲高福利社会累积的负面效应在全球化时代正在逐渐显现，而“恐”情上升也令欧洲人危机意识大幅增强。英国人一面意识到只有实现欧洲的捆绑才能实现英国的抱负，一面则在脱离欧盟问题上大费周章，而作为第一个表态参与中国人发起的“亚投行”的美国核心盟国，其背后考虑是什么，不得而知，凡此表明英国似乎并未找准迎接新秩序的定位。德国人原本对借所谓“经济北约”深化美欧经济联系抱有期待，欧美之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也一度如火如荼。但实践表明，美国借世界之力摆脱了经济危机、实现了经济复苏，欧洲则仍在经济衰退边缘徘徊，指望“自私性增长”的美国拉动欧洲经济看来并不现实，德国只好将经济增长的期望瞄向亚太、投向中国。但这只是经济东向还是战略东向，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不论怎样，欧洲已经意识到国际体系变迁的深层意义，开始从新世界秩序构建的视角重新定位自身，也因此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欧美中、欧美俄三角关系。

俄、日、印、澳各大国也均在思考以战略之变因应体系之变。从梅德韦杰夫称“多极化时代已然来临”，发表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构想》，到普京在俄格冲突、俄欧较量、俄美博弈中展现原则、捍卫利益、彰显实力，俄罗斯立足国内资源能源优势、坚持军事实力至上捍卫核心利益、凸显重视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思考以欧亚经济联盟做

实地缘战略空间，似乎正在做好重登世界舞台中心位置的战略准备。但或许是时运不济，或许是策略运用不够，俄罗斯的强国梦遭遇美欧强力抵制，西方经济制裁虽打不垮俄罗斯，却同国际油价下跌一起将俄罗斯经济逼向负增长，令俄罗斯的强国梦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从福田提出“共鸣外交”到鸠山抛出“东亚共同体”，日本面临体系之变的最初战略选择是，期待在对美外交与亚太外交间实现平衡，既固美又联亚，谋划在中美日三角互动中争取主动，确保体系变迁中继续保持实力地位和战略利益。但自野田政权始，这一战略方向生变，及至安倍上台，完全颠覆前任符合时代潮流的战略选择，解禁集体自卫权，意欲突破战后体制，彰显日本独立一极的战略分量。然而，借与美国深度战略捆绑实现全球战略抱负，这本身就存在内在逻辑缺陷，其根本问题在于，是日本在利用美国，还是美国在利用日本？只要美日之间利用与反利用的意图存在，其控制与反控制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无法根除，也就决定了安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历史命运。

其他大国中，澳大利亚陆克文当政时期曾大力倡导“亚太共同体”，期望借体系变迁实现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最大化。印度则左右逢源：一面与美日交好，拓展军事安全关系；一面与俄中走近，深化外交经济关系；一面打出“印太（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期待在“大亚太”棋盘中谋求地缘战略位置、获取经济战略收益；一面在南亚做大，暗示“印度洋是印度人的洋”“南亚是印度人的天下”，确保地缘战略根基筑牢夯实。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在体系变迁关头还产生了“新想法”。三国正在构建一个所谓“IBSa”（三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集团[注]，认为作为“民主国家”，他们比“非民主”的中国更适合主导“发展中国家”阵营，以此抢占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的滩头。

美国的思考

美国作为“一超”，又处在内忧外困的历史转折关头，比他国更多一份对体系变迁的敏感和忧患。自冷战结束后，美战略界即对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给予持续不断的关注。伊战困局、华尔街海啸、美国大选等事件的刺激，更激发全美国的集体反思。相关讨论往往同反思小布什政策得失、规划“后布什时代”大战略、思考美国霸权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显得更为深刻，也更具现实意义。

总体看，“世界权势东移”与“西方制度危机”、“新兴大国崛起”与“美国霸权衰落”、“国际规则变化”与“全球议题转移”等命题，构成美国议论国际体系变迁的中心内容。为因应体系变动，美研究机构、两党谋士都在思考应对之策。民主党新生代战略家伊肯伯里主持的“普林斯顿报告”、约瑟夫·奈和阿米蒂奇共同主持的“巧实力报告”、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汤姆·芬格主持的“全球趋势”系列报告、坎贝尔主持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颇具代表性。而以“新兴崛起国家”“亚太新战略”“新中东战略”“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等为题的各类报告，更是连番出炉，显示美国意欲把握体系变迁主动，重新占得重塑体系的先机。

事实上，小布什政府也意识到体系变迁的挑战，并尝试以“军事转型”“变革外交”“大国合作”等新思维来应对。但因伊战拖累等外部因素及“新保”流毒等内在原因，加之无法做到自我否定，全面战略调整难以展开。于是，2008年总统选举成为关系美霸权未来的“方向之战”“战略之争”。高呼“变革”的奥巴马之所以人气高昂、高票当选，同美国社会呼唤战略调整的大气候息息相关。究其根本，在于面对国际体系变迁的大势，美国不得不变。

如何因应国际体系变迁并规划“后布什时代”美国对外战略？在奥巴马上台之前，美国战略界即已出现三种代表性的主张。

一是“民主联盟”构想。代表人物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及其核心幕僚，代表言论是麦氏发表于《外交》2007年11/12月号的《在自

由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麦氏认为，由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效率低下、中俄等新兴大国日益崛起，美国单打独斗能力有所减弱，美国应该组建一个全球民主国家联盟，凭借其“政治和道义优势”，弥补国际体系不足，“应对日益上升的中、俄极权主义挑战”，实现永久自由与和平。该联盟将排除俄罗斯、中国，拉进印度、巴西。

一批“御用文人”还提出所谓“盎格鲁圈联盟”与“英语圈联盟”设想，与之呼应。前者倡导复兴美同英、加、澳、新等盎格鲁民族国家的传统邦谊，后者主张将“盎格鲁圈”扩展至南非、印度、丹麦等英语国家，组建“英语大家庭”，旨在增强西方核心价值观、文明凝聚力和总体实力地位。类似“民主联盟”的构想在民主党策士圈内也很有市场。早在2006年，“普林斯顿报告”就提出“民主共同体”构想；奥巴马的外交顾问伊沃·达尔德则发表极具煽动力的长文《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影响颇广。

二是“新兴大国合作”构想。代表人物有基辛格、佐利克、保尔森、约翰·桑顿、伯格斯滕、弗格森等。代表性主张包括“中美共治论”“两国（美、中）集团论”“五国（美、欧、日、印、中）集团论”“十三国（八国集团+中、印、巴、墨、南非）集团论”“亚太八国集团论”等。中心思想是：世界权势东移是潮流所向，新兴大国崛起乃大势所趋；西方世界无法、无力也没必要与之对抗；全球化时代与全球性议题使意识形态划线或文明划界没有意义；以合作方式将新兴大国整合进既有国际体系，最符合美国利益，不仅以柔性方式将新兴力量纳入美欧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可借此发挥新兴力量的作用，共同管理日益繁杂的国际事务，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论证从少数战略家的倡导逐步深入政界、学界，赢得更多认同和响应。布什对华政策包含的“利益攸关方”思想和推动建立各种对话机制等做法，乃是美官方因应新兴大国崛起的一种尝试。

三是“议题导向”战略。代表人物是奥巴马的诸多幕僚。奥氏认为，国际体系变迁异常深刻、“布什主义”遗产过于沉重、美国人民的期待很高，因此任何简单化的战略选择都不合时宜。通过对杜鲁门、艾奇逊、乔治·凯南、老布什等人外交思想的研读及对小布什外交实践的反思，奥氏团队倾向于不急于确立“大战略”，而是在坚守“强硬、聪明、有原则”的战略底线前提下，根据不同问题选择不同“多边同盟”，既要加强同传统盟友关系，也要谋求与新兴大国合作，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决定外交的方向。有人认为这是“志愿者同盟”“临时同盟”等思想的翻版，据此将奥巴马称为“真正的实用主义者”。

“民主联盟”被讥为“异想天开”，“新兴大国合作”被认为“具有风险性”，“议题导向”则“缺乏大战略视野”。诚如扎卡利亚所言，“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将遭到失败，而缺乏理想的外交政策又与美国不相称”。因此，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如何在国际体系变迁的大背景下达到新的平衡，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关键。

奥巴马的应对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审慎评估内外局势及小布什政策得失，精心打造多元色彩明显的国家安全团队，积极游走各国抛出新的政策主张，适时调整战略与策略。经过深入思考与实践，一套有别于小布什时代甚至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新的大战略框架逐渐明晰，集中体现在奥巴马在布拉格、开罗、莫斯科和阿克拉等地所发表的演讲及拜登、希拉里等政要一系列重要演讲及行程中。总体看，奥巴马政府外交新思维大体包含以下内容。

其一，在对美国自身实力与地位的认知上，既看到自身实力的相对衰弱与实力的有限性，因而放弃所谓“单极霸权”或“新帝国”等不切实际的想法，又更加强调坚持美国“领导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

如希拉里2009年7月15日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演讲中所说："问题不在于我国是否能够或应当发挥领导作用，而在于我国将如何在21世纪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深知，放弃或松动领导地位，等于拱手送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而捍卫领导地位，即是宣告美国有信心重振雄风。

其二，在对实力的运用（即战略）上，强调所谓"巧实力"战略。根据希拉里的解释，"巧实力"意味着"明智地动用我们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召集与连接的能力。它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我们的创业与革新能力，以及我们的新总统及其领导班子的能力与信誉。它还意味着在决策中运用古典的常识。它是原则与务实的结合"。具体言之，包括五个方面的政策方针，即：与不同伙伴建立不同合作方式；与敌对国或持不同意见的国家展开"有原则的交往"；将"发展"提升到美国对外战略核心的支柱地位；以民事和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方式在冲突地区展开行动；善于调动美国实力中的"关键资源"，包括经济实力和榜样的力量。"巧实力"外交是对布什主义滥用武力和单边主义的修正，是审时度势后综合运用美国软硬两种力量的明智选择。

其三，在对国际格局的认知及对外资源的运用上，强调所谓"多伙伴世界观"。"多伙伴世界观"既是对布什时期"单极世界观"的修正，也是对中俄印等大国倡导的"多极世界观"的反应。在这里，奥巴马、希拉里等人不仅指出，美国"不可能返回冷战遏制时期或单边主义时代"，同时也强调，"采用19世纪大国协调或20世纪大国制衡的战略没有任何意义"，言下之意，指"多极世界"是一种过时的理念。在对单极与多极进行双重否定的前提下，抛出"多伙伴世界"新思维。其"新"在于，淡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色彩，强调不同国家均可成为美国伙伴，唯其功能不同而已；其不变在于，"多伙伴世界"的前提是美国主导，这与"多极世界观"强调各方均为一极有本质区别，凸显出美国仍将自己视为凌驾一切"伙伴"之上的主宰性力量。

其四，在具体策略运用上，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协调”。即，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及美国的领导地位为中心，一手加强同跨大西洋（美欧）与跨太平洋（美日等）传统同盟间的协调，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挑战；一手加强同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协调，应对在气候变化、能源环保等全球性议题上来自欧盟的压力。二者性质与功能不一，但价值相同。在重大问题上，美将尽量减少亲自出头，而把协调对象推在前面（如在中国问题上让欧盟打头阵，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将中印推上前台），自己居中制衡。

其五，在地缘战略的关注上，强调“兼顾两头，稳中（东）顾东（亚），重心东移”。中东、中亚仍是美安全战略重心所在，但焦点从伊拉克、伊朗扩大至巴基斯坦、阿富汗；同时，因应世界权势东移，加大亚太地区综合性投入。奥巴马上台以来，高调推出阿—巴新战略，提升3.0版美印关系，“大南亚战略”隐然成形；利用朝核危机加大美日、美韩安全捆绑，大体实现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新布局；以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标志，启动全面重返东南亚进程；以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新定位与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与契机，全面提升美中关系。至此，美国基本完成“大东亚”战略布局。“大南亚”“大东亚”战略既是对布什时期“大中东”“大中亚”战略的扬弃，也可视为是某种逻辑性和历史性延伸。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到2020年，美国海空军力量的60%要转向亚太。如果说，冷战后的第一个10年（1991—2001年）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第二个10年（2001—2011年）的重心在中东，那么，第三个10年（2011—2020年）美国的重心将全面转向亚太。

其六，注重新因素、新手段、新议题、新理念，力图重新掌控国际重大问题的话语权及国际重大区域的主导权。包括：（1）提出“无核世界”构想，抢占核不扩散机制先机和道义制高点，以此推动美俄核裁军，遏制朝伊拥核企图；（2）将气候变化与新能源提升到国家大战略高度，力争重新夺回话语权，并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升级与转型中引

领潮流；（3）将“发展”置于新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核心支柱地位，借此全面进入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领地，扩大利益空间，谋求战略利益。希拉里入主国务院后，倡导所谓“3D”理念，即defense（国防）、diplomacy（外交）、development（发展），首次将发展提升到同外交、国防一样的高度。其目的，在于以外援为手段同大国争夺非洲、拉美，为21世纪美国霸权地位奠定可持续发展基础。

---

1.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代序。
2.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1991.
3.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4.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Zbigniew Brzezinski, “Living with China”,“Living with Russia”,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Summer 2000.
6. Joseph S.Nye 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2, p.133.
7. Zbigniew Brzezinski, “Living with Russia”,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0.
8. 基辛格1999年9月在“21世纪前夕的中美关系”会议上的讲话，法新社华盛顿1999年9月14日电。
9. Charles A.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2,p.120.
10.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113.对美欧矛盾更全面的论述，参见：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3。
11. James Kurth,“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2.
12.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也可参见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13. 有关美国新帝国的论述很多，最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美国《威尔逊季刊》2002年夏季号关于“美利坚帝国”的专刊共5篇文章。见：The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2002。其他较为重要的论著有：Robert D. Kaplan, Warrior Politics: Why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 Random House, 2002; Andrew J.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Sebastian Mallaby,“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2.

1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2002.

15. Ibid.

16. Bruce Gilley, “Look to Brasilia, Not Beijing：The Rising Challenge to China’s Great Power Aspira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8,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912571625797593.html.

第三章 中国为什么要自信?

秩序变迁必然引发巨大不适。全球如此，处于自转与公转共振状态下的中国更是如此。面对国际局势乱象纷呈，周边局势扑朔迷离，中国国内一些似是而非、耸人听闻的观点大行其道。事实上，历史、全面、辩证、发展地看，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周边形势并非“糟得很”，和平发展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中国应该而且能够继续保持战略自信，按照自己的节奏深化体制变革，在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再次考验中国

总体看，国内在看待当前形势时，存在学者悲观、精英失落、民众迷惘、媒体激愤四种情绪。其交叉感染，致使人们看问题心态不健康、视角不健全：或者对号入座，简单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理解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或者无端恐慌，从西亚北非变局中衍生出中国亦可能出现“茉莉花革命”或“颜色革命”的联想；或者丧失自信，因欧债美债危机而认定中国经济前景不妙。从外部看，始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逐渐蔓延的美欧债务危机，深化于西亚北非变局，激化于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竞争面加剧、中国与部分周边关系矛盾凸显。从内部看，则是左右两股思潮竞相发难，经济转型与社会转轨引发的系列阵痛，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在新时期的部分失衡。

进而，一些人开始全面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有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大政方针，建议放弃、反思、调整包括战略机遇期、和平

发展道路、韬光养晦、不干涉内政、不结盟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判断、方针原则和发展目标。

可以说，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人们都争论不休、僵持不下。诸如，美债欧债危机究竟会持续多久？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性危机，还是个别国家、个别领域的暂时性困难？抑或是一场扰乱中国崛起进程的战略陷阱？西亚北非变局究竟是内生性的还是外推型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又一次民族复兴，还是不同类型矛盾的总爆发？是充满希望的“阿拉伯之春”，还是大中东新一轮乱世的开端？对中国究竟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中国周边形势逆转究竟是美国及相关国家联手遏制中国的战略包围，还是因应中国强势崛起的必要防范，抑或别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凡此种种，国内至少都有两种以上答案。

由于上述疑问，人们在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展开了大讨论，直接触碰中国外交乃至中国大战略的核心问题。诸如，面对全球和周边乱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有没有？面对一些国家在主权领土等攸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接连发难，中国是否还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崛起树大招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情况下，还能否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原则？在中国海外利益日益扩大、国际事务越来越难以超脱的背景下，中国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美国强化盟国关系、提升伙伴关系、在中国周边合纵连横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考虑放弃“不结盟”思想？中美关系还是不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疑惑？为什么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反而感觉越来越脆弱？为什么国外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太硬而国人却普遍抱怨中国外交太软？

可以预见，随着未来国际、周边、国内形势的进一步演变，上述论调还会继续上扬。如不及时加以引导或疏导，这些论调对内容易造

成思想混乱，不利于经济社会转型和保持政治稳定，对外容易授人以柄或予人以可乘之机。若内部隐患与外部挑战产生共振，将严重冲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

以下试图从历史、全面、辩证、发展四个角度分析、评估、思考当前形势，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为什么应该而且能够继续保持战略自信。

从历史上看，中国当前战略处境并不差

从历史上看，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国内环境不仅不是最严峻的时期，而且应该是比较好的时期。

且跳过百年屈辱、8年抗战、国共内战、10年“文革”这几段非常时期不说，仅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历史来看，大体每隔10年中国都面临一道大坎儿，每道坎儿都比今天的形势要严峻。但最终中国均涉险过关，也因此成为过去30多年世界大国中唯一未犯重大战略失误的国家。

30多年前，大体是1978—1980年这段时期：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百废待兴；国际上，北有苏联威胁、南有越南挑衅，与美国则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刚刚复出的小平同志做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美建交、（对越）自卫反击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极大改善了国际环境，成功启动改革开放，使国家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多年前，大体是1989—1992年这段时期：国内，遭遇政治风波和西方全面制裁；国际上，则是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前途命运面临空前挑战，左右两股思潮激荡、悲观与激愤两种情绪交织。

对此，小平同志提出“大气候与小气候说”，做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判断，并于1992年年初展开南方视察，以所见所闻发表所思所想，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厘清国内国际形势，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成功召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翻开新的篇章。

十多年前，大体是1999—2002年这段时期，中国连续遭遇“法轮功”作乱、美国“炸馆”、李登辉搞“两国论”、海南“撞机”等恶性事件，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对台喊打声音激昂。在这一背景下突发的“9·11”事件引发了国内战略界的大辩论。是袖手旁观还是积极介入？是防范为主还是合作为主？对此，中国政府很快做出判断，“美国谋霸是真，反恐也是真”，中国既要坚持反霸并防止美借反恐谋霸，更要旗帜鲜明地反恐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极大改善了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稳定并推进了中美关系，为中国崛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2002年，党的十六大成功实现新老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战略机遇期”的大判断应运而生，中国和平崛起迎来了黄金10年。

再过大约10年，2008—2009年这段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也远大于今天。特大天灾（“5·12”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特大人祸（“3·14”西藏骚乱、“7·5”新疆骚乱）、特大群体性活动（奥运、世博）、特大外部环境变异（美国金融海啸），全面考验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中国人民的承受能力。实践证明，中国经受住了考验。改革开放30年累积的巨大经济实力、中国政治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政治效力、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迸发出的伟大凝聚力，汇聚成一股有形无形的超级能量，使中国渡过了难关、站稳了脚跟、保持了稳定，中国经济总量比国际普遍预期提前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迎来了党的十八大。

既然当前形势不比上述几个阶段更紧张严峻，何以国内普遍感觉不乐观甚至有人颇为悲观呢？

主要是两大原因使然。一是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现代历史上第四次重大历史性变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时代。大时代意味着大混乱。其主要特点是“快”和“新”，国际局势不仅瞬息万变，而且多为不太熟悉的新问题，同时考验人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知识储备，往往令人应接不暇或反应失当，自然容易心生不安或恐慌。不独中国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二是中国的身份和地位正在经历百年来的重大历史性变迁，中国正昂首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和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并被卷入全球安全领域的敏感地带。不经意间，中国已经成为我们正在观察的国际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观众”变成了“演员”甚至“主演”，以前“旁观者清”，现在“当局者迷”，在还没有做好当“主演”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准备的时候已经被历史推向了世界大舞台，只好“在表演中学会表演”。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不安、惶恐、焦虑、紧张、不适，但却没有退路。

综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中国当前面临的形势不比历史上更严峻。中国从来都是在学习和摸索中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以前能够挺过，现在也可以应对。第二，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国际体系大变迁与中国地位大变化两个变局下必然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以新视角、新知识、新战略加以应对。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全面看，中国的日子更好过

从全面看，中国当前的战略处境在全世界主要力量和战略版块中不仅不是较差的，而且应该是相对较好的。

且不跟遭遇强震、海啸、核泄漏的日本比，也不跟面临严重债务危机、一体化进程和欧元命运同时面临挑战的欧洲比，更不用跟深陷乱局的西亚北非比，即使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比，中国的日子也不算差。

美国同时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经济难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点迷失。奥巴马呼唤的“制造业回归”“新能源经济”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彰、前景未明。二是失业高企，民生不济。官方统计的8%左右失业率未包括弃找工作者、不充分就业者和高能低聘者。美国经济界一般估计，真实失业率在12%—15%。在这一背景下，贫困人口数量（突破5000万）和青年中的“啃老族”（25—34岁年轻人中的19%选择与父母同住，39%需要接济）创半个世纪来新高。三是国债攀高，难以遏止。目前国债上限突破18.4万亿美元，超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人均欠债5万多美元，国债总额突破20万亿美元大关指日可待。国家财政赤字连续4年过万亿，联邦政府捉襟见肘，削减开支成为必需。拼经济、增就业、削赤字、减债务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总统在失业率高过8%、经济增速低于2%、财政赤字连续破万亿还能连任者。奥巴马虽侥幸实现连任，但日子并不好过。

第二，政治难题。集中表现为：政治“极化”加剧，两党尖锐对立，府会难得一致，联邦与地方不谐，执政效率低下。奥巴马的任何重大立法包括就业法、移民法、新能源法等，均无法在国会通过。侥幸通过的医保法案遭遇最高法院“是否违宪”裁决，虽涉险过关，却进一步撕裂了两党。金融监管法案曾被米特·罗姆尼威胁称“上任第一天即会废止”。凡此成为美国政治“50年来之怪象”，也成为制约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第三，社会难题。突出表现为5对矛盾。一是贫富矛盾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以“99%对1%”为口号而一呼百应，正是对1%的富人占据20%的财富、10%的富人占据80%财富的反对。二是族裔矛盾复杂。拉美裔超非洲裔成为美国最大少数族群，亚裔移民增量赶超，使传统的黑白矛盾格局分化为黑白、棕白、黑棕、黄棕、黑黄、黄白等多元矛盾，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美国2010年人口统计显示，新生的一岁以下儿童49%为少数族裔，表明白人沦为少数民族的时间会提前至2030年前后。1300万非法移民则已然成为尾大不掉的综合难题。凡此引发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系列反应。三是代际矛盾凸显。开始享受养老保险的65岁老人占全美人数的1/6和选民人数的1/4，成为保守力量的大本营，同缺钱、缺房、缺工作的年轻人之间形成观念、政策上的巨大冲突。四是性别矛盾发酵。因性别问题衍生出的堕胎问题、同性婚姻等问题成为影响政治的重大问题。五是地域矛盾深化。除10个左右“摇摆州”外，全美政治版图被分割成红、蓝两个板块，在经济、就业、产业结构、政策取向上立场不一，被称为正在制造“一个分裂的美国”。总之，美国社会正经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蕴藏诸多不稳定因子。可以预见，2016年大选结果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获胜，美国社会的裂痕只会进一步被扩大。

这些难题加在一起，构成奥巴马“新政”急需解决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尽管其性质和内涵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尽一致，但其难度应不亚于中国。唯其如此，奥巴马才不得不采取全球战略收缩、削减国防开支、力推出口倍增、呼唤制造业回归等政策。其中每一项都不啻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变革。

在这一背景下，美对华战略既有竞争的一面，以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规模，也有合作的一面，以获得中国经济、金融、外交上的支持；既有对抗的一面，以打压中国“强势外交”和军事现代化加速，也有妥协的一面，王立军、陈光诚事件的处理多少显示出美国在推进人权与稳定对华战略关系上“无可奈何的平衡”。奥巴马、希拉里等美国

政要积极呼应中方领导人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表明防止冲突、寻求合作、打破历史宿命、发展良性互动已经成为美方不得不也不能不思考的重大命题。这是基于中美力量对比、国际政经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是历史的进步而非退步。对此，中方理应做出积极的判断而非得出悲观的结论。

辩证地看，中国战略机遇期并未终结

辩证地看，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总体趋于严峻，但也有亮点；有必须加紧防堵的一面，也有可以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一面。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并未终结，只是内涵发生了变化而已。

仅以周边环境为例。国内不少人之所以认为中国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基于对两个事实的判断：一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认定是全面冲着中国而来，是一场精心谋划的针对中国的全方位战略包围；二是海洋争端尤其是东海、南海局势，认定相关国家已同美国结成临时联盟，决意同中国对抗到底，甚至不惜军事冲突，中国已无路可退。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看美国战略重返亚太。中国因素自是其重大诱因，但作为一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全球性重大战略调整，美国重心转移乃基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历史现实两种视角、政治经济军事多个维度展开的系统工程，服从于美国整体战略目标。中国因素只是目标之一，而非全部。挤进东亚一体化进程、服务国内经济振兴、重塑后反恐时代军事部署、防止盟国体系崩盘等，也都是重要原因。其中被广泛忽视的，是其回归亚太有重塑盟国体系的重要考虑。原因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韩、澳、菲、泰等五个盟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脱美入亚”“疏美近中”态势。其中作为美国亚太战略基轴的日本，在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更在普天间机场搬迁、印度洋美舰断油、核密

约等问题上对美国公然叫板，鸠山政府公开倡导同美国战略利益相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意识到，美国如果继续忽视亚太，首当其冲的挑战不是中国崛起，而是盟国异心。因此，奥巴马战略重返的一项工程就是抓住机遇、利用矛盾、恩威并用，重塑盟国体系。美国将冲绳美军南移关岛、将驻韩美军联合作战指挥权延期至2015年、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派驻累计2500名海军陆战队换防，既有公然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有暗中控制盟国的用心，二者共同服务于美国新亚太战略总体布局。日、韩、澳等国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官方和战略界对此也心知肚明。

如若此类背景复杂的动作被简单理解成对华战略包围进而自乱阵脚，自是美国所乐见的，因为它以最低的成本同时实现吓阻中国、稳定盟国的目标，可谓一箭双雕。相反，如对此洞若观火，充满自信，则美国的战略收益必然大打折扣。因为过去50年的历史证明，美国与盟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根本矛盾无法调和，韩、日盟国谋求自主独立的战略欲望也不会泯灭，只是因时因势发生变化、出现转换而已。

美国重返亚太是否已然形成对华战略包围圈？目前还得不出这个结论。环顾周边，中国与俄罗斯、蒙古、中亚等国的关系均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关系热度不减，同印度的关系缓慢升温，同老挝、柬埔寨的关系依旧良好，同缅甸的关系总体稳定，同泰国的关系甚至好于美泰盟国之间，同越南的关系大体可控，同韩国的关系全面深化。细究起来，只有同日本、菲律宾、朝鲜的关系在全面恶化。这是基本面。

再看南海问题。南海局势紧张、紧迫，越、菲等国一再越线挑衅，美国同各声索国互为支撑，确是必须应对的客观现实，但应将其放在更宏大的战略背景中去看。尤需注意南海问题升温的另外四个重要背景：第一，中国陆地边界纠纷基本得到解决，具备集中关注南海问题的前提；第二，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扩展，具备集中关注南海问题

的动力；第三，中国海上能力逐步提升，具备集中关注南海问题的条件；第四，台海形势基本稳定，具备集中应对南海问题的基础。

换言之，南海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即已凸显并在90年代逐步发酵，但当时尚无暇也无力去解决。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直面南海问题的国家能力和应对南海问题的民族意志。因此，南海问题凸显是中国实力、利益、战略发展的必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将伴随中国崛起下一阶段的全程。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或很快解决问题并不现实，需要信心、决心和耐心。美国及相关国家会不断引诱、刺激中国犯错误，摔跟头，中国则须坚定地将其放在崛起进程中加以看待，把握自己的节奏，不随风起舞。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官方和战略界一部分人开始反思亚太战略的得失。一种声音认为，美国正在犯三大错误。一是过于以中国为对手塑造亚太布局，开始激起中国的反美情绪，进而使美中关系面临走向对抗的风险，不利于美国整体利益。二是刺激中小国家"拉美制华"的冲动，使美国亚太战略被第三方绑架，最终有可能使刚从中东沙漠抽身的美国再度陷入南海汪洋。三是矫枉过正，在重返亚太的同时忽视西亚北非变局，致使美国中东战略两大基轴埃—沙—以和埃—土—以三角出现松动；轻视俄罗斯的战略能力，致使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不尽如人意，最终顾此失彼。这种反思显示，美国的亚太战略存在可变性和可塑性，为中国思考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建设性互动埋下了伏笔。

由此观之，中国周边环境有恶化的一面，也蕴藏着积极变化的因子。只要中国发挥主动、因势利导，完全有可能创造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从发展上看，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

从发展上看，中国真正的挑战不是眼前，而是未来5—10年；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麻烦。

未来5—10年，中美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国际权威机构普遍预计，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大约在2020—2025年。届时，中国军事、科技实力也将有实质性提升。美国战略界目前在集中思考三个有关中国崛起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应对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和经济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带来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的大国所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挑战？这意味着，中美目前的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战略较量还在后头。如何尽快调适心态、调整战略，迎接经济总量超美之后的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必须思谋的大战略问题。

未来3—5年，是各主要大国脱困疗伤的关键期。各国目前都在不约而同地做着一件事：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美国体现为奥巴马“新政”和战略重返亚太，欧洲体现为围绕债务危机的体制机制变革和对西亚北非变局的积极介入，俄罗斯则利用“普梅体制”对内谋求经济复兴、对外打造“欧亚联盟”兼及巩固远东。一旦美欧诸国渡过难关，完成新一轮体制性变革，辅以正在酝酿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则将真正冲击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如何冷观周边形势，将工作重心尽快转向国内体制机制完善和经济社会再造，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赢得最终的综合国力竞争，是中国当前真正的考验。

未来3—5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重在实现有利于美国主导的亚太格局的再平衡，而非同中国的全面对抗，过早直接或间接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不符合其战略利益。这一阶段，美国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

段滞缓或干扰中国的崛起进程，更多利用日、菲盟友牵制中国利益扩展，获取战略实利，实现国力重振。

由此可见，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这是中国再一次成功应对当下战略挑战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角色与定位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中最耀眼的力量，既与世界各大力量同步“公转”，也按照自身的独特轨迹“自转”，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也是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在高速转动过程中，中国昂首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全球安全领域的敏感地带，由此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国际地位与民族自豪感大幅提升，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运筹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国际国内压力也同步上升，而且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复合型压力：既有来自霸权国的防范和打压，也有来自新兴大国的竞争和嫉恨；在亚太周边地带，面临“新门罗主义”或“强势外交”的指责，在拉美、非洲，则遭遇“新殖民主义”的非议；“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交织，“中国崛起论”与“中国崩溃论”掺杂。在世界现代史上，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像今日中国这样面临复合型挑战的崛起中大国。

目前，中国学术界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新时期中国的定位，因其维度太多、视角各异，迄今仍缺乏统一答案。笔者认为，从实力地位、体系变迁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同时具有四种不同的身份，是一个“四合一”国家。

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大国。无论从中国的政治原则、外交方针、发展战略还是从中国的客观实力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7，欧盟的1/5，全球平均水平的65%，全球排名80位），中国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

第二，中国又是崛起中大国。“崛起中”与“发展中”的区别在于，崛起是超高速发展，许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但不一定是崛起中国家。中国是“金砖国家”之一，是新兴大国崛起和世界权势东移的标志，“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符号。

第三，中国还是世界级大国。尽管中国的活动范畴与利益触角更多局限于东亚区域，中国学者多以“有一定全球影响的区域性大国”定位中国，但无论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还是从经济总量、国际贸易、外汇储备、人口规模、地理规模以及国际影响、发展势头看，中国确实当得起世界级大国的称号。相较于俄罗斯、印度、日本等诸强，中国发展更为均衡。

第四，中国还是“准超级大国”。不管喜欢不喜欢，是否韬晦，中国已被很多国家视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由于一国实力既取决于自己看自己，还取决于别人看自己，如若多个国家都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中国便不能刻意回避这一现实，否则会导致巨大的认知落差，影响战略判断。

中国同时处于多重复杂的变局及进程中。一是“六化”并存。中国既处在工业化的中程，又大幅步入信息化；既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又部分迈向国际化；既未完成区域化布局，又面临全球化压力。其利在于：拥有多重发展空间，多头并举；弊在于：同时面临多种难题，风险大增。

二是“两大主义”凸显。对内，新型“国家主义”正在形成，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中国各

个区域板块开始真正被市场经济连为一体。“中国人”意识、“公民意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超越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越来越成为人们自觉的需求，由此带来区域不平衡、民族冲突等复杂问题。对外，新民族主义勃兴，既有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也掺杂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新国家主义与新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国家崛起必不可少的人气，显示出齐心向上的精气神，同时亦滋生出一种不正常的“脾气”，给外交决策带来新变量。

三是内外两个大局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紧密。阿—巴局势同新疆、印度同西藏、缅甸同滇川黔、朝鲜同东北、蒙古与内蒙古，相互连接在一起。好处在于可以由内而外，借互联互通、“一带一路”顺势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坏处则在于外部风险也可能“内灌”，使国家利益更易遭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四是大格局稳与小格局乱。中国树未大而先招风，现在树已大更招风。环顾周边，阿—巴乱局、朝核变局、缅甸危局，加之中日对立、中菲冲突、中越龃龉、东海和南海风波，中国周边乱云飞度，显得四面楚歌。但换个角度看，中俄关系势头积极、中印关系企稳回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同多数国家关系总体良好，中国周边应无大碍。这也反过来要求中国必须学会辩证地看待周边环境，不因小乱而自乱阵脚，也不因大稳而忽视战略经营。

多重身份与多种进程并存，决定了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国家利益的多元化，需要我们以多样化外交体现多身份特点。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级大国。中国不可能按照美欧的标准去承担减排责任。美欧已经完成工业化的阶段，开始步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所以中国强调历史的标准、人均的标准。但中国确又无法规避作为世界级大国应尽的义务，因此坚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展示政治意愿与合作意识。

在经济领域、海洋权益等方面，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家利益的外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太空，涉足海洋，经济上要“走出去”，军事上要现代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外界的反弹势所难免，但多为正常的心理反应，既要敏感把握和妥善应对，也大可不必因此自缚手脚。

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世界级大国”的身份显得更加突出，不仅因为巨额外汇储备，而且因为中国开始成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中美“金融恐怖平衡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在该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中国不仅需要加速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造与再造，也需要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中G20（二十国集团）机制是个重要平台，中国大力倡导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部分 赶超与被赶超

第四章 身在巅峰：美国为何强大?

身在巅峰，进退都是深渊。

这句话用来形容美国的实力地位及战略处境，最为形象不过。前半句话说的是美国实力，后半句话指的是美国战略。美国实力固然超强，但高处不胜寒，若战略稍有闪失，霸权的沉沦也并非不可想象。

如果说美国每过一段时期总会上演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那么中国也不时会泛起“美国衰退论”。如何准确看待对方的实力地位，彼此都缺乏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标准。

本来，美国的实力地位没有什么可探讨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学者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论单极时刻》一文，中国学者王缉思出版其代表性著作《高处不胜寒》，都暗示美国的“一超”地位可以说是不容辩驳的现实存在。[注]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1990—1998年间，美国经济增长27%，增速几乎是欧洲的两倍，日本的三倍。[注]美国国防预算几乎占全球一半，而与军事相关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则几乎为美国所垄断，美国一家用于军事开发的资金占了全球的80%以上。[注]正因为如此，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美国世纪”仍将持续相当长时期。

“9·11”事件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仍然不会怀疑美国的“一超”地位，但在以下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则似乎越来越难以取得共识。诸如：恐怖袭击使美国反而变得更强大——有人开始用“超超级大国”（hyperpower）取代“超级大国”（superpower）形容美国——还是使其开始由盛而衰？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是暂时现象还是结构性矛盾

使然？美国国内弥漫的“新帝国”思潮是美国实力膨胀的结果，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鼓噪的产物？美国当前的对外战略究竟是显示出“帝国过度扩张”的苗头，还是反映了优先次序明确、资源分配合理的“大战略思维”？等等。鉴于美国的实力地位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格局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意义，本章试图对“9·11”事件后美国的实力地位问题进行一番再认识。

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不同认知

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确立于“二战”结束之初。自此，一方面，美国对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踌躇满志，对外战略中主动塑造的色彩明显加深；另一方面，对于苏联的存在不无忧患，对外战略中又多少呈现出被动防范的特征。自信心与不确定感相互交织，使美国比别国既自得于所谓“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又多一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感，阶段性的危机意识构成冷战时期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而这种危机意识每每体现在其对自身实力地位的重新认识上。冷战50年，美国的逐步强大几乎是在对自身实力地位面临的危机进行的不断检讨中实现的。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国内出现所谓“科技教育危机”的大辩论。其结果，美国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教育政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尤其在航天技术领域决心尽快超越苏联。到60年代，美国在与苏联的科技教育竞争中重新夺回优势。

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欧盟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中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美国则因内忧（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嬉皮士运动等）外战（越南战争）而导致实力相对衰落。此时美国国内弥漫着所谓“政治危机”，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提出著名的“五极论”，以美国当政者的身份首次承认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崛起的客观现

实。为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此时开始了对内外政策的全面检讨，终于挽回颓势，站稳了脚跟。

此后，70年代中期，美国面临“能源危机”。80年代中后期，美国遭遇更深层次的“滞胀危机”。美国正是在克服上述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危机中最后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由西方世界的霸主一跃而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

然而，在突然失去苏联这样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美国实力虽空前强大，却又面临所谓“战略危机”，即美国奉行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有效维持“一超”地位的长期性？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欧日盟国日益呈现出的离心倾向、中国的崛起、次大国在国际舞台作用的日益增大等因素，使美国决策层和战略层一度陷入战略迷惘。其要害在于，一旦战略选择失当，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完全可能昙花一现。

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与各主要思想库掀起一场关于“美国未来大战略选择”的全国性辩论，各种方案可谓层出不穷。最终，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后期大体确立了相对明确的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新战略，即“参与扩展”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对内以信息生物技术等新平台催生“新经济”，继续占据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对外则多管齐下，以北约东扩和美日防卫新指针重塑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与欧日盟国关系，以“建设性、有条件接触”政策开道，逐步西化俄、中、印等转型国家，以“遏制加接触”政策笼络朝鲜、伊拉克等所谓“无赖国家”，以“金元加经援”为手段抢占非洲等广大战略真空地带。如此，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实现了由冷战向后冷战再向新世纪的过渡，确立了“一超”时代美国的大战略，也由此确保了美国“一超”地位的相对稳定性。

自此，美国似乎进入一个空前绝后的战略机遇期，无论从当时美国政府出笼的各种战略报告（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还是一些战略家们的著作（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

局》）中，人们读到的只是对美国如何确保目前超强实力的构想，而不是对其拥有的傲视群雄的超强实力的丝毫怀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所要解决的，只是在“帝国”“霸权”和“全球领导”中选择一个更恰当的词来形容自己而已。注

“9·11”事件可谓一夜之间改变了这种极端乐观主义情绪。关于美国实力地位究竟如何评估，很快再次成为美国国内争论的热点之一，并大体出现了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笔者称之为“悲观论”。代表人物是世界体系论的提倡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著名学者查尔斯·A·库普钱。他们基本认为，“9·11”事件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虽然强大，却有难以防范的软肋；“9·11”正在成为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前者在《老鹰坠地》一文中批评那些盲目迷醉于美国实力的新帝国主义论者，认为他们的观点“与现实差距太大”；后者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正在轮回”，“现在轮到欧洲上台并摆脱拒绝交出至高无上特权的美国的时候了”。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库普钱等人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大国权力和平转移从而避免冲突的可能性问题。注悲观派们的观点虽振聋发聩，但在美国并不占据主流。

第二种观点则是所谓“乐观论”。代表人物是一度在美国极为活跃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和一些“单极论”和“新帝国论”的鼓吹者。在学术界和理论界，主要人物有《时代》杂志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等。其中克劳萨默在《单极时代》一文中最为全面地阐释了新帝国论者们的观点。他认为，“9·11”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损及美国实力，反而从三方面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力量之间的实力不对称性。首先，“9·11”使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得以全面展示（尤其是迅速拿下当年英国人和苏联人都长期没能拿下的阿富汗）。其次，它证明了美国力量的复原能力。“9·11”事件后短短几天，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一切恢复正常运

行，充分展现出美国实力的新形式。最后，它促进了大国之间的重新组合，使大国客观上服从美国的领导和意志。[注]

另两位单极论者斯蒂芬·布鲁克斯及威廉·沃尔福斯更称：“如果以现在美国的优势地位还不能把世界称为‘单极’的话，那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单极’了。”[注]这一观点在“9·11”后的美国大有市场。以这期间讨论美国实力地位的论著而言，有关仁慈霸权、文化霸权、制度霸权、新帝国、新罗马帝国、美国治下的和平等方面的文章、著述、言词充斥市场。[注]《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保罗·肯尼迪也开始修正他以前的观点，感叹美国当下的实力确实“无人可敌”。[注]但是，随着伊拉克战后局势的动荡和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新帝国论者一度甚嚣尘上的势头有所减弱，他们的观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公开批评。[注]

第三种观点或可叫作“客观论”。代表性言论是约瑟夫·奈的“三维棋盘论”，即承认美国实力的超强地位，但认为美国只是军事上的“单极”，经济上是美、日、欧三足鼎立，政治上则是“多极共存”；美国的“硬实力”一枝独秀，“软实力”则大不如前。[注]

对美国实力地位如此不同的认知，显然出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认识角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综合国力评价法来衡量各国的实力地位。从国外来看，比较有名的有克劳斯·克诺尔模式（也是最早的综合国力方程式），克劳福德·哲曼模式（强调核武器能力的重要性），维·福克斯模式（主要以工业化时代的传统资源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包括人口、能源、钢等），雷·克莱因模式（以国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加上国家战略系数、国家意愿等软实力综合计算），以及兰德公司的阿什利·泰利斯等人首创的所谓“后工业时代综合国力评估法”（注重资源、绩效、军事能力三方面）。[注]从国内看，大体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颂芬、中国军事科学院黄硕

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清华大学胡鞍钢等几种分析模式。

上述模式各有特点，为科学把握一国之综合国力提供了较为准确的量化依据。根据他们的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从第二至第六位座次的排序上有所不同，但均认为美国实力遥遥领先。就比较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相对实力的变化趋势而言，这些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单就美国自身实力地位的分析而言，王缉思先生的研究成果较具参考价值。他根据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科技教育水平和人才流向、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及美国的形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自我调节能力等7项指标，从国际问题专家的视角对美国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注)

美国实力之基

这里不打算从综合国力的角度分析美国当今及今后的国力走向，包括具体考察美国经济、军事、科技等指标，也不去分析影响美国历史发展的政治体制（包括宪法、民主自由价值观等）等不用多加分析的因素，而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探讨美国的实力问题。基本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分析美国从成立至今成为“一超”，究竟是哪些恒定因素在起作用；接着，分析这些因素今天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出现了哪些变化；最后，结合前述持久因素与当前变量综合评估，得出对美国实力走向的基本看法。

从美利坚发展史的演变轨迹看，影响美国国力的独特因素很多。撇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成功的外交制衡术、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等根本性基础不谈，其中最重大的因素大体包括独特的地

理位置、不断的变革传统、周期性的战争、扩张意志及精神和连绵不绝的优秀移民。

地理位置不再独特，但仍然是他国难望其项背的重要“硬资源”。

极少有人否认，美利坚能成就今天的霸业，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尽管自孟德斯鸠以降“地理环境决定论”屡遭严肃学者批判，但地理环境对于塑造一国之精神、提升一国之国力，实在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自成为全球性大国以来，美国就一直自恃拥有两洋天堑，又有南北“弱邻”为伴，因此在全球左冲右突、纵横捭阖而少有后顾之忧。

“9·11”事件打破了这一地理神话，从而一定程度上动摇着美国人的战略根基。1941年，日本人虽成功突袭珍珠港，但毕竟不在美国本土。1812—1814年，英国人虽登上美国本土并火烧美国总统官邸，但毕竟发生在美国的“幼年时代”。因此可以说，“9·11”事件是美国“成年”以来真正意义上“本土安全神话”第一次被攻克。其影响之深远，致使美国的内政外交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对内，一向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共和党政府迅速成立了国土安全部，机构之庞大，合并工作之艰巨，至今仍未完全就绪；对外，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特征的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半个世纪以来被奉为圭臬的“遏制、威慑”战略，搅得周天寒彻。

对这样一种结局，人们大体持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美国本土从此不再独享太平，安全心理防线被摧毁；一种认为美国乘机扩展了本土外延，地缘战略利益得到深化。前者是从民众视角看问题，后者则从战略利益角度看问题。就美国实力地位而言，二者一损一荣，有弊有利，但从事后的事态演变看，显然利大于弊。首先，随着国土安全部及北方司令部的成立，美国本土安全由过去心理上的神话变成了机制上的保障。其次，“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使美国将战火延烧到海外，以“攘外”而达到“安内”的目的。最后，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历史性

地进驻中亚、借反恐实现部分军力重返东南亚、以改造伊拉克之名正式全面进驻中东心脏地带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确实大有斩获。一旦拉姆斯菲尔德倡导的美国全球军事部署大调整到位，美国无疑将再一次占据全球地缘战略制高点。

再从另一个层次看，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竞争逐步白热化，使一国国土规模、地理环境、物质资源等“硬”指标的重要性凸显。日本经济近十年复苏乏力，与其岛国的天然局限不无关联；欧盟之所以坚持走一体化道路，说到底，是各国国土规模的有限性与全球经济政治竞争的激烈性相互矛盾的结果；俄罗斯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但西伯利亚的寒天冻土使俄罗斯半壁江山居然有成为负担之嫌。美国有学者发表论著认为，从国家荣耀及象征看，广阔的西伯利亚无疑使俄罗斯人感到自豪；而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西伯利亚却成为俄罗斯政府弃之不得、用之不能的“鸡肋”。注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中国要想在不拓展海上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崛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环顾全球，美国仍然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国土资源，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开采及由此带来的美国能源独立，更加凸显了这一优势。从难免继续遭遇恐怖袭击角度看，美国地理位置的独特价值有所下降，但从综合国力竞争和地缘战略较量角度看，美国的地理位置仍然无可比拟，并在某些方面更有价值。

不断改革是美国国力发展的独特经验之一，当前美国相对衰弱的经济状况、相对混乱的政治局面与其说是国力衰落的前兆，不如说表明美国正在经历另一场深层次、全方位改革的“阵痛”。

从本质上讲，美国不是个酷爱革命的国家，却是个热衷改革的社会。多次改革的累积效应绝不亚于一场大型的革命。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至今，扭转国家命运的全面改革至少有三次。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改革始自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当时以国务卿杰斐逊和财政部长汉米尔顿为首的两派激烈斗争，互不相让，前者主张弱化中央、加强地方、农业立国、自由放任，后者则强调加强中央权力、国家干预、工商业立国。最终，开国元勋华盛顿成功弥合了两派意见，确立了美利坚宪法，建立了联邦制共和国，在中央与地方、农业与工商业、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等若干关系问题上实现了平衡，并成功确立了利用国际矛盾、保持积极孤立的外交准则，从而在新大陆缔造了美国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此次成功的改革为美国带来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机遇，使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迅速成长壮大。

第二次大型改革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持续近40年，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美国如何顺利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从乡村社会过渡到都市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孤立主义过渡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其面临的问题之多、改革的难度之大，堪与今天中国的改革相比。其结果，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强势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最终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国家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实现了工业化、都市化及垄断化，不仅缔造出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模式，而且开创了大国权力和平转移的历史先例，一跃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头号强国。

第三次大型改革则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度过“大萧条”，挽救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其结果，美国又一次成功实现了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并由此确立了当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此后，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再到肯尼迪的“新边疆”，以至里根任内的重大主张，基本延续了“新政”的思路，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两条腿走路，确保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继续繁荣。

以上三次重大改革具有若干重要特征：（1）都发生在国家转型的重大时刻；（2）都与战争相伴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一战”、“二战”）；（3）都历时较长（大体经历10到30年不等）、影响深远（大体影响半个世纪以上）。

以冷战结束、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来临为标志，美国实际上正在进入历史上第四次大的改革时代。与历次改革一样，此次改革具有全面性、深入性、持久性特征，制度创新是其灵魂。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两党三届政府在许多政策上虽然看似矛盾，但从美国历史发展这样更长远的角度看，三人在以下两个方面是别无二致的。

一是全面推进并逐步实现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滞胀危机”的爆发及其后“里根经济学”的破产，宣告自30年代“新政”缔造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难以适应美国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和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滞缓和在国际上与欧、日贸易战的全面展开，显示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走向国际，就难以摆脱自身制度上的天生缺陷。

因此，克林顿任内，对内厉行“新经济”政策，抢占信息产业和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对外强调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推进自由贸易，扩大优势，转嫁劣势。小布什上台后依然强调自由贸易，不仅将推进“自由贸易区”（FTA）作为重大战略，而且最终推动国会通过“快速审批权”，使美国在世界舞台构建自由贸易区战略前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小布什政府利用反恐战争之便，对内全面振兴军工产业，对外则以武力开道，强行抢占中东、中亚能源要地，并决定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这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冲动也体现在美国对华贸易上，克林顿政府以接触政策开道，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轨道并成功解决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小布什政府则在督促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压中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上下功夫。二人的基本逻辑

是一致的，即都希望在国际贸易游戏中美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基本属于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一旦美国实现由其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并全面控制世界能源，其经济发展的前景仍将是相当可观的。

二是着手推动军事、外交战略的全面转型。大体从老布什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冷战后美国三届政府各有侧重地围绕如何将军事外交战略实现从冷战型向后冷战型过渡做文章。老布什吹响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号角，克林顿做足了建立美国单极地位的实力准备，小布什则不遗余力地构建所谓“新帝国”。

军事上，克林顿时期提出“塑造、反应、准备”的新军事战略，重新调整核战略，完成与欧日军事同盟关系的重新改造，并加速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全面开启了美国军事战略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型。小布什上台后，以拉姆斯菲尔德军事思想为指导，以反恐战争为契机，美国非常明显地加速了军事国防战略的全面转型，内容涉及军事战略原则的转变、军事装备的全面更新、导弹防御系统的全面上马、海外驻军的全面调整等各个方面。可以想象，一旦这种转型得以成功实现，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军事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外交上，撇开克林顿与小布什外交理念和外交方式上的差别，就实现美国“单极独霸”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两届政府对外战略之演进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克林顿任内的主要任务是消化冷战遗产、塑造“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格局，包括融合俄罗斯、稳定盟国、加大对中印等“转型国家”的西化、遏制所谓“无赖国家”等。小布什则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打造出新世纪的美国外交战略新格局，即以“融合战略”与“大国合作”思想为基础，缔造新型大国关系；以武力和高压政策为依托，力图改造“邪恶轴心”，其结果，伊拉克被军事占领，伊朗、叙利亚乃至利比亚被迫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进行合作，朝鲜

也正逐步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以自由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为准则，全面改造伊斯兰世界。布什以单边主义、实力主义为核心推进其外交战略，虽面临一定阻力，但也有所收获。从冷战后美国霸权的发展轨迹看，布什所推进的一切仍是符合美国既定战略目标并有所前进的。

战争与美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反恐战争有可能成为美国全方位转型的助推器。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同时又是个军事国家，战争与改革一样，构成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从独立战争至今，美国卷入的大、中型战争有100多起，影响美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大的战争即有十多起，多数起到了推动美国发展的特殊作用，以至战争因素已经融入美利坚民族的血液。

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对美国历史的贡献自不待言。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则以“第二次独立战争”被加载史册，使美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1853年的美墨（西哥）战争及19世纪美国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使美国获取了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大片土地。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则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1898年的美西（班牙）战争不仅使美国攫取了关岛等战略要地，而且从此登上世界强国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顺利完成国家的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转型提供了助力，并使美国一跃登上世界头号强国交椅。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仅帮助美国最终摆脱“大萧条”，而且使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在军事上失败，但在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保持东北亚乃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以利美国居中制衡方面，得是大于失的。此后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败仗，却在完成美国国内政治社会转型、刺激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积极意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最终以苏联的垮台

告终，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1991年的“海湾战争”揭开了美国缔造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序幕，也全面检验了美国的高科技武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达到了清除欧洲冷战余孽、断绝俄罗斯西进企图、稳住美欧同盟关系等一箭三雕的战略目的。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虽为反恐而战，却使美国军力历史性地进驻中亚，并因迅速达成当年英国和苏联未能实现的目标而使军事实力得以“动态展示”，凸显了不可一世的军事单极强势地位。伊拉克战争的获胜，除再次证实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外，也显示出美国单边主义政治意愿在关键时刻并不受当今国际格局所束缚。

从以上事实大体可以对战争与美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战争已成为美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养料。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得益于战争带来的收益而极少受损于战争的伤害。第二，美国需要战争。一方面是因为，战争往往成为周期性凝聚纷然杂陈的不同族裔、锻造独特的美利坚民族的黏合剂；另一方面则在于，“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美国军工企业复合体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经济活力的释放部分仰赖于战争机器的启动。第三，历史多次证明，美国社会、经济、战略的历次大的转型无不以一场重大的战争作为终结。

对于反恐战争和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许多人持有如下看法。（1）反恐战争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历史上真正意义上所谓“战争”的基本要素。因此，这场战争将没有终点，最后会使美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2）伊拉克战争虽然获胜，但战后伊拉克重建及美国希望实现的伊斯兰世界的改造工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有人认为，反恐与改造伊斯兰世界将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掣肘，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由盛而衰的起点。

这种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如果我们把反恐战争和战后伊拉克重建放在“战争与美国社会发展”这个框架里思考，并认识到美国正在进行

一场全面的军事、经济、社会转型，那么会发现，以伊拉克战争为中心、以中东地区为主要舞台、在全球各主要战略要地全面铺开的反恐战争，虽有美国被动卷入的成分，但主要还是美国当政者主观推动并经过规划的结果。其战略收益已经或正在逐步显现。通过建立伊拉克战后政权，美国正在中东树立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亲美的“民主样板”，进而既对伊朗、叙利亚、利比亚政权形成威慑，又对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造成压力，使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规划中东未来发展蓝图。

这一任务之艰巨，使美国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目标几乎不可能，但客观上则起到逐步排挤欧、俄、中等世界主要力量抢占中东能源宝地的效应。战后伊拉克重建项目法、德、俄、中等都被排除在外，绝不只是出于对几国反对动武的报复，而实际有美国在中东圈定势力范围的考虑。美、英、法、德、意就削减伊拉克债务问题达成一致，表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反恐战争的深入与伊拉克战争的推进恰恰与美国国内经济的缓慢复苏同步，其中人们再次看到了战争经济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言行虽然激起全球性反叛，但其体现的扩张意志却正是深藏于美利坚民族精神之中的“本能”。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新帝国论”的狂躁恰恰是美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产物，不可等闲视之。

一部美国史，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解释，是“一部美国人自东向西不断开拓的历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就是自东向西持续扩张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得以开疆辟土，获得物质上的巨大成就，而且缔造出“天定命运”的使命感、敢于扩张的冒险精神，进而“向西进击”融入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也成为美国社会保持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19世纪末，当美国西部土地全部开拓完毕之后，著名边疆史学家特纳曾不无忧虑地表示，美国必须寻找新的边疆，否则维系美国社会发展的“美国精神”将面临挑战。也正是此一时期，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鼓吹美国必须扩展海上利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身体力行，大力发展海军，使美国迅速跻身世界海军强国之列。以后的历史证明，美国一边在国内不断完善民主机制，强化人民的民主权利，一边在海外以不同形式扩展自身利益，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开始越来越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扩张，所谓“对内行民主、对外行专制”。

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中，美国对“新边疆”的追求除体现在对外干涉外，也体现在对人类知识边疆、文化边疆的率先探索上，进而确立了美国年轻但强大的文化体系和科技体系。随着冷战的胜利，美国特有的“天命观”“例外论”“白人至上主义”综合发酵，对外扩张的意愿开始变得更加急迫和强烈，克林顿的“参与、扩展”战略是最好证明。小布什上台后，承继里根“星球大战”时代理念的共和党新政府在我行我素、唯我独尊方面大进了一步。“9·11”事件的刺激，更使以强力推行自身价值观的“新帝国论”在美国国内找到了市场以至甚嚣尘上。

从保持美国实力地位的长久性而言，“新帝国论”的泛滥有三方面功效。其一，为具有扩张民族品格的美国人找到了下一步行动的目标，也最终为美国彻底告别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定下了基调。其二，为国内各种软硬资源的充分调配提供了契机，尤其有助于对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兰德公司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影响一国国力发展的最核心指标有三个，即资源、军事和绩效。显然，“新保守主义者”在动员美国国内资源、强化军事实力、发挥政府绩效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三，激起了美国国内关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辩论，调动了美国政治多元化和相互制衡的特殊机器，使美国在追求大战略的道路上达到了激情与理性的结

合。因此可以想见，一旦美国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在“新帝国论”的狂热中给美国找到更切实际的定位，美国超强实力的前景仍将看好。

移民政策的波动并不意味着美国根本改变其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而只要美国继续对移民敞开大门，其所特有的技术人才优势短期内仍无人可比。“9·11”事件后，美国移民政策出现明显变化：一是加紧了对外来移民的控制和检查，包括严格签证制度、进行新的甄别手续、实施烦琐的安检程序、出笼《爱国法》等等措施；二是明显减少了对外来移民的需求。此外，出于美国国内就业形势不好和安全形势堪忧的双重原因，大批国外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效力。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使得美国移民政策正面临近十年来最大程度的摇摆。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从根本上讲，大多数美国人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后代。移民不仅成为美国保持多样性文化的重要保证，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因此，移民政策的变化往往是观察美国实力地位走向的风向标。对于美国对外来移民政策的紧缩，似应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应看到这是应对“9·11”事件以来国内安全形势变化的本能反应。其次，也是往往被人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应把美国目前的移民政策放到整个美国移民政策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从而历史地把握其未来走向。

从美国独立至今，自有移民政策之日起，美国的移民政策大体被划为两个阶段，即1882年前的自由移民阶段和其后的有选择移民阶段。根据国内美国移民史专家梁茂信教授的研究，200年来，美国移民政策几乎形成了“洞开不得，关闭不能”的特点。所谓“洞开不得”，即是指美国的国门不可能无条件地对所有外来人开放；所谓“关闭不能”，则指美国的国门无法彻底关闭从而断绝世界优秀人才的到来。其中政策的把握则全看国内人才需求和国际环境变动的双向流动模型的变化。

从美国历史上看，外来移民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低潮。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凸现，美国正处于一个吸收外来移民的低潮期。这不全是因为“9·11”因素造成的，移民政策发展内在的规律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前来移民的基本国策。《1990年移民法》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两项作为重点吸纳对象，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来移民的选择标准更加苛刻，而不表示美国将无条件收紧其移民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前美国外来移民政策的波动，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美国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和控制绝不意味着它对世界优秀人才关上大门。

从上面五大因素的基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美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或者说出现了某些变化，但这些变化不一定是消极的，也不一定越出了既定轨道。从这些分析中，仍然很难得出对美国实力地位未来走势的一个很明确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的综合国力既非一日造就，也绝不会轻易衰落。从美国实力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美国才刚开始全面规划其全球霸权战略，在其霸权地位刚刚缔造之时即宣布其衰落，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实际。

对于刚刚开始全面崛起的中国而言，认清美国实力地位所赖以支撑的基础的相对稳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美国霸权的长期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战略课题。

---

1.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1990.
2. 此数据是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9年7月的统计资料推算得出。See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

3.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9/200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Andrew J. Bacevich, “New Rome, New Jerusalem”, The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2000.

5. Charles A. Kupchan, Emanuel Adler, Jean-Marc Coicaud and Yuen Foong Khong, Power in Transition: 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3.

7.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8. 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实在太多，难以一一列举。最近比较系统介绍美国“新帝国论”主要观点的著作可参见Andrew J. Bacevich, The Imperial Tense: 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American Empire, Ivan R. Dee, Chicago, 2003。

9. Paul Kennedy, “The Eagle Has Landed”,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 2002.

10. 最近较具影响的著作如John Newhouse, Imperial America: The Bush Assault on the World Order,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3.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11. 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2. 阿什利·泰利斯等著，门洪华、黄福武译：《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新华出版社，2003年。

13. 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14. Fiona Hill and Clifford Gaddy, The Siberian Curse: 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out in the Co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第五章 “一超”难霸：美国的新处境

如果说“9·11”恐怖袭击摧毁了美国人长达200年的安全心理防线，那么“9·15”金融海啸则冲击着美国大半个世纪的经济霸权堤坝。从“9·11”到“9·15”，看似偶然，实则有着某种必然联系。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以人们想象不到的速度持续恶化，金融危机蔓延全球成为当今最大的时代背景。

曾经是世界经济龙头甚至经济霸权的美国，为何倏忽间情势变得如此糟糕？或者说，美国的经济状况真的有那么糟糕吗？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命运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国际学者不仅没有一致答案，而且甚至得出各不相同的结论。从历史的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探讨从“9·11”到“9·15”以来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显得十分必要。

经济实力与经济霸权

探讨美国经济霸权的意义，不仅在于准确解读当前美国经济形势，更在于把握美国总体实力或霸权地位的走势。如果把美国的霸权地位分解成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科技文化霸权，那么经济霸权的变量最大，也最可能决定美国霸权未来的命运。因为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无可撼动，以“单极”或“霸权”称之毫不为过。[注]美国科技文化霸权的基础也总体牢固，纵受影响，绝对优势依然明显；美国的政治霸权则已然遭到挑战，呈现明显衰势。诚如约瑟夫·奈所言，在政治领域美国要维系单极纯属“无稽之谈”。[注]

唯有经济霸权，其命运最难把握，因此最具不确定性。如果经济霸权出问题，必然冲击军事霸权和科技文化霸权，加之政治霸权本来就在弱化，则美国整体霸权地位必然下降。相反，如果经济霸权地位依然牢固，辅之以依然强劲的军事、科技文化霸权，则即使政治霸权受到掣肘，也无碍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秩序。因此，美国经济霸权的命运关乎整个国际格局未来的演变。

对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霸权地位，国际社会看法不一，美国国内也大不相同。“金融大鳄”索罗斯、“股神”巴菲特、世界体系论大师沃勒斯坦等人，属于唱衰美国霸权者，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即看到美国霸权的泡沫、认定美国霸权的衰落。[注]

而保罗·肯尼迪、福山等学派名流，则阶段性发表不同看法，观点摇摆不定，屡遭美国“新保派”人士讥讽。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扎卡利亚等为代表的战略家们，则善于从国际体系和历史长河角度看问题，同时具有极强的捍卫美国霸权的意志力。因此，一方面，他们认定“后美国时代”即将来临（扎卡利亚）、“权势东移”是大势所趋（基辛格）；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美国仍有“第二次机遇”（布热津斯基），重振霸权并非没有希望。

另有相当一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坚定的美国中心论者，如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前院长、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司长斯劳特等，则认为在“网络状的世界”里，美国的优势依然明显，霸权地位仍很牢固。[注]

关于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经济霸权，中国学者更是意见纷呈，迄今仍争论激烈。综合而言，大概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是“金融危机（而非经济危机）论”，倡导者多为长期研究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出在金融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不当、金融腐败、金融体制等方面，“是金融出

了问题，不是经济出了问题”，因为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在各国中还是最好的。因此，他们认定美国经济复苏会很快到来。

第二种是“超稳定论”，倡导者多为长期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学者。他们看好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偏能力、经济制度的内在运行机理、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以及美国军事霸权的“护航”能力，认为美国霸权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碍，因为“美国毕竟是美国”。

第三种是“霸权衰落论”，又可细分成几类。有的从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找原因，有的则从政治体制找原因，还有人从文化、精神层面找原因，认为当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制度甚至“美国精神”出了问题，因此认定美国霸权已从“根”上烂掉了，从“9·11”恐怖袭击到“9·15”金融海啸，这一总体衰落趋势难以逆转，“即使上帝也救不了美国”。

第四种是所谓“阴谋论”，此论在中国网络、媒体、民间甚有市场。这一观点认为，不排除当前状况是一种“偷天陷阱”，震中虽在华尔街，但最终遭殃者却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不仅不会有大的损失，最终可能还会因此受益。此论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中国受内伤。更有论者认为，其实美国政府和人民也是受害者，一小撮金融利益集团才是幕后黑手和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注]

总体而言，较之美国战略界和经济界人士对自身命运的一派忧心忡忡，中国严肃的学者似乎更加看好美国走出困境的能力，更加警惕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战略用心。这种认知上的反差除了美国惯有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对美国制度的“特殊偏爱”及对美国战略的“天然警惕”等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外，恐怕也同缺乏对当前美国经济霸权宏观的、历史的、国际政治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分析有一定关系。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似乎也存在将经济霸权与经济实力混为一谈的问题。

事实上，实力与霸权是两个既相联系又很不相同的概念。实力大体是可以量化的，霸权则更是一种感知；实力是一种累积，霸权则是

一种释放。经济实力是一系列综合性指数的总和，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目标可以支配的总体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经济霸权则是将经济实力转化成影响、干预、塑造、改造、颠覆他国或国际体系的能力。

在国际政治中，经济实力固然重要，但只是对外行动的基础，毕竟是静态的，唯其通过某种战略将这种静态实力动态化，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才具有实质性意义。对美国而言，经济实力的动态化即是经济霸权。因此，认识美国经济、把握世界格局，既要考察美国经济实力，更应分析美国经济霸权。

从经济实力角度看，即使美国遭遇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未来10—15年仍将无可匹敌。国内学者对这方面论述颇多，论据也很充分，兹不赘言。一向以分析严谨、低调冷静著称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2011年发表的《2025全球展望》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到2025年多极化趋势虽难避免，但美国仍将是“唯一最强大国家”。(注)问题是，经济实力依然超强不必然意味着经济霸权依旧稳固，因为实力能否转化为霸权还取决于战略选择、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变量。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美国经济实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大幅领先，但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却已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除非美国政府真正遵循救市（relief）、复苏（recover）、改革（reform）三部曲并得到国内广泛支持，国际环境也总体有利美国变革，否则这种“结构性衰弱”之势难有根本性逆转。未来10年，美国虽然仍是“一超”，但已无法独霸。“一超”难霸的美国与群雄并起的时代一起，表明冷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量变正因此而发生部分质变。

“结构性衰弱”

为什么说美国经济霸权出现了“结构性衰弱”特征呢？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性，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谓“内在矛盾性”，说的正是结构性问题。只是因为美国经济霸权长时期存在，并历经困顿而坚挺，才导致人们往往忽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制度性缺陷，有时甚至不自觉地陷入“美国例外论”的误区而对美国产生某种“盲目崇拜”。

就此次金融危机而言，它实则是金融产品的过度生产而导致的，这同以往传统产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虽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和历史视角看，当前危机是冷战后一系列矛盾长期累积而集中爆发的结果。美国经济霸权在以下五个方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一，美国维系经济霸权的时空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机遇期”难以重现。

回顾美国自“二战”后确立经济霸权的历史可见，美国在“二战”后享有大发战争横财、收拾欧亚战后残局的大好时机，在冷战期间拥有号令西方世界的绝对权威，后冷战时期面临缺乏势均力敌对手的战略机遇期，并一度独享“冷战红利”，坐拥“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代便利。遇到的经济挑战，则要么来自单一力量（如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70年代的欧洲、80年代的日本），要么源于单一领域（如美元危机、石油危机、滞胀危机等）。因此，美国虽屡屡遭遇困境或挑战，却总能涉险过关，最终得以强势步入21世纪。

反观当前的美国，则遭遇国际体系大转型和世界经济大变动下多个力量、多重危机带来的复合型挑战，这在其霸权史上是头一遭。世界权势东移、新兴大国崛起带来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冲击着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俄罗斯从战略安全领域挑战美国，欧盟从金融经济领域挑战美国，一些中小型反美国家从政治上挑战美国，恐怖

主义再掀新高潮则从心理上挑战美国。而俄罗斯的强势复兴、中东欧渐被纳入欧盟体系，则意味着“冷战红利”已经慢慢耗尽。

更为深刻的是，全球化正从“美国化”异化为“反美化”“去美化”“排美化”，美国霸权成本倍增。诚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所说：“我们（美国）在过去20年依赖的很多增长驱动器正在消亡……我们将面临一个劳动力流失、资本和政治意志松懈的垮掉的10年。这与全球化相关。”[注]为维系经济霸权地位，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对美国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完全开放的世界体系，不允许有任何美国的对手或威胁存在”。[注]而现实证明，上述条件正在逐步丧失。

第二，“新经济”泡沫破裂后，“后新经济时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点迷失，美国经济未来发展空间受限，美国维系霸权的创新优势也大打折扣。

创新、人才、知识经济、高新技术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尽管从全球竞争力、企业实力、全球品牌、研发投入、高校排名等资料看美国仍绝对占优，但总体看，技术、人才两大优势已难现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

新技术方面，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由于代表传统军工能源集团利益的小布什政府上台执政，加之“9·11”事件突发，迫使美国将战略资源与战略关注转向安全领域，并随后不恰当地转向在全球扩展民主，结果使美国未及沉下心来开发新的增长点，迄今尚未找到使其生产力出现革命性变革的产业。一度被视作“后新经济时代”增长点的纳米、信息通信、新能源技术，终究未成气候，无法同当年信息、生物技术领先别国一到两代人的绝对优势相提并论。其中，曾被寄予厚望的纳米技术已然出现美中欧三足鼎立之势。而新能源开发则同国

际油价、国内利益集团、政府投入息息相关，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更有待观望。

人力资源方面，高端人才外溢趋势明显。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海归”“海待”现象被美国《商业周刊》叹为“重返中国综合征”。[注]低端人力资源成本大增。曾经构成美国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一的上千万非法移民，如今抱团儿要权益、要地位、要待遇，在增加经济成本的同时，带来政治麻烦、社会问题、文化挑战甚至认同危机，引发已故知名学者亨廷顿关于“我们是谁？”的深度忧虑。以蓝领阶层为主体的中端人力资源，成为全球化的最大牺牲品和消费文化泛滥的受害者，成为自由贸易的批评者和呼唤变革的生力军，创造力、活力亦不如前。总之，相对于俄罗斯、巴西等国的资源优势以及中国、印度等国的人力优势，美国的创新优势相对减弱。

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和日本打造出竞争力强大的工业体系以来，美国制造业即面对利润率长期下降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美国连串的经济危机，即源于美国制造业走下坡。美国资本从制造业向全球金融业转移，带来了产业空洞化、本土工作消失和工资下降等恶果。随后，美国金融财团将从全球赚来的暴利带回美国本土再投资，不仅没有产生以往刺激创新之效，反而制造了百年难见的房地产与股市泡沫，并引发美国汽车业的整体崩盘之虞。过度金融化的美国经济看来无法支撑美国经济霸权的永续。然而新的发展空间何在？这正是美国经济霸权地位面临的深层挑战。

第三，维系经济霸权的国际信誉严重受损。

21世纪美国经济霸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金融霸权，其中信誉是根本。美国之所以在“虚拟经济”和“双赤字”状态下行使霸权，靠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势美元、吸纳海外资金及将资金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和信誉。

当前美国经济所暴露出的问题，狭义地看，是因次贷危机、华尔街风暴所引发的五大投行沉沦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失信，导致金融信誉惨跌，包括美元信誉、信用评级信誉、政策信誉等。而从2004年“安然公司丑闻”到华尔街“麦道夫案”、AIG（美国国际集团）高管天价年薪等，人们对美国整个金融界的黑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华尔街已不再是那个华尔街。

广义地看，是美国模式信誉受到质疑。“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曾被美国誉为普世价值和济世良方，但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到东盟质疑，“华盛顿共识”破产后受到拉美抵制，2008年金融危机则使美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遭到包括法、德、澳等主要盟国的诟病。美国政府的超大手笔救市计划，表明美国自身也不得不调整既有模式。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开始引发人们对发展模式多样性的认真思考。总之，对美国而言，通过将全球纳入“市场+民主”轨道，进而借金融霸权和国际垄断牟利的套路越来越难以行得通。

第四，美国控制或支配全球经济的管道变窄、手段受限，制度霸权受到极大约束。

美国经济霸权的另一重要支柱是所谓“制度霸权”，即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机制呼风唤雨，或利用美国强大的经济武器为所欲为。但这一局面正在逐步发生改观。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作用下降。这集中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机构上。面对金融全球化下数万亿美元巨额游资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规模捉襟见肘。其苛刻援助条件也令一些国家望而却步，影响力正处于历史低点，改革之声四起，“扩权”压力大增。世界贸易组织则因中印俄等非西方力量的加入而在体制内遭遇挑战，欧日韩盟国也并不同心，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美国越来越难主导世界贸易组织进程。而北美自贸区、南共体、东亚、欧盟一体化、“海合会”等区域贸易自由化挑战全球贸易自由

化，使得世界贸易组织面临全球挑战。世界银行之改革呼声由来已久，如不改革将难以为继。

其次，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效应明显减弱。制裁要么成效有限（如对伊朗、朝鲜制裁），要么投鼠忌器（如不敢对俄格冲突后的俄罗斯大动干戈），要么雷声大雨点小（如针对人民币汇率的种种表现）。美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断言，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损人并不利己。

再次，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尽管短期内美元地位无全球性挑战对手，但当前所遭遇的综合性挑战则是前所未有的，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欧元地位继续稳固。2007年8月，世界流通货币中欧元首次超过美元是个重要信号。尽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欧元与美元的较量有起有伏，但长远趋势看，欧元对美元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二是美元贬值。据国际清算银行资料，美元实际有效汇率2002年2月到2008年3月下跌34%。美国以发债方式救市，必然进一步引发美元贬值。三是多国纷纷寻求替代或减持美元方案。俄罗斯构建“石油交易平台”，决定启动“石油卢布”计划；伊朗决定以非美元货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完全停止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海湾六国酝酿区内货币；美国“后院”巴西、阿根廷两大国决定双边贸易用雷亚尔和比绍结算，对美元霸权不啻又一重击。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超主权货币论”的出炉，标志着新兴国家开始公开质疑美元国际货币的法理基础。

最后，维系经济霸权的军事保障力和拉动力明显减弱，一定意义上，这打破了军事行动刺激经济发展的美国历史发展规律。超强军力是美国经济霸权的保障，大的军事行动往往成为拉动内需提振经济的催化剂，无论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发起。即使越南战争，也是“输了战场，赢了市场”，刺激了经济发展。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以反恐为名进行的战争显示，美国消耗上万亿美元军费，死伤过万名将士，未换

来国内就业、生产、经济形势好转，反而最终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分裂。这是因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战争形态和性质已然生变，大规模军事冲突、大国间战争可以避免，靠战争拉动内需的可能性大减。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来去无踪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手”，拴住了人却让大规模武器派不上用场，难以实质性拉动内需。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美国面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远非一般意义的经济问题，而是同美国整个霸权地位息息相关，涉及美国霸权根基的结构性问题。从大处看，它是冷战后国际体系变迁的应有之局，基辛格“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哈斯“无极论”、梅德韦杰夫“多极时代来临论”、萨科奇“相对大国论”等，都出笼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表明“9·15”金融海啸只是体系变迁山雨欲来大势的加速器而已。从小处看，则是冷战后美国几届政府耽于“单极独霸”迷梦、疏于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高呼变革口号的奥巴马之所以异军突起，最终得以高票当选美国总统，远非种族融合的胜利，而是美国人民已深刻地意识到，再不改革，美国的霸权地位将难保。

奥巴马“新政”与美国霸权前景

美国经济霸权虽然陷入某种“结构性衰弱”，但也并非意味着其必然走向无法逆转的衰落。因为历史上，美国至少遭遇过两次远比此次金融危机重大的历史性变局，均涉险过关并因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城市化、垄断化、工业化、国际化从各方面冲击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导致问题成堆、矛盾激化，国家站在十字路口。列宁在其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中，甚至提前宣告美国资本主义的死亡。

第二次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美国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型。当时，美国外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蓬勃发展和竞争压力，内则面临国民经济的整体崩溃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种族矛盾空前激化，全美国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没落情绪。

但历史证明，美国不仅成功度过了这两次危机，而且借此分别实现了国家的初步崛起和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究其原因，乃分别得益于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发起的"进步运动改革"和小罗斯福进行的"新政"两场重大体制性变革，以及"一战""二战"两次世界大战。再往后看，美国摆脱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危机，则归因于"里根革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及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冷战红利"。

冷战后，美国实际上处于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型和体制性转轨，并面临从"两极"到"一超"和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全新环境。但因沉醉于"赢得冷战"的胜利感和"一超"独霸的战略机遇期，并享受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实利，本该进行的新一轮体制变革未能展开，而体制的某些弊端被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和小布什的反恐战争所掩盖。

事实上，"市场+民主"的美国模式、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民主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在多种模式共存、民主化遭遇挫折的现实面前显得陈旧僵硬。过分强调自由放任而贬斥国家干预的做法违背"两条腿走路"的美国式道路基本规律。"极"化现象凸显、两党恶斗加剧、少数族裔力量上升，使美国社会和政治平衡遇到颠簸。新保守主义一度大行其道，打破了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股思潮内在的平衡性。超前消费、虚拟经济、意识形态挂帅成为潮流，但也绝非美国精神的应有之义。因此，从"两房"危机到华尔街海啸再到汽车工业遭遇重创，看似偶然，实有其必然性。这虽难比历史上那两次重大事件，但本质上也是某种体制性危机，即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时代走向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程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严重不协调所致。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之下，呼吁变革的奥巴马得以异军突起。现在看来，奥巴马之胜选执政，与其说代表美国种族融合和党派斗争的胜利，不如说是急需变革的美国人找到了他们的“代理人”。奥巴马的变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经济霸权的历史命运。

从奥巴马“新政”的出发点和目标来看，从推出超大规模救市和经济复兴计划到厉行新能源开发，从力主“制造业回归”到抛出“出口倍增计划”，从倡导“无核世界”到奉行“巧实力”外交，奥巴马政府的确做好了变革的准备并正全力推进。然而，同老罗斯福时代的“进步运动”和小罗斯福时代的“新政”甚至同“里根革命”相比，奥巴马变革显然面临一系列新的难题。

一是两党内斗加剧，变革的力度和效率受到影响。“进步运动”之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罗斯福和威尔逊两位总统虽不同党，但在改革的大方向上同心同德且相互补充。而“新政”之推进，与小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的特殊条件息息相关。反观奥巴马政府，两党执政理念、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大不相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彼此扯皮。

二是依靠转嫁风险的做法来摆脱危机难度增大。美国在德国、墨西哥、日本、东南亚曾经屡试不爽的制造危机、搞垮对手的“阴招”，目前似难复制。这既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美国与他国利益之捆绑达到新的深度，也是因为他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敏锐、防范措施更加到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超主权货币论”的抛出，即是对美国试图以滥发国债转嫁风险的一种警示。

三是新能源开发前景不明，以此作为美国新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看来寄望太高，至少需要一定时间周期。

四是以战争摆脱危机的风险难以承受。如果没有“一战”和“二战”使美国发战争财，“进步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的结局可能被改写。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高烈度局部战争也很难打响。奥巴马倾力打造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与其说是想通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开辟第二战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以防止恐怖主义高潮再起，从外部冲击美国霸权的根基。指望战争手段刺激经济复苏，恐将得不偿失。

总之，美国经济霸权的“结构性衰弱”需要一场根本性变革来医治。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威胁多元化的21世纪，美国真正走出危机的良方是放下架子、放低姿态、收缩目标、压缩战线，与他国和平共处、合作协商。也即，美国应勇于实现从“霸权”到“领导”的角色身份转变，并以开放的胸襟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包容不同制度、文明的发展。果如是，美国享有“同侪之首”地位还会拉长。毕竟，美国经济霸权虽遭遇重创，但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至少在未来一二十年仍将大幅领先，而世界也似乎并未完全准备好应对一个“无极”时代。

从奥巴马变革思路看，他似乎正在朝此方向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姿态性的还是实质性的，是策略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有待历史检验。至少从目前看，奥巴马式变革虽努力改变美国维持霸权的方式，但尚不足以改变美国霸权的本性。

---

1. 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奥巴马上台的新背景下，美国的年度国防预算仍然高达5800多亿美元，足可表明这一根基不会松动。
2. [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3. 例如，索罗斯说：“美国已经深深陷入远离均衡领域的状态，以至于不能恢复均衡状态。”参见[美]乔治·索罗斯著，燕清等译：《美国的霸权泡沫——纠正对美国权力的滥用》，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2页。

4. Anne-Marie Slaughter, “America’s Edge: 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5. 参见郎咸平博客文章：“金融超限战”，2009年2月3日，http://blog. sina. com. cn/s/blog_4120db8b0100c19g. html。

6.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iv.

7.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09.

8.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张鲲译：《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9. “Back-to-China Syndrome”,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15, 2008, p. 53.

第六章 “老大”的背后：中国算老几？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话题就从未终绝。中国虽然恪守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理念，认定自己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明里暗里总爱拿自己跟美国比，美国实际上成了中国下阶段崛起的尺码。但美国成为“一超”非一日之功，美国要衰落也绝非直线下滑；中国崛起才刚刚起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要加倍努力，不可懈怠。

美国还是“一超”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幼稚，但由于美国是“一超”的说法已经长久地深入人心，以至人们很少去认真思考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为什么说美国是“一超”？美国还是“一超”吗？当2001年纽约双子塔和五角大楼同时遭袭的时候，人们发现美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坚不可摧。当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将“另一个美国”无情地展示到世人面前时，人们似乎蓦然发现，“一超”原来也有不少我们身边经常遭遇到的问题、困难，美国也有“三个世界”。“9·15”金融海啸则触目惊心地提醒人们，华尔街其实很可怕。

人们已经习惯用“一超多强”来界说或观察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应该说，冷战结束至今，“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但内涵却有重大变化。比如，冷战结束之时，俄罗斯曾是多强之首，中国则是多强之末。而今天，中国的座次明显前移，俄罗斯地位明显下降。一度曾被人忽略的印度则异军突起，理所当然地跻身“多强”之列。

没有人怀疑美国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内外各种评估综合国力的报告中，一向只将评估的重点放在第二至第六的座次究竟该如何排，没有人去质疑美国“老大”的地位。这一点几乎成了常识，不用花太多的笔墨去解释，只需列出从国内生产总值到研发开支到军费开支等几项实打实的数据就足矣。

但是，关于美国“一超”地位究竟是在继续稳固还是在走向衰落，这样的讨论甚至辩论在美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们还记得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说的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他早就断言美国将很快走向衰落。但近30年过去了，美国还是美国，“一超”还是“一超”。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再次掀起一场有关美国实力地位的大辩论。以“新保派”为首的“乐观派”们认为，“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所呈现出的极快的危机反应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修复能力，展示出“一超”强大的国内社会、政治基础，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接连迅速拿下，更表明美国的“硬实力”令人咂舌。“如果说这样的国家还不能称为‘帝国’的话，那今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帝国’了！”“新帝国论”的鼓噪者发出了如此的豪言壮语。而对像沃勒斯坦这样的“世界体系论”者而言，美国这一系列表现的背后恰恰呈现的是美帝国即将走向衰败的前兆。相较而言，约瑟夫·奈等战略家们的观察更为理性，他的结论是美国的硬实力还在张扬，但软实力却大幅下滑。[注]

一句话，从冷战结束至今，对于美国的“一超”地位，人们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客观、务实，既不轻言衰落，也不盲目迷信。在对美政策层面，要看到美国“一超”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仍难撼动，因而必须适应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谋求发展，搞好同美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显得更具现实意义。同时又要看到美国“一超”也面临内外掣肘，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因而，中国发展对美关系应充满战略自信，善于和敢于坚持原则、坚守底线。

最近两次关于美国实力地位的大讨论，一次始于2008年美国“9·15”金融海啸，一次则是2014—2015年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并强劲增长。前一次，“美国衰落论”再度甚嚣尘上，伴随的则是中国崛起论、中国自信论四处弥漫；后一次，则是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认定美国又“回来”了，相伴随的则是因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而对中国未来的忧心忡忡。

美国“十五力”

之所以对美国实力地位的评估如此大起大落，在于不能相对科学地给实力地位的评估确立客观标准。笔者曾经以所谓“美国十五力”为题发表过一些浅见，试图对美国实力地位进行细化分类，并得出结论认为其中“十力”不仅没有减弱，而且还在不同程度地得到强化；但另外“五力”则确实遭遇空前的挑战或困难，冲击着美国霸权。而美国霸权的未来则取决于美国能否在继续强化“十力”的基础上补足“五力”，如是，则美国霸权并无大碍；如不是，则霸权地位堪忧。其中的变量，是奥巴马新政以及美国能否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内外政策的深层次变革。

这里不妨对“十五力”略做介绍。更加强化的“十力”包括：

1.自然力。包括国土规模、地理位置、人口结构、资源能源等自然禀赋。美国的人口数量、增长率及人口结构在大国中是最好的，优势明显。而页岩油气的开采则使得美国资源能源优势充分得到展示，故而这一项加分。

2.军事力。包括军费开支、军事同盟、军力结构、军事基地、军力投送、军事技术、军事战略等多项。就军费开支或国防预算来看，美国确实面临着削减的现实，但其总量在短期内仍将遥遥领先。更重

要的是，美国军事战略在大国中已然率先进行调整，无人机、空天飞机、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等新军事技术再度领先。总体看，军事实力没有减弱还在加强。这一项也是加分。

3.科技力。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仍主要出自美国。这一项毫无疑问还是加分。

4.文化力。好莱坞、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NBA（美国职业篮球联盟）、麦当劳、格莱美、奥斯卡、形形色色的排行榜等等，看不出遇到重大挑战。一度遭遇瓶颈的好莱坞电影借助3D、4D技术依然独领风骚。这一项不加分但也绝不减分。

5.智慧力。主要指人的智力资源及其转换为国家战略和发展的能力，包括人才吸引、智库、诺贝尔奖等等。这一项不加分也不减分。

6.同盟力。主要指美国可以借助的盟国体系以及该体系助力美国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与人们的期望相反，美国的同盟体系不仅未因冷战的终结而弱化，反而逆势而动，变相加强，尤其是亚太同盟体系。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等都在强化或充实内涵，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主导推动双边同盟体系的三边化和多边化，如美日澳、美日菲等。这一项应该加分。

7.地缘力。主要指美国对全球重大地缘战略要冲、通道、区域等的掌控能力。美国借反恐涉足垂涎已久的中亚南亚，扰乱中东北非，全面实现亚太战略再平衡，其地缘力虽因地缘战略重心的变动而有所不同，但绝不能得出地缘力弱化的结论。这一项也似可加分。

8.情报力。主要指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掌控别国秘密的能力。“维基解密”、斯诺登披露出来的美国情报界的能力，足以使这一项加分。

9.战略力。包括战略设计、战略谋划、战略协调、战略推进等。这方面美国表现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还不至于减分，尤其想想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全过程及其推进速度。

10.网络力。同科技力相近或重叠。之所以单列一项，是因为在21世纪，网络力可以视作其他实力的倍增器。这一项美国加分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这“十力”加在一起可以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没有衰落，美国还是“一超”，美国“一超”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持续，很难发生自由落体式的衰落。

但不可否认，美国另外“五力”则面临重大挑战，包括：

11.经济力。美国经济虽然已经复苏，但未来的增长点仍不明朗；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他国（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仍在继续，美国经济老大的位置难以维系久远。

12.金融力。之所以单列出来，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元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华尔街的信誉、美元的信誉、继欧元日元之后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因素，均挑战着美国的金融力。

13.社会力。美国代际、族裔、区域、性别、阶级矛盾同时恶化，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社会活力减弱，这恐怕是美国面临的最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4.政治力。突出表现在两党政治的补台作用减弱、拆台效应增强，联邦与地方之间的分野加剧，政治“极化”问题愈演愈烈。

15.机制力。指对国际或重大地区性机制的掌控力。“亚投行”是观察美国机制力弱化的一个绝佳案例。

这“五力”量虽少，但分量足，更加致命。如果说前“十力”表明美国还是“一超”，那么后“五力”意味着美国难以“独霸”。所以，“一超”难霸应该是对美国实力地位相对客观的描述。

关于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国力，国内总是阶段性产生争论。2008年以前，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在崛起。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有人则认为中国还不能奢谈崛起，最后大家干脆就回避这个问题，连“和平崛起”这个说法也被“和平发展”所取代。2008年后尤其是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是不是“老二”的问题成为国内争论的焦点。

中国崛起了吗？根据小平同志的设计，到21世纪中叶，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今后20年，中国的中心任务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到2020年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崛起。但是，中国“尚未崛起”不等于中国不是“正在崛起”。目前国际社会讨论“中国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正在崛起（China is rising或rising China）这个基本事实，指的是“发展的中国”正在变成“崛起的中国”这样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基本事实和判断是成立的。

如何评估一国的实力地位？根本的方法和评判标准不外乎三种，一种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冷战结束至今，在“超”“强”各大力量中，美国硬实力继续膨胀，但软实力大幅下滑。俄罗斯硬实力正在复苏，但软实力的恢复起色不大。日本的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追求扩展，但在区域内的软实力大不如前。印度硬实力上升显著，但软实力升势不明显。欧盟各主要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等，软硬实力的发展势头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综合而言，在当今世界大国中，软硬实力

同时大幅增强的国家，中国引人关注。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刮目相看的一个重要依据。

另一种标准则是所谓“静态实力”和“动态实力”。前者是纸上谈兵，后者是真刀真枪。静态实力只有转换成动态实力才有实际意义。而其中的转换，靠的是战略、政策、行动。战略得当、政策对路、行动及时，可确保静态实力在动态展示中效益最大化；相反，则可能导致静态实力的相对萎缩。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战略运用失当，导致其实力地位尤其是体现软国力的国际形象大受影响。日本当前错误地选择了“脱亚入美”路线，结果至今仍在美亚之间游移。俄罗斯今天的局面不能不说与前几年未能坚持符合自身国情的战略选择有关。而印度之所以异军突起，与它在对冷战时期“站错队”的深刻反思后确定的“不依附、不跟从、独立自主”的战略方向有关。相较而言，中国在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目标明确、坚持一贯且能与时俱进。其结果，在静态实力稳步提升的同时，动态实力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这是中国崛起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热点的又一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自己看自己与别人看自己之间的差别。自己看自己有看不准的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看准了但装作没看准的时候，所谓“佯装不知”。别人看自己，也有看得准、看走眼、看不全等情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具体到中国崛起问题，中国关于“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两论的争执，从我们自己来看，既有政治上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适当“有所作为”的成分，也有对同一事物判断不一样的真实的认知差距成分。但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普遍反映看，“中国崛起”不再是个值得争论的现象。正如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中国不再是个是否会崩溃、是否应被纳入西方体系的问题，而是一个崛起态势很明朗，今后如何在国际体系内发挥作用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或对外决策中，硬实力、静态实力以及自己认知的实力是基础，但软实力、动态实力及别人对你实力的感知则具有实质性意义。而根据这后三种标准看中国，“中国正在崛起”已是基本事实，“发展的中国”正在变成“崛起的中国”。这样一种变化看似字眼的不同，实则具有某种战略性意义，有质的不同。正如一个15岁的男孩长到了18岁，自己可能浑然不觉，但邻居（国际社会）看来，他个子长高一截（综合国力），嗓音开始变粗（国际影响力），还长出了胡子（军事现代化），显然他已不再是孩子，而是成年人了。这时候如果还继续把自己当孩子看，就容易造成认知落差进而可能出问题。“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之辩，本质是本人及邻居对18岁的认知问题。

中国虽然正在崛起，但离真正的崛起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正如18岁虽然标志着长大成人，但毕竟没有“三十而立”，更不用说“四十不惑”了。因此，不能以为中国正在崛起就可以包打天下，“血气方刚”无可厚非，但“莽撞行事”则不能原谅。要真正做到成熟起来，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既需要继续锻炼身体、增添营养（发展经济、军事，增强国力），更需要文明规范、知法守法（塑造国际形象与遵守国际规则），还需要学会为人处世、协调关系（“发展中国家”与“大国俱乐部”两重身份的协调、平衡，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平、发展、合作外交方针的具体贯彻），唯其如此，才能一步一步地成长、成熟。

中国如何当“老二”

没有压力不会进步，压力过大也容易崩溃。人如此，国家也如此。因此，如何正视压力并善于化解压力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

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恰如一个15岁的少年突然长成18岁的青年，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轨道并入特殊意义的崛起轨道，压力自然陡增。这其中有自我施加的压力，更多则是来自周边和外在的压力。对压力浑然不觉说明你还是个懵懂青年，难托重负；对压力看得过重则会导致心力交瘁，同样难堪大任。

历史经验表明，今天中国乃至今后一二十年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正是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段，即所谓“老二”阶段。中国这个“老二”的特殊性在于，与“老大”的差距仍然明显，同“老三”的差距尚未完全拉开。在这样一种特殊状态下，各种压力必然纷至沓来。因此，尤其必要对不同类型的压力、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压力做些区分，该面对的面对，该淡然的淡然，既要严肃认真，也要自信从容。比如，按类别分，中国面临战略压力、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外交压力、文化压力等多重复合压力。其中美国及西方以所谓“负责任利益攸关方”为旗号敦促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就对中国外交构成重大压力。从来源分，中国既面临来自美国及西方的各种压力，也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还面临“台独”“东突”“藏独”等国内分裂主义的强大压力。其中因资源能源问题及市场份额问题而衍生的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新问题，就是一种新的压力。从性质和程度分，则有紧迫的、真实的压力，如东海南海争端，也有心理感知却并不十分迫近的压力，如“颜色革命”的压力等。

细加分析，有些压力是长期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比如西方对中国政治上的指责和军事上的牵制等，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应对压力的经验。有些压力则是新近出现的，比如金融开放的压力、非政府组织有可能在中国以各种方式登陆的压力、海空天网等新领域的压力等，我们还不是十分适应，需要加倍认真地去应对。对于这些压力，既要重视，也要藐视。

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战略安全上的压力就是可以加以藐视的压力。原因在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远好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也远好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时“敌军围困万千重”或者“黑云压城”中国尚且屹立不倒，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动摇对和平发展和维持战略机遇期的信心。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冷战后20多年的外交经营，中国已经跃然成为世界经济巨人和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强国，并初步搭建起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相对和平的周边关系平台、同发展中国家及多边机制相对成熟的关系。

另一方面，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新近布局，与其说是对中国的主动围堵，不如说是不得已的战略防范。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峰会”，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中国成为亚太新型多边机制或组织的积极参与者、受益者或倡导者，美国则越来越显得是个“局外人”。因此，美国期望通过强化美日等双边军事同盟、建构美印等新型战略同盟、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经贸网络来挽回颓势，是一种“补救性战略布局”。这一态势意味着，中国自己更多地掌握着未来战略环境的塑造权和主动权。只要心平气和、步伐平缓、战略得当、增信释疑，此类压力当可适当自我减负。

另一个可以藐视的压力是政治压力。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被西方政治妖魔化和人权打压已久。小布什执政期间，受新保守主义思想推动，美国在全球大行民主化战略，从大中东民主化改造到中亚“颜色革命”，从美日联手打造所谓“民主价值联盟”到美欧携手重塑“跨大西洋民主共同体”，从极力呵护台湾“民主幼苗”到公然接见达赖、热比娅，中国确实感受到一波新的意识形态逆流和西方民主政治压力。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看似减弱，但借助“网络自由”等方式对华施压力度仍然不小。然而细加分析可以看出，上述

动作与其说是一种具备大战略考虑的长远谋划，不如说是小布什战略失误所表现出的一次次冲动。

实践证明，美国的动作没有换来全球新一波民主化的高潮，反倒是民主悖论和民主乱象丛生。伊拉克“民主”未换来稳定、中亚“颜色革命”褪色、中国台湾“以民主搞民粹、借民主搞独立”，至少可以证明美国所扶植的民主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定与和平。而与此同时，美国自身民主制度面临新的历史考验，这一现象无疑会给西方政治学家一个新的思考。

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一直希望改造的中国政治制度则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现在西方已在谈论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问题。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用中国视角对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给予学理的解释，提出诸如“增量民主”等新概念，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精英层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自信。因此，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与其说是系统而深谋远虑的战略策划，毋宁说是在自身模式面临挑战而中国模式取得成功这一态势下的某种无奈和不安。

今天中国感受最多的压力恐怕来自经济领域。连绵不绝的国际贸易争端、从人民币汇率到产品安全的一系列“要价”、美国国会的涉华贸易法案、金融市场开放的经久不断的持续高压等等，确实让我们有些喘不过气来。然而，其中相当部分压力应被理解为正常的贸易争端，不必上纲上线以为不得了。2007年，美国财政部长“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特使霍尔默就曾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列出了一组资料，称“从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已经有99宗案例对美国提出指控，而美国也对28个国家提出了88宗指控。在中国方面，有5宗案例是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两宗是中国针对美国提出的。欧盟向美国提出指控最多，共31宗，其次是加拿大，共14宗”。这组数据表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贸易争端多数情况下是正常机制下的正常摩擦。经过

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已经积累了通过法律武器捍卫经贸利益的经验，今后所要加强的，无非是说话的声音更大、说话的理由更充分罢了。

还有部分压力是心理上的，也可以坦然应对。比如，今天美国国会确实有很多涉华经贸法案，听起来很吓人，但多数并没有通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政治表态与对外政策选择在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国会议员们在提出议案时，更多是响应所在选区选民及利益集团压力的一种政治宣示，宣完示表完态往往万事大吉；即便想认真贯彻落实推动其最终立法，其冗长的过程及总统的否决完全可以使之功亏一篑。因此，议案之多与其说是针对中国的具体动作，不如说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宣泄。

今天中国真正面临的压力是美国逼中国尽快、大幅开放金融、保险市场的压力。一是因为这是继压中国第一、第二产业开放之后的第三波压力，同时恰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必须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表面上构成一种“合理的政策压力”；二是因为美国政府以“人民币升值”及国会议员的不满为筹码，对中国形成某种“国内政治压力”；三是因为金融、保险等行业恰恰构成今天中国发展的软肋，牵一发动全身，关系股市、汇市、房市。一旦因开放不慎而出问题，有可能会出大问题，而这反过来符合美国部分人借此迟滞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因此对中国形成一种“战略压力”。

如何减缓这一压力？金融专家们自有他们的答案。但从战略角度看问题，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不构成根本战略利益的冲撞，而是相对收益的竞争。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方向问题，而是速度问题。具体言之，汇率自由化、金融开放原本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美国的压力我们原本也要往前推。只是因为准备不足、能力不足、信心不足等原因，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和时机。而

基于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恐慌和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应对乏力，美国则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今天就做”。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应对这类压力，除了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管道继续增信释疑外，更重要的是增强信心、加速准备、提升能力。否则，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行事，有可能使得美国借金融手段迟缓中国崛起步伐的战略得逞。

其实，中国真正的压力来自我们自身。提高执政能力是关键，尤其是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中央与地方的政令执行、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共处等三大能力建设。而这是牵扯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乃至中国大战略的问题。中共十八大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铺开，表明中国正全力以赴，正面迎接并积极化解上述压力。

中国外交需谨防大战略失误

在善于化解压力的同时，最需避免大战略失误。冷战后，相较美俄日欧，中国是唯一没有出现重大战略失误的大国。这正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政治社会总体稳定、国际环境明显改观的重要法宝，是中国从“发展中大国”跃升为“崛起中大国”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成功抓住21世纪第一个10年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

然而，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年，中国外交与国家安全形势却骤然遭遇波折，主要表现为：中美关系与中邻（周边）关系同时趋紧，不仅中美关系、中国与邻国关系转圜艰难，而且美国和邻国联手压中一面十分突出；内外两个大局的联系更加密不可分，维护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的双重任务同时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与意志；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涉华“不可测事件”频频干扰甚至冲击既有外交布局；对外

政策精英之间、精英与民意之间在重大涉外问题上立场差异明显，使对外科学决策的难度明显增大。

一路迭奏凯歌的中国外交为何突然麻烦不断？是偶然的还是有必然性？各方显然认知不一。美国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认为，主要问题出在中方自己，认定是中国外交突然表现出的“强硬”“傲慢”“僵化”导致中美关系重现紧张，导致中韩、中日、中越、中菲、中印关系普遍倒退，不是别国在遏制中国，而是中国自己在遏制自己。

而中方则倾向认为，是美国的战略调整尤其是战略重心东移使然。美国战略调整打乱亚太既有格局，挑动相关国家对华强硬，牵引中国周边国家对华作乱。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美国正在用外交、军事、金融、政治等综合手段全方位遏制中国，对华构筑战略包围圈。还有人认为，美欧等“西方阵营”再次祭出冷战时期惯用的意识形态手法，对华启动新一轮打压。原因无他，无非是中国已在经济上升至“第二”，外交上更加自信，军事现代化明显加速，美国及西方又开始有了战略紧迫感。

于是，如何判断形势就成为下一阶段对外战略规划的关键。以错误的形势判断为基础去勾画战略，只能犯战略错误。而从国内媒体、民意及某些精英的言论看，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真有将中国引向大战略失误的风险。那么，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冷静思考可以发现，今日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矛盾其实是中国地位上升与四个方面的落差、不适应或滞后之间的矛盾。一是地位与实力之间的差距。中国经济崛起与政治影响上升，充分显示中国的国际地位已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进入世界级大国俱乐部的中心位置。但中国的真实实力却与国际社会感知的中国国际地位不成正比。比如，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繁荣与环境、经济力与军事力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均衡性；中国总体而言，还是个十分贫困的大国；中国的外部光环并未完全投射到广大的民众日常生活中。

这些使得中国在昂首迈进世界级大国舞台中央的同时，不得不依然将主要资源和精力倾注于内部事务，从而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外部世界所期望发挥的作用。这给国际社会留下中国“逃避责任”“哭穷”“自私”的骂名。

二是地位与认知之间的落差。集中体现为关于“中国是谁”这个老话题，在经过过去几年大讨论之后，居然重新回到原点，即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大国”。这一立场原本没有问题，却忽视了当前中国身份的多重属性。比如，至少中国也是典型的“崛起中大国”。“发展中”与“崛起中”虽只程度区别，却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和战略观：前者意味着我们依然可以继续沿用过去30多年的战略方针而不做大的调整，后者则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适时调整不合时宜的战略与策略。对自身实力地位缺乏全面、客观、准确的认知，或者自我认知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脱节，就会出现两套话语体系不兼容甚至矛盾对立的局面。

三是地位与心态的不协调。中国目前所处的多重而复杂的地位，原本需要我们格外谦虚谨慎、韬光养晦、低调做人，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抵御金融危机等连番成就，不自觉地搅动13亿中国人五千年文明的自豪感、百年受害的屈辱感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感同时发酵，呈现出一种既自豪又敏感、既自信又脆弱的混合心态，导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主观认识偏差。

四是地位上升与战略滞后的矛盾。也即，崛起中大国的地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世界级大国的地位，却是区域性大国的战略；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与国内环境，却是异常分散且零散的战略。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多少有些对未来大战略目标的迷失，对国家利益界定的泛化，以及对国际大势判断的粗线条。

目前，那些曾经犯过大战略失误的大国一个个变得聪明起来，美国玩起“巧实力”，俄罗斯集中搞“现代化”，欧盟联合自强同时均衡发

展对外关系。对此，中国只能变得更加聪明，而绝不能犯大战略失误。

而要避免这一结局，需要全面反思前几年中国外交的经验教训和得失，从中汲取营养，对既有战略进行调整、充实、升级。首先，坚定不移地进行内部实力基础的再造，包括金融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将西部大开发落到实处，弥补国富民穷的差距，根据自己节拍提升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实力，只有做到实力与地位的真正吻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次，调整我们的认知和心态，戒除盲动与虚高，培植理性、健康的大国胸襟，继承祖辈谦逊、中庸、韬晦的文化精髓，同时勇于作为，奋发有为，以适应地位和角色变动。最后，加速新时期大战略的谋划。这是历史的呼唤，已由不得我们以各种借口拖延或阻滞。毕竟，我们有过成功指导中国3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大战略。

---

1. Joseph S. Nye, Jr.,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4 Issue.

第三部分 战略谋划

第七章 美国要改造世界?

美国在实施其全球战略时，向来是战略手段灵活多样，区别对待不同类型国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美国依据是否融入国际体系、是否走向民主、是否有利稳定等综合标准将世界主要力量划分为四类：一是欧日等圈内国家或同盟国家，二是被边缘化的国家（如一些非洲贫穷国家），三是游离于圈外的所谓“无赖国家”或曰“失败国家”（如伊拉克、朝鲜等）；第四类是所谓“转型国家”，根据美国各种战略报告的解释，就是指正在朝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迈进而前景仍不明朗的国家。按照领域或功能分，美国有军事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等等。“9·11”事件后，反恐显然成为美国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奥巴马上台后，则力推亚太再平衡战略。

转型国家与美国的战略

在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设计中，如何应对转型国家一直是重中之重。而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国家，是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个大国。注

俄罗斯、中国、印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其人口接近世界的2/5，领土面积超过世界的1/4，市场潜力占世界的一半，还都是核武国家和军事强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将三国均划为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另两个分别是法国和德国），即“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利益的国家”。注

在美国现代历史上，三国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要冲或必须最后攻克的堡垒。但是，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争霸的掣肘，冷战后由于调整同盟关系而分心，美国无力对三国采取系统、有效的战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俄印三国全面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并实现国内政治西方式的民主化，那几乎就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总目标的大功告成。相反，如果三国不听使唤，有意与美国为难并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则预示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功亏一篑。

在美国看来，三国未来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印度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军控领域的我行我素。1998年印度连续5次进行核试验，着实给美国军控及核不扩散政策当头一棒。美国许多人认为，印度在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已经是个核大国后，南亚地区爆发印巴之间的核战争并非完全不可能。㊟对美国政府而言，麻烦还在于，在亚太其他两大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美国或多或少都能够介入甚至可以居中搞平衡。但在南亚印巴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却有心无力，难以插足。这就更增添了美国对印度不确定性的担忧。二是政治民主的不成熟性。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总干事肯尼思·罗思曾经这样评价说：“印度具有一个民主国家的许多特征。但是在边际人口以及明显的安全威胁方面，如果认识不到其政治制度天生的缺陷而把印度看作一个民主国家就显得太轻率了。”㊟

俄罗斯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战略前景三个方面。对于俄罗斯政治经济，布热津斯基有一段形象的比喻。他说，俄罗斯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组成的大杂烩”。㊟对于普京上台俄罗斯推行“重振雄风”的大国战略，则给美国带来另一种意义上的不确定。

相比较，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感最强。虽然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疑问，但对今后中国如何运用日益增长

的综合国力却存有疑虑。未来的中国是更加亲美还是更加反美？是更愿融入国际体系还是更具威胁性？是继续保持共产党的执政还是会逐渐走向多党制？是有耐心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还是急不可耐地用武力实现统一？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朝野各派可以说无一例外地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

除了三国各自具有的不确定因素外，美国还有一层更大的担心，那就是三国有朝一日可能结成反美战略联盟。尽管中国一再重申其外交原则之一是不结盟，俄罗斯前外长主张建立中俄印"铁三角"的设想只是昙花一现，但美国却总将此事挂在心上，难以真正安心。

美国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中俄印三国在人口和地理上都是超大国，又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在多极化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理念相近，在国际舞台上也不乏合作协调事例，这些足以让美国忧心忡忡。于是，如何处理与转型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化解其相互结盟的潜在可能性，成为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工程。

针对上述情况，美国确立了两个层次的战略。一是对三国总体执行建设性接触政策，希望通过分别加强同它们的交往，引导其未来发展方向，尽量减少其不确定性；二是在三国之间实行分而治之、以邻制邻战略，防止其越走越近，结成反美联盟。

建设性接触可以说是美国对转型国家的战略总方针。之所以搞建设性接触，而不是采取遏制政策，原因有三。第一，在美国，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战略学家都逐渐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对付像中俄印这样的大国，遏制政策难以奏效，且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何况有限的经济制裁也不见得能发挥作用。近年来，美国国内围绕对外经济制裁问题展开过多次大辩论，多数人的结论是，制裁和遏制作为冷战时期对外有效的实用工具，在今天已失去了明显的效果，尤其是用来对付大国，因此应当变制裁为交往，变遏制为接触。

第二，美国具有政策影响力的人士认为，转型国家的不确定性存在很大的可塑空间，如果美国战略运用得当，在防范之外施以建设性接触，有可能使其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三，美国判定转型国家（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一时还难以对美国构成真正威胁，因此现阶段不必提前对其进行遏制。美国战略的一个基本设想是，先扫清外围，再集中精力和资源处理最麻烦、最难以应对的转型国家问题。因此，在外围完全扫清之前，通过建设性接触政策稳住转型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重转型国家，不失为最佳战略选择。比如，美国在巩固和调整同盟关系、制服所谓“无赖国家”、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诸多方面，还有赖于转型国家的支持。

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美国一度与三国分别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以北约—俄罗斯和平伙伴关系为先声，美国于1997年同中国建立了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于2000年同印度缔结了新型伙伴关系。在美国看来，和中俄印等转型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同与欧日等冷战朋友巩固同盟关系，是其新世纪全球战略的两大支柱。二者功能虽然不一，地位却同等重要，㊟二者都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服务于其全球战略总目标。

实际上，美国决策者们很清楚，上述伙伴关系只是一个虚幻的框架，却具有十足的战略价值。因为在这些框架之下，美国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其他更紧迫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不对称性威胁问题；也可以在棘手的问题上，寻求转型国家的支持，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需要中国的配合和合作。

美国对转型国家战略的另一层内容就是分而治之，防止其相互结盟。在美国的外交传统中，地缘战略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冷战后出现的种种大战略思想看，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并影响美国外交实践的，既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是福山的“历史终结

论”，而是以基辛格《大外交》和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为代表的“地缘战略”思维，包括“以邻制邻”“海外制衡”（offshore balance）战略等。其中心思想是，美国应在中俄印之间努力谋求这样一种格局，即“使各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高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中俄两强或中俄印三强联合对抗美国的局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美国的这一战略有所成效—就双边关系的实质意义来看，美中、美俄、美印关系确实要高于中俄印三国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但最近两年，尤其是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及插手乌克兰危机，导致中美俄三角关系出现重大变异，使美中、美俄关系同时趋紧，而中俄关系则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一明显有违美国大战略传统的新态势已经引发美国朝野对奥巴马政策的批评，未来如何调整，还有待观望。

“失败国家”与美国的解决模式

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发明了几个很恶劣的词，诸如“无赖国家”（或译“流氓国家”，rouge states）、“正在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s）、“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等等，用来形容美国的敌人或美国欲除之而后快的国家。对这类国家，美国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拔掉或改造。但美国的战略则不尽一致，难以一言蔽之。

应该说，就大战略目标来讲，美国改造世界的模式只有一种，即美国模式。其构成要件大体包括多党政治、直接选举、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市场经济、民族自决等。冷战期间美国不遗余力地搞垮苏联，冷战后美国保守派人士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固执地抱持疑虑，说白了，就是不容许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发展出一套与自己不一样的模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但是，大战略目标的简单划一并不排斥在具体做法上采取因地制宜的多样化战略。相反，美国恰恰最善于以多样化外交应对多元化世界。比如，冷战后，美国对欧日盟国采取巩固、充实、提高的笼络战略，对中俄印等转型国家采取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战略，对非洲、拉美等边缘化的国家采取见缝插针、乘虚而入的抢占、渗透战略。而对其最头疼也最急需应对的所谓“邪恶国家”或曰“失败国家”“无赖国家”等，美国则发明了科索沃、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利比亚、缅甸、中亚等七八种形式各异却又异曲同工的模式，以图有的放矢、各个击破。这些模式既有当年改造日德的影子，又有推陈出新的创举；不乏成功的案例，也有明显的败笔。

科索沃模式。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理论包装，首先将一国国内问题国际化，然后伙同北约盟国，绕过联合国，以绝对的军事实力将一个既未对外采取军事进攻行动又无侵略意图的主权国家推翻，在联合国托管基础上，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新政权。

东帝汶模式。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在联合国干预和多国维和部队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基础上，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权。

阿富汗模式。以反恐为名，以国际反恐联盟为依托，在迅速实现军事胜利之后，和阿富汗各派别召开战后组阁会议，迅速组建由阿富汗人组成的临时联合内阁，推举亲西方的卡尔扎伊为联合政府的首脑。在战后重建过程中，美国没有采取一国独大、全面主导或者军事管制方式，也没有改造或修改阿富汗的宪法与政体，而是由阿富汗自治政府自己领导解散地方武装、修改宪法、巩固中央集权。美国则以配角的身份从中予以指导，并协助争取国际援助，以稳定阿富汗新政权和国家政局。

伊拉克模式。不顾联合国决议和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的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萨达姆政权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基地组织”挂钩，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对其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并最终占

领。然后，在十几万多国部队监管下，以推倒重来的方式，完全解散原政府和最大的政党复兴党，在美英占领当局监控下开始战后重建过程。并希望以此为样板，揭开民主改造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序幕。

利比亚模式。杀鸡儆猴，先礼后兵。挟军事占领伊拉克和生擒萨达姆的余威，搬出联合国相关决议，并以微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补偿，逼使利比亚主动、单方面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然后伺机以武力推翻政权，达到战略目的。

巴勒斯坦模式。以经济援助和协助实现建国目标为诱饵，号召巴勒斯坦人民更换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以期达到树倒猢狲散的效应，一劳永逸地解决巴以争端。这一赤裸裸的逼人下台策略公开见诸小布什提出的“新中东和平计划”中。

缅甸模式。以暗中支持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的方式，鼓动并支持缅甸反政府力量，逼迫缅甸军政府实现权力分割。然后再恩威并用，将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

中亚模式。以军事进入为契机，以经济援助为先导，借与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的合作，渐进式地对中亚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民主化”改造。不求一夕改造成功，但求在此世界地缘、能源、战略要地保持存在。

古巴模式。全方位经济制裁、政治高压和外交封锁，数十年如一日。尽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但为美国主动释放善意改善关系积累了条件。美古关系之所以能走向正常化，绝非偶然。

美国缘何会发明出如此众多的模式并一一将其付诸实践呢？首先，这当然归因于其超强的实力以及与其相应的战略能力。其次，也是更直接的，则归因于美国决策层背后有一批强大的智囊机构为其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以阿富汗模式和伊拉克模式为例，早在“9·11”之

前，围绕所谓“中东改造战略”，兰德公司的中东研究和反恐研究项目、布鲁金斯学会的萨班中东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华盛顿近东研究所以及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等众多有影响的思想库，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其中美国保守思想库“美国新世纪计划”和“企业研究所”更是美国“中东改造计划”的直接策划者。

可以说，正是美国大批智囊机构这种深入的研究和对时事的紧密关注，才使得美国能确保按照既定方针改造他国。那种认为美国人其实没有什么战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以所谓“科索沃模式”为例。在克林顿政府发动军事轰炸之前，美国各思想库即在系统研究并炒作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民主和评论”等新主权观，并最终由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思想库包装成一套轻易难以攻破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北约绕过联合国拿下南联盟奠定了道义基础。

而像中亚模式、缅甸模式等的运用，显然与冷战后由中情局和国防部策划、委托多个思想库进行的所谓美国如何应对“失败国家”的课题研究有关。

总体看来，美国炮制出的种种模式在实践中是有所得手的。像所谓“科索沃模式”“阿富汗模式”“东帝汶模式”“利比亚模式”都大体奏效。其成功的经验大体有三。一是师出有名，比如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的科索沃模式和以反恐为名的阿富汗模式。二是国际支持或至少是盟国支持。阿富汗模式、东帝汶模式之所以成功，有赖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科索沃模式得手，也仰赖于北约的集体支持。三是高压奏效。典型的例子就是利比亚模式。

但是，上述模式中不乏失策之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伊拉克模式。从目前局势看，伊拉克模式之所以前景不妙，也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第一，师出无名。正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揭示的那样，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伊拉克也没有发现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缺乏国际支持。即使如法国、德国、土耳其等美国主要盟国，也站在了反对立场。第三，目标过于宏大。美国希望将伊拉克模式树立为整个中东改造的样板，显然只是一厢情愿。

美国的反恐不归路

“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毫无疑问是美国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中东则成为地缘战略的新重点。应该说，在反恐初期阶段，小布什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策果敢，不仅赢得美国朝野好评，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布什成立国土安全部、北方司令部统合本土的反恐工作，组成国际反恐联盟，将国际焦点锁定反恐这条主线，军事打击阿富汗，一举歼剿“基地组织”大部人马等，迅速树立了战时总统的正面形象，走出了法院判出来的总统的阴影，民意支持度一度超过80%。国际社会也纷纷期望以联合反恐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媒体称“9·11”使布什因祸得福。

但福兮祸所伏。以2002年《国情咨文》为转折点，布什以后的反恐开始逐渐偏离轨道，使国际反恐的良好开局没能有效持续，使美国并未摆脱恐怖主义的幽灵。

一是反恐扩大化。挟阿富汗战争获胜的余勇，布什一面抛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将与恐怖主义本无多大关联的伊拉克、伊朗、朝鲜三国划归异类，一面又给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从而将打击面无限扩大，也就难免自我树敌、疲于应付。伊朗问题、朝核问题、以巴冲突、印巴冲突等地区性问题再次升温，莫不与这些反恐扩大化政策相关。

二是反恐方式强硬有余、柔性不足。伊拉克战争在没有找到充分证据、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没有赢得主要大国支持、没有争取国内

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顶风而上，即是最好例证。其结果，尽管不到两个月布什即宣布战争结束并最终生擒萨达姆，但军事占领后的伊拉克却是十足的烂摊子，更是国际不稳定的新源头。

三是过多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他国利益。体现在：以反恐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双重标准，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是恐怖分子所为，针对别国的恐怖活动就不一定；一箭多雕，在反恐的同时，兼顾传统的地缘战略、能源战略、西化战略，借机抢占世界地缘、能源要道、重地，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

美国在反恐战中之所以偏离轨道，根本原因在于，小布什政府在反恐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动作在酝酿和实施，那就是构筑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谋划新的军事战略布局。

新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先发制人，它也是“布什主义”的要旨所在。这是对美国自“二战”后即奉为圭臬的遏制、威慑战略的一次革命性突破，也是对克林顿时期人道主义干预论的发展。与遏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更讲求军事实力的首先使用与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范、二次反击，即凡是被认定可能对美国造成安全威胁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美国有权对其进行先发制人式的军事打击，就像伊拉克战争所展示的那样。

与人道主义干预论相比，先发制人更强调实力的绝对重要性而较少顾及所谓伪善的“道义”束缚，因而也更具危险性。作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个重要手段，先发制人本身无可厚非，但布什政府将其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扩展至针对非恐怖主义威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就非比寻常。比如，受此影响，其他一些大国群起效法，也都相应提出了自己版本的先发制人战略。这样一来，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国际关系所确立的基本准则就面临重大挑战。再如，一些被美国视为异己的弱国为防止遭受先发制人式打击，只好铤而走险，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下功夫，从而造成国际局势新的不稳定。

新军事布局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强调军事实力在美国综合国力中的绝对重要性。为此，大幅增加军费、提高军人待遇、加速军队信息化转型、正式上马导弹防御体系实战部署等。

其次，对美国全球驻军进行全方位大调整。包括：分别撤出驻德国、韩国驻军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在中东欧地区建立新的基地、派驻新的军力；巩固在中亚地区的现有基地和驻军；调整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完成基地中心从沙特向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等新中心的逐渐转移；提升日本、关岛在美国亚太驻军的战略地位，等等。如此，自中东欧到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这条所谓的“动荡弧形地带”，成为美国新的军力部署的关键区域所在。

最后，灌输“实战第一”的新理念。中心思想就是实现海外驻军的高效、小型、灵活、多元，从而成为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实战型队伍。

布什战略调整的另一项重大工程，即是重塑大国关系。布什是以大国关系的颠覆者姿态上台的，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撕毁涉及欧盟利益的诸多国际公约，搅得周天寒彻。“9·11”事件为布什提供了重塑大国关系的契机。为攻克恐怖主义这个更危险、更急迫的敌人，布什放下身段，主动缓解与俄欧中等主要力量的关系。各大国为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抓住联合反恐的旗帜，改善与美关系。这种良性互动一度换来大国合作的少有局面，但是，这种互动给布什两点错觉：一是将大国合作反恐理解为大国支持美国的大战略，从而想当然地以为反恐扩大化仍会得到大国理解；二是认为大国合作与支持是无条件、无限期的，从而一味单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结果，伊拉克战争再次造成美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裂痕。

然而，布什团队自有其战略逻辑，使得其一路走来虽伴随骂名，却依然我行我素。其一，夸大威胁，赢得权威，为自己揽权。其二，以外乱养内安。布什多次强调：“如果我们放弃在巴格达的街道上作

战，我们将在我们自己城市的街道上面对恐怖主义。”这个逻辑几乎成了共和党支持力量的口头禅，也让许多美国民众将信将疑予以采信。其三，借合作反恐之名推进美国全球战略。一方面，让世界各国分担美国的灾难和风险，共同为“9·11”埋单；另一方面，得寸进尺，将各国对美国反恐的支持等同于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全球推进自身战略利益，因此左冲右突，罔顾别国意见。

其结果，布什政府不是采取直面失误、调整政策的办法，而是选择一条道走到黑，终于使美国陷入一场严重的战略困境。可以说，美国的问题不是出在实力上，而是出在战略上，是所谓“战略之困”；不是出在经济上，而是出在政治上，是所谓“民主之惑”。而“困”与“惑”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导致美国内政外交都出了问题。

首先，布什政府打破了经济、安全、民主之间的平衡，使历来支撑美国全球战略的三根支柱变成了“民主”独大的局面，结果独木难支，反而陷入民主的悖论。纵观美国战略演变史，促进经济繁荣、捍卫国家安全、推进全球民主自立国之初就是美国大战略的命根子。历届政府所做的，无非是在三者间寻求最佳平衡，分出轻重缓急，排个前后顺序。比如老布什将安全置于首位，克林顿则将经济作为要务。历届总统虽都高举民主大旗，却少有真的将推进民主置于维护安全、发展经济之先。

小布什的战略失误恰恰在于，他将推进民主从口号变成行动，并全面实施，以至于伊拉克局势未稳，就迫不及待推进大中东民主改造，上演中亚“颜色革命”，并试图对朝鲜进行政权更迭。强力推进自由民主也因此成为所谓“新布什主义”的政治标签。其结果，民主推进或者有始无终，如伊拉克；或者事与愿违，如巴勒斯坦；或者根本推不下去，如中亚一些国家。而原本相对稳定的地区秩序却因此大乱，中东、东北亚、中亚等地区几乎同时处于不稳定状态。诚如斯考克罗

夫特批评赖斯所言，“大中东计划”的最大失误，在于牺牲了中东地区半个多世纪难能可贵的稳定，以稳定换民主可谓得不偿失，并不符合美国的大战略。

其次，布什政府忽视了美国战略中相互制衡的基本精髓。作为远离欧亚大陆和中东要地、两面临洋的美洲国家，美国历来讲求所谓“海外制衡”“以邻制邻”，从而居中操控、从中渔利。老牌战略大师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等，都是玩制衡术的高手。布什和赖斯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一传统，或者说玩得并不娴熟，在中东问题上最为明显。伊拉克硝烟未散，美国又将矛头锁定伊朗，结果中东格局由两伊相互牵制演变成两伊反美势力暗中联手，造成伊拉克困局与伊朗核危机相互纠缠的恶性循环局面。

而在欧亚大陆一边，布什在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方面倒是动作频频，结果动机过于明显，行动过于公开，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倒促使印度与中国、俄罗斯同步崛起，并在崛起进程中相互增进关系，使欧亚大陆自冷战后首次出现全面繁盛之势。美国不仅因推进美印核合作而招致国人及世人指责，而且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目标更难实现。

再次，布什政府以民主给反恐开道，结果越反越恐。“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布什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布什第一任内，忙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沉迷于战争获胜后的喜悦，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其后，随着恐怖主义活动向全球蔓延，反恐形势再趋紧张，布什政府重新反思上述问题并终于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极端伊斯兰主义，或者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换言之，要想真正清除恐怖主义，必须以民主化为手段根除极端伊斯兰主义。

于是，反恐战争便演化成了一场21世纪的新的意识形态战争。问题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虚无缥缈，既无核心国家为附着物，又无明确

思想内核，将其定位为民主自由的对立物，无异将打击目标虚拟化，从而几乎在打一场无法赢得的反恐战争。更严重的是，极端伊斯兰主义同温和伊斯兰主义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限，结果，在伊斯兰世界人民的眼里，布什政府无疑在挑起文明间的冲突。由此，布什的反恐战争也因民主而陷入迷惘。

最后，让美国引以为豪的府会制衡传统也出了问题。要么府会一个鼻孔出气，共和党主控的国会给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开绿灯；要么相互抬杠唱对台戏，民主党全面获胜的新国会摆出一副要全面纠偏的姿态。布什有意同新国会缓解关系，以期共谋对策摆脱困境，但其骨子里并没有做好做大手术的准备，只想修修补补，因此并不遂民主党之意。民主党一方面表示要恢复国会对政府制衡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未必愿意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真心诚意同布什政府合作。

美国真正要走出困境，必须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尽快调整战略，二是重新认识民主。这正是其后奥巴马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

“埃及变天”与美国的应对

美国在应对“阿拉伯之春”时所采取的战略，在“埃及变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埃及的穆巴拉克总统居然稀里糊涂地被“和平”地赶下台，锒铛入狱，使西亚北非变局越发扑朔迷离。美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埃及变天，原因至少有三点。其一，经济上疏离全球化、政治上背离民主化、外交上走向边缘化、社会上拥抱网络化是此次革命的最深层原因。百万人涌上街头，与其说是对穆巴拉克不满，不如说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绝望。在全球化、民主化浪潮中，曾处在同一起跑线的亚非拉大国，均迎接变局、实现崛起。唯埃及反应迟钝、麻木不仁，

经济上不思变革，政治上落后腐败，外交上无所作为，与世界大潮格格不入。

作为曾经的阿拉伯世界领袖，埃及在阿以冲突、伊拉克战争、伊核危机等重大问题上政治失声，影响力甚至不如半岛电视台，成为可离可弃的鸡肋。相反，在网络化方面则“大门常打开”，脸谱网、推特畅行无阻，各种西方思潮肆意渗透弥漫。这种拒斥全球化、拥抱网络化的错位政策催生经济僵化与社会异化的怪现象，令表面平静的埃及终于在沉默中爆发。

其二，政府对“公民社会+微博时代”催生的社会剧变敏锐度不高、重视度不够、应对无方，终致未能挺过最后一关。公民社会现象是当今世界大潮。体现在埃及，则是后伊斯兰主义一代的崛起与军队的异化。此次埃及革命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青年人革命”或“军队起义”，引人深思。长期以来，无论西方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在看待中东年青一代时，更多关注其反美、反西方的宗教极端化一面，却忽视其反独裁、要民主的一面。

事实上，近30年来，头巾、清真寺、宗教电视频道的背后，已然涌动着深刻的社会变化——年青一代由于受到更好的教育、掌握更多的信息、拥有现代通信手段，对宗教与政治的认识已远不同于父辈。面对政治腐败、高失业、社会地位下降，他们缺乏民族尊严，对国家前途一派迷惘，不再把伊斯兰视为一种能够建立更好秩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上他们虽为伊斯兰主义者，政治上他们热衷“民主游戏”。正因此，他们虽无共同政治目标，却在对国家、政府、人生的认识上同气相求，往往一呼百应，形成集体效应。与此同时，长期受美国军援、培训的埃及军队，也异化为一支“和平队”，在政府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选择与街头民众站在一起。事已至此，穆巴拉克退场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三，过分相信同美国政府结成的特殊盟友关系，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外来势力之手。诚然，埃及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支柱，长期是美国扶植和支持的力量。但此一时彼一时。穆巴拉克未能敏锐把握美国对埃及政策的微妙变化。

一方面，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廉颇老矣”，对中东政治影响式微，对美战略意义下降。相反，埃及社会中爆发出的民主力量无意中调动了美国战略中的民主化神经，美国弃废子、布新局可谓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美埃特殊关系又有两面性：既有美国笼络扶持穆巴拉克政府为美所用的一面，也有暗中扶植军队亲美力量、支持社会变革力量、推动青年革命力量的一面。穆巴拉克对美国有剩余价值时，美国会强扶不使其倒；一旦剩余价值用完，美国则听任已然壮大的民间力量发挥作用。

奥巴马政府在埃及变局中经过冷静观察和审慎评估，最后决定“弃穆”，充分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冷酷的现实主义色彩。

一般认为，美国并非此轮中东变局的始作俑者。从其最初始料未及的反应看，美国倒更像是个受害者。但从接下来的种种言行看，美国的战略应对却有条不紊，有的放矢，这又多少让人觉得美国的战略意图并不简单，至少显示出特有的危机反应和战略调整能力。

这种战略反应的最重要结论，即是奥巴马政府倾力而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因埃及变局而松动。原因在于，战略重心东移是奥巴马政府对当前及未来国际局势、亚太局势、国家利益综合评估后做出的战略判断，是基于世界权势东移、美国经济复苏、应对大国崛起、重塑盟国体系等综合因素做出的战略抉择，事关美国全局和霸权未来，在美朝野有共识，不会轻易因中东变局而改弦更张。

既如此，难道美国甘心看到中东格局之变冲击美国战略利益？也不是。如果说在埃及变天的最初几天美国确有些无所适从，在要民主

还是要稳定之间犹疑不定，那么随着事态发展的明朗化，美国的战略应对也逐渐明晰起来。

概而言之，一是坚守战略底线不动摇，千方百计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确保石油的自由流动、确保继续主导中东格局；二是灵活运用各种资源，利用外交舞台笼络大国合作，调动民间力量（及反对派）进行内部制衡，慎用军事力量防止易进难出；三是区分轻重缓急、分层管理，拟定弃穆（巴拉克）、护巴（林）、攻卡（扎菲）、压伊（朗）、稳沙（特）政策方针，环环相扣。

其中最为根本的一点，是美国战略界在经过全面评估后，认定了中东政治的一个新现实：与其继续维持同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无所作为、被全球化抛弃的专制政权，不如选择同公民社会催生出的新的民主力量加大接触，寻求新的战略稳定。这一过程虽然是漫长的，但其收益却是十足战略性的。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决意已定，但中东变局确实也令其分心。如何既抓重点，又顾两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亮出了一张新牌，那就是大做网络自由文章、重炒自由民主话题，将地缘战略变局引向政治社会变革，矛头直指美国民主化战略力图改造的对象。

如何评估中东变局的利弊？从中东视角看，此轮变局攸关全球油价、影响地区稳定，各国莫不深受其害。但对中东石油依赖度更高、对该地区投资更大的中国而言，短期内挑战似乎远大于机遇。从阿拉伯世界视角看，此轮变局可视为阿拉伯世界的又一轮政治觉醒，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化诉求与反西方反美国的伊斯兰化色彩相互交融，给国际政治多极化无疑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点对中国倒不失为机遇。从非洲视角看，苏丹、突尼斯、埃及松动了整个北非地缘板块，并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造成冲击效应，其对中国在非洲长期形成的政治资源和近年急剧扩大的海外利益不啻构成新挑战。由是观之，中东变局对中国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更重要的是，能够实实在在抓住并转化为战略利益的机遇才是真机遇，否则就是假机遇。中国是否具备能力和战略准备去抓机遇？这是问题的关键。美国的战略应对给人的启示在于，或许中东变局对其全球战略布局和中东主导地位构成重大冲击，但如果善加利用，巧妙应对，化危为机，则未必不会重塑中东格局。

利比亚战事与奥巴马的心思

美国时间2011年4月4日上午，奥巴马正式对外宣布将谋求连任美国总统。就在同一天，美国决定不再派战机参与空袭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这是继此前将军事行动指挥权移交北约后美国的又一脱身之举。奥巴马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反应，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其“巧实力”战略理念。

作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首位在任期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多次公开承诺不对穆斯林开战的奥巴马，本不情愿在伊阿战事未了、国内经济形势刚见起色的情况下卷入又一场同伊斯兰国家的战争，遑论内阁成员意见分歧，战略界多反对之声，打不打卡扎菲并不攸关美国核心利益。但是前有法英盟国打头阵，后有人权高于主权的道德紧箍咒，身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容不得落后，只得首次以非领导角色参与军事打击。

奥巴马深知此举将招致国内一批重量级人士的批评，也可能断送与伊斯兰世界修好的战略设计，但开弓难有回头箭，只好边参与行动边寻求脱身，并为自己的政策选择进行包装。经过左右权衡，终于在开战十天后在美国国防大学对国内外发表演讲，以联合国授权、阿拉伯同意、非领导角色、多边行动、不出动地面部队等说辞，历陈军事行动的必要性、正确性与合法性，以最大限度降低国内批评、国际压力，体现关键时刻美国的特殊分量，并有意凸显与单边色彩浓厚的布

什主义质的不同。还有一层不便明言的心思，那就是，以配角身份在利比亚试验这种新形式介入，似也合乎以多伙伴和巧实力为核心内容的“奥巴马主义”的本意。

而事实上，真正促成奥巴马军事介入的原因，还在于中东局势的变异。从突尼斯、埃及漫卷开的中东波，一度让美国及西方精神为之一振，“大中东”民主化的战略冲动再度被点燃。殊不料革命浪潮戛然止步利比亚，眼见摇摇欲坠的卡扎菲非但不倒，而且几乎将西方看好的反对派逼上绝境。不强行将卡扎菲扳倒，不仅令美欧颜面扫地，而且将使中东“民主骨牌”效应受阻，不符合美国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朝野虽对奥巴马“打卡”多有非议，但反战声浪在美国终究未成气候。

但奥巴马深知美国的处境。与布什打伊拉克不同，当下的美国内有金融脱困、经济复苏重任，外有伊拉克撤军未果、阿富汗战局未了等难题，更面临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带来的深远挑战，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世界性问题也需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众人心思稳，不想再玩以军事手段搞政权更迭的政治游戏。

利比亚局势甚至中东变局同美国重振实力地位的大战略相比，孰轻孰重，奥巴马心知肚明。美国的战略重心是继续东移，还是回调中东，奥巴马也需再三权衡，否则只会落得个“收拾布什残局”的惨淡遗产。这不符合奥巴马一心改变历史的雄心壮志。

从奥巴马以配角身份参战，到关键时刻急于从战事脱身，美国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中的反常之举，与其说是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无奈之举。奥巴马摒弃单打独斗的强势作风，转而大玩“巧实力”，也是形势使然。

---

1.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 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00.

2.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3. [日]《每日新闻》，2000年8月18日。

4.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00.

5.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 1998.

6.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 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00.

7. 王缉思：“世纪之交的美国外交及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

第八章 奥巴马：太平洋总统?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喊了多年，但真正成为现实，始自奥巴马。奥巴马也因此被称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普遍被视为奥巴马任内最主要的外交遗产。对于这样一个攸关美国全球战略的大动作，究竟该如何评价呢?

两洋战略与重心东移

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形象地做如下描述：以美国自身为大脑或灵魂，以美洲大陆为躯干，以欧洲和亚洲为两翼，以欧洲的北约和亚洲的同盟体系为两大支撑，对欧亚大陆实行合围。因此，美国全球战略往往被简化为欧亚大陆战略或“两洋战略”。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如果不控制欧亚大陆，美国不过是两洋中的一个大岛屿而已。

美国是个从欧洲横跨大西洋、占据印第安人属地而新建的国家，大西洋两岸关系曾经是美国从殖民时期直到崛起时期绝对的重点。但大体从1898年美西战争（及大体同时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始，美国开始全方位进军亚太，太平洋两岸关系开始成为美国的新重点。美国卷入“二战”，也是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此后美国在太平洋和欧洲两个战场同时发挥重要作用。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构成主旋律，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冷战结束后10年，美国推进北约东扩、处理美俄关系，重心依然在欧洲。

大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国开始全面运筹战略重心东移。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1998年连续发表《美国东亚战略报告》，抛

出“亚太共同体”倡议，做足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和思想准备。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西线无战事”，战略重心东移具备重大现实条件，“重心东移论”在美战略界与舆论界掀起高潮。

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政府，亦准备加速实现战略重心东移。其竞选打出两大口号。一个是“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要涉及内政；另一个是“谦逊的国际主义”，讲的是外交。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收缩战线，削减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基地，加大亚太投入，被广泛认为其关注重点将明显向亚太倾斜。孰料“9·11”事件突发，完全打乱小布什政府的战略部署，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进程止步于中东和南亚。后来小布什在其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指出，他原本想当个“文教总统”，没想到却成了“战时总统”；原想当个“亚太总统”，没想到却当了个“中东总统”。

21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主要精力被消耗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上，对亚太关注力度不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随之弱化。

奥巴马上台前后，美国战略界就美国战略目标与重点等根本性问题展开大辩论，并得出至少两点结论。其一，反恐与应对大国崛起是美国长期面对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不可偏废。布什政府受到反恐议程拖累，顾此失彼，犯了战略错误。随着恐怖主义遭到重创，伊拉克、阿富汗渐被改造，应对大国崛起应成为下届政府的紧迫课题。其二，亚太是大国崛起的核心舞台，应是美国战略重心所在。亚太既是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决定21世纪全球格局的影响力中心，也是全球变量最大、风险最大的地区，注事关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而且美国深陷中东这几年，中印在亚太迅速崛起，东亚一体化如火如荼，日韩澳等盟国离心倾向加剧，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亚太应成为美国未来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区。

战略界的这些共识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安团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依据。奥巴马总统自称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反复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高调宣称重返亚洲，重返东南亚，誓言继续充当亚太领导角色。上任之初，奥巴马政府全面运用“巧实力”，努力修复美伊（斯兰世界）关系，重启美俄关系，巩固美欧关系，对“问题国家”实施“伸手外交”，适时调整反恐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作21世纪的诸多挑战之一，不再片面地从狭窄的反恐棱镜中看待世界，为战略重心全方位移师亚太创造条件。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任不足一月即首访东亚，成为过去50年来未将首访放在欧美地区的首位国务卿。奥巴马总统也在就任首年访问中国等东亚四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举行首次“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积极发展美印关系，将美印关系由冷战期间的“1.0版”、克林顿和布什时期的“2.0版”升级为全新的“3.0版”，在全球安全、人类发展、经济和科技等四个领域重点深化美印关系，并建立双方战略对话机制。对中国，强调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迅速确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新定位，将中美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强调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同舟共济，在中美长远合作方面殊途同归，实现奥巴马执政首年中美关系高开高走。

一句话，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即拉开战略重心东移的架势，预示着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向。

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四防”

奥巴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启动所谓“亚太再平衡”，推进战略重心东移，同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四防”息息相关。

一是防止任何单一大国崛起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亚太地区具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独特性，美国从未说自己是欧洲国家、非洲国家或中东国家，却一直以太平洋国家或亚太国家自居，认为自己不仅是美洲国家，而且是亚太大家庭中当然的一员。不仅如此，美国既谋求充当世界的领导，也不讳言要主导亚太。换言之，美国不仅要当“球长”，也要兼亚太地区的“区长”。因此，防止任何单一大国崛起挑战其亚太主导地位，就构成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是防止盟国体系崩盘冲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之所以能够身处美洲而主控亚太，在于美国在该地区拥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五大盟国，由此形成以美国为中心、以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为支撑的所谓“轮辐体系”，以此协助美国掌控亚太局势。换言之，如果盟国体系出了问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也就会随之丧失，因此，捍卫亚太盟国的安全一直被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三是防止域内一体化进程过快，排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美国战略界一直忌讳所谓“东亚”“亚洲”概念，也对任何没有美国的亚洲一体化持警惕和排挤态度。原因很简单，一旦排美的区域一体化成气候，美国不仅利益难以确保，而且显得像个孤零零的霸权。

四是防止地区热点失控干扰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虽自称为亚太国家，但毕竟是唯一超级大国，还要当世界领袖。因此，美国不希望诸如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局势失控，影响美国在欧洲、中东其他区域的既有布局。

应该说，在冷战后相当长时期，美国的亚太战略是成功的，“四防”基本上做到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一度崛起态势逼人，但最终被美国通过“广场协议”等手段遏制住了，没能从根本上挑战美国的

主导地位。通过与中国在“六方会谈”等平台上的合作，使朝核危机总体可控。台湾问题也始终没有成为引发中美冲突的突出问题。

但大体在奥巴马上台前后，由于美国深陷所谓“两场战争、一场危机”。从而多少疏于对亚太的经营，美国突然发现亚太局势正在出现明显不利于自己的重大变化，“四防”有全面失守之虞。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崛起尚处于美国同盟体系内的“茶壶里的风暴”，那么此时中国、印度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则是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的重大事件。尤其是中国崛起，从2001年小布什上台到2009年奥巴马执政，几乎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经济总量连续超法、超英、超德，由美国的大约1/8一跃升至约1/2，这种赶超速度在历史上从未有过。2010年中国超日而成世界第二，更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

面对这种态势，奥巴马的亚太政策主要顾问之一，后来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早就指出，反击恐怖主义与应对中国崛起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印度奏响东进序曲，俄罗斯拉开南下架势，中俄印还一度酝酿所谓“铁三角”。面对此，美国战略界普遍意识到，美国再不加大亚太投入，亚太很可能不再是美国人的亚太。

另一个更让奥巴马揪心的事态是盟国体系出现重大裂痕。在布什第二任期，一度出现中澳、中韩、中泰关系好于三国同美国关系的局面，离心倾向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盟国针对美国的共同趋势。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作为美国亚太战略基石的日本。福田政府倡导的所谓“共鸣外交”，强调日美同盟与日本同亚洲的关系必须对等，产生共鸣，而非将日美关系置于绝对优先地位。鸠山由纪夫政权更是毫不客气地对刚刚上台的奥巴马下了三道通牒：限时让美军从普天间机场搬迁，表示不再对在印度洋执行反恐任务的美军供油，披露美日核密约。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脱美入亚”态势，美国强势反击，以所谓“丰田门”事件重击鸠山政权，迫其黯然下台。尽管如此，日本这种公开挑

战美国战后体制的做法足以让美国吓出一身冷汗。盟国体系的加固因而成为促成奥巴马战略重心东移的重大动因之一。

与此同时，亚洲一体化进程也逐渐偏离美国预期的轨道。最为突出的是所谓“东盟（10）＋”模式。从最初的“10+1（中国）”到“10+3（中日韩）”，东亚经济一体化如火如荼，美国深感被排挤。及至东亚各国发起成立所谓“东亚峰会”，美国的孤立感达到顶点，因为首届东亚峰会从当初的“10+3”达到“10+6”（另外三个新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而居然还是没有邀请美国。美国呼唤的“亚太共同体”和者寥寥，而中日倡导的“亚洲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则已成气候，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美国思考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又一重大考虑。

当然，奥巴马极力推动的所谓“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或“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绝不只是对美国亚太战略处境的一种被动式反应，同时也基于对国内国际局势的深刻反思及对未来战略的重新布局。

一方面，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奥巴马的中心任务是拼经济。环顾全球，中东一片乱局，欧洲自身难保，能够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区域首选亚太。另一方面，一心结束两场战争、尽快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的奥巴马，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现实是，美国的兵力撤往何处？美国新的军事重点放在哪里？

综合评估，亚太是最理想的场所。从更深层次看，世界权势东移是显见的事实，中美战略博弈是迟早的事情，尽快完成亚太新战略布局，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经营，一箭数雕，可谓既是时势使然，也是时不我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奥巴马，自比别的美国总统更加感同身受。由他来领导美国在亚太进行所谓“再平衡”的布局，颇有几分天定命运的色彩。

奥巴马的“再平衡”

“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的某种浓缩，不是一次单纯的战术性转向，而是一场基于内外两个大局、凝聚两党基本共识、动用软硬两种资源、全方位推进的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东移。对于这场大变局，目前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但其基本内容和总体特征是清晰可见的。

整固同盟体系是奥巴马“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几年下来，收效也是最明显的。由于美国忙于国内经济复苏和海外战略收缩，靠一己之力重新在亚太赢得主导地位显然力不从心，巧借盟国力量则可事半功倍。为此，奥巴马花大力气重新将日本拉回美国的怀抱。其中2015年安倍访美期间签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具有标志性意义。该协议不仅实现了美日同盟的无缝对接，而且明确表示同盟的合作范围从区域走向全球，这是继1997年美日同盟调整之后美日关系的又一次飞跃式发展。它标志着一度处于离心状态的日本再度紧密地团结在美国周围。这恐怕是亚太安全格局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美国在拉回日本的过程中软硬兼施，其现实主义外交风格显露无遗。为达到目的，奥巴马不惜在钓鱼岛问题上无原则地偏袒日本，放纵日本将军力投向南海，并对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和酝酿修宪等重大动作睁一眼闭一眼。可以说，美国是在以伤害中国安全利益为代价，换取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固和提升。在可预见的将来，美日捆绑之势恐难松动。这是亚太安全格局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事件。

其他如美韩、美澳、美菲同盟关系，要么止跌回稳，如美韩；要么全面升温，如美菲；要么有新进展，如美澳。美韩通过正式建立外长与防长共同参加的“2+2”会议，签署《国防合作指针》《战略同盟2015》和《战略计划方针》等文件，解决了战时指挥权等棘手问题，确立构筑两国“21世纪全面战略同盟”，设立“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

全方位深化两国安全合作。近期，利用朝鲜第四次核试，达成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协议，使美韩同盟关系的军事色彩更加浓厚。美澳自2001年以来首次实现“2+2”（防长＋外长）年度磋商，将美澳同盟界定为美国“亚太战略之锚”，由此形成所谓“北锚”（日本）和“南锚”策应之势。美菲同盟在驻军、基地、军演、军售等方面全面推进，逆势提升。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提升盟国关系中善于巧借外力，纵横捭阖。如美韩同盟中的“天安舰事件”，美菲同盟中的“黄岩岛事件”，均为美国所用。

在同盟关系发展中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三边化”或“网络化”新趋势。其中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以“美日＋X”为平台的美日澳、美日韩、美日菲等盟国之间情报、技术、联演、作战协同，已成气候。

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另一突出收益，是美国不仅成功挤进东亚峰会，使“10+6”最终成为“10+8”（另一成员为俄罗斯），破解了区域一体化排挤美国之势，而且借壳上市，将几个小国发起的TPP为美所用，软硬兼施，诱压结合，最终凑成12个初始成员国，连本不情愿的日本也加入其中，进而使美国开始主导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因此，亚太地区形成一边是TPP一边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一边为美国主导一边为中国主导的二元对立经贸格局。

如果再进一步看“再平衡”战略，令奥巴马政府颇为自得的，恐怕是美国借南海问题全方位提升与越南的战略关系，并通过签署友好合作条约整体推进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美印关系也通过达成“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而进入所谓“3.0版”新阶段。美缅关系实现正常化并使美国力量历史性地进入缅甸。

如果再将美国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新军事部署以及“空海一体战”等新军事战略一并考虑在内，可以说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短短几年由谋划进入部署、由口头付诸行

动，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超出此前许多人的想象。也因此，该战略势必成为奥巴马执政期间外交上的最大战略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政府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几乎没有实质性投入，而是巧借区域内各种矛盾，更多通过舆论造势和外交布局来实现其战略目标。也因此，美国国内对其评价其实并不高。

福祸相倚?

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促使美国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性要素。奥巴马上台后的两件大事，使美战略界再度反思既有对华战略。一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崛起的中国”跃升为“老二的中国”，实力地位相对下滑的美国如何面对已经紧随其后的中国（而非一般意义上“崛起的中国”），成为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崭新课题。二是中国对周边辐射力和吸附效应增大，自信心提升，示强冲动强化，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结构性矛盾似乎进一步凸显。2010年以来，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密集过招、全面博弈，使美国深感“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似乎正在悄然改变韬光养晦外交、改革开放路线、和平崛起战略、建设性合作方针。如何“打掉中国的傲慢”成为美国必须考虑的大问题。这也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突出中国因素的直接动因。

可以说，美国实现与日本、菲律宾等盟国关系的大跃进，很大程度上是打中国牌的结果。而在TPP等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的色彩也很明显。问题是，奥巴马似乎并没有给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布局中的中国一个明确定位。一方面，这一切布局似乎明显将中国视作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从整体战略上并未做好与中国面对面战略对抗的准备。于是乎，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奥巴马并没

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因此，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对美国而言究竟是祸是福还未可知，需要时间去检验。

目前看，其战略虽有所斩获且得逞一时，但长期看，其中的短板或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如此无原则、无节制地拉抬日本，是否符合美国长远战略利益？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所谓“海外制衡”，即在日中之间奉行一种巧妙的“离岸平衡术”，阶段性地在日中之间近一个远一个，从而总体使日中关系服务于美国亚太战略利益。但奥巴马的“巧实力”则似乎走得过远，“度”如果把握得不好有可能反被日本所用。

安倍政权何尝不知美国借日制华的用心？之所以不惜以得罪国内农业等利益集团的风险加入美国主导的TPP，无非存有反过来利用美国实现自身战略目的的用心。日本敢于在突破战后体制、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等问题上铤而走险，不能不说与奥巴马的包庇纵容有关。一旦日本刹不住车，走向令美国失控的那一天，“巧实力”有可能最终弄巧成拙。毕竟，战后几十年美日之间控制与反控制、自主与反自主的根本矛盾依然深刻。日本要想拥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必然会最终突破美日战后体制。

美国惯有美日同盟是亚太战略基石的说法。但时移世异，在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全球性意义日益突出的今天，一味强调美日基石作用而缺乏对美中关系的明确定位，“再平衡”恐怕将是残缺的。如果说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基石的话，可否说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撑呢？总之，美日中三角关系如何处理妥当，考验着奥巴马及其后来者。

“亚太再平衡”的另一软肋是在其经济方面。奥巴马投入颇多颇深的TPP看似一路凯歌，但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初战告捷则似乎给其提了个醒。两相比较可知，TPP是对中国封闭的，至少现阶段如此，其

针对中国搞新的贸易规则的用心路人皆知。而亚投行则是透明开放的，从一开始中国即欢迎美国的加入，但美国并不领情，反而给盟国施加压力，阻滞亚投行的进程。结果显示，中国赢得了这场道义之战，而奥巴马则招致国内广泛批评。

这场经济上的战略较量显示，在全球化、区域化大潮中，继续玩冷战式、集团式的经济小圈子已经不合时宜也不得人心。更进一步说，即使TPP取得阶段性成功，一个撕裂的亚太经济一体化果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吗?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国是美国亚太五个盟国中除菲律宾外四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全球第二大、亚太第一大贸易伙伴，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最终价值几何?因此，在推进TPP进程中如何同时思考美中双边贸易投资协定（BIT），如何从更长远角度思考美中自贸区乃至亚太自贸区的构建问题，考验美国的智慧和胸襟。

随着2016年美国大选季的来临，美国朝野势必就“亚太再平衡”战略做阶段性的评估，但愿这次评估的结果能够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建设性的答案。

---

1. Evan A. Feigenbaum and Robert A. Mann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Asia”,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50, November 2009,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Asian_Multilateralism_CSR50.pdf.

第九章 变与不变：美国对华战略轨迹

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什么？这个问题历来似是而非，既清楚又糊涂，一直较为笼统。接触、遏制、接触+遏制、西化分化、规制、“颜色革命”……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总体看，从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两种思路、竞争与合作两个方面、软与硬两手，具有相对稳定性，只是阶段性的提法和概念不同而已。但如果以这样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去看问题，往往不易把握事物量的变化，从而可能使质变成为突变，不利于科学决策。因为从决策角度而言，最难的往往不是对事物质变的应对，而是对事物量变程度的细微分析。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

美国对华战略建立在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总体判断基础上。过去30多年，美国对华判断出现过多次失误，主要体现为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不断涌现，而最终都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觉。随后，美国不断调适，努力面对现实，新一轮对华战略调整仍未完全到位。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一度大肆炒作中国“经济崩溃论”。这种论调认为这次风波可能会使中国封堵市场经济大门、逆转改革开放路线，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但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成功召开，及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被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路线”的形式写进十四大报告，使美国战略界清醒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路线不仅没有逆转或停滞，反而步子迈得更大，决心更加坚定。自然地，“经济崩溃论”在美国理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那里不再有市场。

此后，美国开始炒作“中国政治崩溃论”。这种论调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推动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变迁，既有的政治体制必然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动摇，中共高层将陷入权力斗争。但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成功召开，中国最高领导集体实现权力和平、整体、全面的交接，不仅未使中国政治崩溃，反而使中国发展再上台阶，“中国政治崩溃论”不攻自破。

于是，美国将视野转向中国社会，开始炒作所谓“中国社会崩溃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社会、民族、宗教矛盾愈演愈烈，失业下岗、失地上访、群体事件等等，终究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2008年发生的人祸与天灾，使少数反华分子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的希望。于是，他们开始集中利用北京奥运，煽风点火、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企图缔造一个“后奥运时代中国新社会”。然而，在特大灾难面前，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社会动员力，中国改革开放30年累积的巨大财力、物力，中国人民迸发出的强大爱国热情、民族凝聚力，无疑再度宣告“中国社会崩溃论”不堪一击。

基于此，大体在2005年左右，美国朝野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一个不会崩溃而已成功崛起的中国，标志就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论”。其重要意义在于，美国从战略心理层面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且似乎认定，只要这种崛起是和平的，且不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有助于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美国大体可以接受，并愿意同中国成为共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利益攸关方”。[注]“利益攸关方论”还有一个未明言但更具实质意义的含义，那就是开始正面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过去战略上的敌视或排斥转向认为可以与之打交道。

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间的对华政策，总体沿着这一思想轨迹运行。奥巴马政府上台初年，也基本接过了这套思路，并且还有所推进，表现在：（1）在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上，奥巴马总统和希拉

里·克林顿国务卿多次强调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在对中国的战略期待上，从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发展到期待中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注（3）在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上，从“建设性合作”提升到“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注（4）在对中国的作用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认知上，提出“同舟共济”和“殊途同归”新思维；（5）在稳定中美关系的路径上，尝试抛出“战略保证”新构想。注

但就在美国从战略心理层面开始直面中国崛起的时候，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则一枝独秀，经济规模连续超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转眼间，美国要面对的已不是“中国崛起”的问题，而是“中国老二”的问题。这带有某种质的变化，令美国朝野猝不及防，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一时间，如何定位中国，如何看待美中关系，成为焦点。美国也因此变得战略自信下降，战略焦虑上升。

对华战略“三部曲”

依据上述认知轨迹，相应地，美国对华战略大体经历了“接触+遏制”—“融合+牵制”—“竞争+规制”三个阶段，它们构成美国对华战略“三部曲”。而目前，美国则处于对华战略的彷徨期，新的对华战略如何，恐怕要到2016年大选后才能露出端倪。

其中“接触+遏制”战略大体涵盖从中美建交到2005年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论”。尤其在冷战结束（美国人更倾向于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至21世纪初这段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中，接触旨在改变中国，遏制旨在孤立中国，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崩溃论”和“中国改造

论”。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成为西方顺势而为的主要对象。

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中国不行论”“中国统计掺水论”甚嚣尘上，美国加大对中国在人权、宗教、台湾、西藏、贸易等方面的高压态势。但另一方面，美国当政者也意识到，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之间有深厚的利益联系，必须通过全面接触促进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克林顿第二任期提出对华“全面接触”战略。

总之，这一时期，美国交替使用接触加遏制两手，但总体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5年和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考克斯报告”“李文和事件”等，表明美国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奉行得很不顺畅，中美关系也总是起伏不定。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也在阶段性调整或修正。大体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美国将接触的重点放在中国高层，旨在培植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但被证明失败。此后，接触的重心转向中产阶层。根据美国战略界的设想，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必定会成为中国变革的中坚力量。但事实证明，中国的中产阶级最终虽然得以形成，但他们大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维护者，指望他们改变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再往后，美国终于开始将接触战略的触角伸向中国底层或基层，从这个庞大的群体中，美国似乎看到了改变中国或中国自我改变的希望。

美国对华战略第二部曲即所谓“融合＋牵制”阶段，大体从2005年到2010年，贯穿小布什第二任期及奥巴马上台后第一年。该战略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崛起论”和“中国责任论”。由于中国崛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成活生生的现实，加之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渴求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美国开始思考以所谓“融合战略”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体系内借助中国的力量，同时约束中国的行为，使中国成为

美国主导的体系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如果说接触是低层次的交往，那么融合则是深层次互动。后者与前者之间的微妙差别在于，美国开始充分意识到，不能将中国始终当作异类简单交往，而应把中国作为可以合作的对象加以发展。但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心，美国还需两面下注，即所谓“牵制”，以防中国在体系内制造新的问题或麻烦。与此前的遏制相比，牵制则姿态相对柔和、手法更加灵活，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时俱进的结果。

进一步说，融合是软的一手，是接触战略在中国迅速崛起阶段的深化。它与接触战略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强大、奉行和平崛起的大国，美国无法围堵或孤立，而只能交往促变。差别则在于，融合战略是一种更深层、更主动的接触。如果说接触战略目标在于演变中国，融合战略则意在同化中国，引导中国向美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其中心任务是：在国际上，营造一个既能容纳中国崛起又能规范中国的全球体系，使中国不挑战美国；在中国内部，培育自我改造和自动适应外部的软环境。它实际上是融合、引导、接触、合作的总和。

牵制则是应对中国崛起硬的一手。它是遏制战略在新时期的变种，是在全面遏制不现实、被动防范又不心甘情况下一种可操作性的选择。目的在于给“融合中国”安上保险，对中国利益的扩展圈定界限，以防中国一旦偏离美国所期待的方向，美国能及时加以应对，强制性地迫其改变。与遏制的区别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封堵，而是在某些点、某些领域制造障碍、增加阻力，抵消中国影响的扩大，并在中国挑战美国利益时有办法予以回击。它实际上是遏制、牵制、限制、防范的结合。

大体从2010年开始，美国对华战略又出现某种微调。我把它称为“竞争加规制”。由于中美逆向发展态势以及双方围绕谷歌事件、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天安号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上的博弈，美国朝

野意识到，以己之力融合中国既低估了中国的意图，又高估了美国的能力。对于一个欣欣向荣、气势如虹的崛起中的中国，完全凭借美国的意志去融合之，确实力不从心。

于是，奥巴马政府更加强调固本强身，通过尽快恢复美国元气赢得同中国的战略竞争。同时，美国借助盟国和机制的力量，以集体的力量和规则的效应规制中国的发展，力争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实践证明，该战略在推回（push back）中国力量扩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美国对华战略不断向前推进的“三部曲”，一方面同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息息相关，即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势日渐明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及对全球安全的稳定阀作用日益凸现；一方面也是国际环境的变动使然，即全球化、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使得大国关系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的新特点，恐怖主义、自然灾害、致命性疾病等非传统威胁的凸显注定大国必须合作，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也容不得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制性塑造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应该说，中国自始至终敏锐地把握住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变与不变，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予以应对，确保了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一方面，中国坚持“两手对两手”的对美政策基本方针不动摇；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到融合的微妙变化，也相机分别采取了“建设性交往”和“建设性参与”政策，从而确保了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

而针对所谓“利益攸关方”的对华战略新思维，中国政府主动强调中美要加强建设性合作。中美不仅要成为利益攸关方，更要成为建设性合作者。再从大的视野看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时期更强调学习美国，江泽民时期更注重防范美国，胡锦涛时期则加速追赶美国。而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为标志，习近平时代对美政策则带有非常鲜明的塑造美国的特点。

从美国对华战略“三部曲”的发展演变看，奥巴马时期的所谓“竞争＋规制”与其说是战略，不如说是策略；与其说是主动塑造，不如说是被动因应。它之所以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美国对华认知出现了新的盲区，对于中国下一步究竟如何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内政外交新变化，突然失去了方向感。二是因为美国面对乌克兰、极端伊斯兰等多重危机——且是比中国崛起更加紧迫的危机，美国无法聚焦思考对华大战略。三是因为中美关系太复杂，无法用一两个概念去浓缩新时期对华战略。

随着2016年美国大选的来临，美国朝野掀起了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辩论，出现了“重塑对华大战略”的声音。其究竟是会延续既往“三部曲”再续新篇，还是会另起炉灶以新的范式处理美中关系？不妨拭目以待。但不论怎样，有几个基本层次是美国当政者思考未来对华战略无法回避的：

（1）中国崛起渐成或已成事实，美国无法阻挡，务实面对和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前提。

（2）对华奉行全面遏制既无可能，也不必要。说不可能，是因为美国实力和影响力减弱，国际各种危机挑战麻烦不断，遏制中国有心无力，而环顾左右，遏制中国也将和者寥寥；说不必要，则是因为中国不是苏联，中美利益纠葛太深，中国对美国也有合作和有利的一面。

（3）对华继续奉行接触政策是必然之举，但简单的接触已不敷所需。“接触”作为一个战略术语，指的是对有问题的国家采取交往而非单纯的围堵这样一类较低层次的沟通。当年美国决定对华奉行接触战略，前提是因为中国是可以打交道的。而今天的中国，对美而言已

从“可以打交道的国家”变成“必须打交道的国家”，已不是接触的问题，而是深度互动的问题。

（4）遏制虽不是对华战略主流，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没有遏制的成分。接触虽然已满足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需要，但其基本精神或基本面仍然存在。

（5）无论怎样，美国对华战略仍未摆脱一软一硬两手。所不同者，只是软硬两手的重点和程度不同。

根本而言，未来美国对华战略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如何应对一个13—15亿人口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等经济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以及对自身发展模式更加自信的大国所带来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挑战？如何应对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且军事现代化日益加速、维权意志和决心日益增大的大国，所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挑战？这三个问题显然都没有简单的答案，需要美国当政者用心、用脑，更需要解放思想、开阔胸襟，否则，对华战略势必走向死胡同。

美国对台政策

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美国对台政策。人们在分析美国对台政策时，往往存在一个误区，即将美国某届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对台政策甚至对台言论上升到美国对台政策的高度，并以此来分析判断美国的立场。这样很容易将期望值抬高或产生过激反应，从而造成战略误判。比如，克林顿执政时期，在对台政策上有许多新的说法或政策立场，最有名的当属1998年在上海宣示的对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需有主权国家身份参与的国际组织。当时台湾方面惊恐万状，大陆方面则认为

取得重大外交胜利。结果，台湾的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来对抗，美国国会则炮制《加强台湾安全法》进行反制。最后，克林顿的“三不政策”以夭折而告终。

小布什执政期间，这类情况也屡有发生。他在2001年上台之初，即明言“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并批准售台大宗武器。一时间，台海上空硝烟弥漫，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但仅仅两年后，同样是小布什，2003年12月9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公开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给正沉迷于搞“公投”的陈水扁当局一记重拳，这也被视为历届美国总统对台说的最重的一句话。再后来，在陈水扁搞“终统”过程中，布什政府似乎有表面施压、背后放纵之嫌；而针对陈水扁的“过境风波”，则似乎又给人留下美国在有意惩罚陈水扁不听话的印象。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美国的对台政策呢？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美国对台政策不是某届政府、某个政党的对台政策，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对台政策与美国对台政策有重叠或抵触之处，但不等于“美国对台政策”。所谓“美国对台政策”，应该是得到两党一致认可、超越党派利益、代表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经过长时间检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美国对台政策方针、原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根据这样的界定，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实际上包含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一个中国”政策。这是由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关键内容，也是中美建交和发展关系的基石。美国两党七届政府在这一点上都不敢含糊，因此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但是，美国的“一中”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中”版本不同。中国大陆称其为“一中原则”，含义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个定义为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采纳，被称为“新三句”，体现了中国政府尊重台湾对等谈判地位的诚意和务实精神。台湾方面的“一中”则十分复杂。民进党认为“一中”只是

议题而非前提。李登辉的“两国论”表明他认为只有“一中一台”而没有“一中”。国民党的“一中”显然是指“中华民国”。

反观美国，他们所指的“一中”，是政策而非原则，原则不容松动，政策则可适当更改；内涵则是美方认识到两岸双方坚持一个中国的事实，对此不表异议。换言之，恰如美国某些右翼势力鼓噪的那样，美国自己没有“一中”，有的只是对两岸坚持“一中”的一种认知或认可。由此可见，美国的“一中”政策具有某种脆弱性或不确定性。但这种脆弱性或不确定性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口头上或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会放弃“一中”，因为那将导致中美关系一夜之间破裂。

第二是所谓“和平解决”。这是由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国单方面炮制的《与台湾关系法》共同规定的。对于台海的未来前景，中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台湾当局要么梦想“和平独立”，要么表示“和平维持现状”。美国则表面上不设定最终立场，认为台湾的前途由两岸双方决定，美国不关心结局，只关心过程应该是和平的。实际上，美国认为最佳前景是和平维持现状，即两岸长期不统不独不战，美国居中制衡，谋取最大国家利益。这正是美国对台政策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相对安静的最重要原因，因为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框架同美国对台政策有高度契合之处。

第三是对台军售。这是由《八·一七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和里根所谓对台“六项保证”所共同规定的。根据《八·一七公报》，美国对台军售应采取逐年递减原则以至最终终止。而美国则以《与台湾关系法》这一国内法及“六项保证”这样的秘密文件作为政策基础，完全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并参考两岸局势的演进态势，单方面确定对台军售的规模、性质。在这一点上，美国两党各届政府是别无二致的。这正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在《八·一七公报》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根本原因。

撇开现象看本质，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就是上述三个支柱。美国对台政策还有一系列逐步得到两党共同认可的新发展，比如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支持台湾民主，不支持台湾独立”等。但它们尚未文本化，还停留在美国政府领导人的口头表态层面。

了解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内涵之后，再来看历届政府对台政策的某些微妙变化，就既能明了其限度，也可看出其突破。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加强对美外交工作。

---

1.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82.htm.
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3. 《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94969.html.
4. James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4, 2009. http://www.state.gov/s/d/2009/129686.htm.

第十章 “鹰”“熊”对决：美国对俄战略

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试图在超越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的大背景下思考、规划一套新的对俄战略。历经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任政府，美国的对俄战略在变与不变之间不断调整，美俄关系也同时经历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对俄战略更是出现了戏剧性转折。“美国鹰”与“俄国熊”之间的较量注定还会持续下去，因为美国期待鹰击长空，继续主导世界；俄罗斯则不甘只当“北极熊”，也有全球抱负。这场“鹰”“熊”对决不仅攸关美俄关系的未来，对于新时期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走向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对俄战略的四项依据

概而言之，决定冷战后美国对俄战略制定的主要依据，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联系。冷战后美对俄政策的一个基点，是美国对俄罗斯（苏联）的历史记忆、美俄（苏联）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对俄罗斯（苏联）近现代发展史的基本印象。其中苏共70年的统治史及沙俄数百年的帝国史，成为美国观察俄罗斯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这一点在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塔尔博特（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彼得·罗德曼（小布什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等深谙欧、俄文化历史的现实主义战略家那里，尤其被反复强调。

布热津斯基就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表面的光环、西方资金流入的主要受益者或增长率的起伏”等表象来评判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或制定美国对俄政策，而应从“持续500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这一帝国到了苏联时代扩展成更大的社会主义帝国）”这一历史视野看问题。他还强调，“绝不能低估70年共产主义的历史”对俄罗斯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刻影响。[注]基辛格则始终认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在于俄罗斯文化所固有的侵略本性。[注]赖斯在为小布什第一任外交进行政策设计时，其对俄政策观同样首先建立在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理解上。[注]

19世纪，美国把俄罗斯视为欧洲专制制度的象征。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又被视为邪恶的激进势力的化身。直到1934年，美苏才正式建交。在共同面临法西斯威胁的时期，罗斯福总统一度坚信，无论是几百年的沙皇专制和帝国主义，还是斯大林长达一代人的统治，都不会对战后的美苏合作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种状况随着“二战”的结束旋即发生逆转。冷战时期美苏既武力相向，又进行谈判。

美国当时对苏政策形成三派意见：一派认为谈判过程本身即可“和平地”改变苏联的制度；一派认为只有对社会主义开战并搞垮这一制度，才会有永久的和平；一派认为遏制苏联需要外交努力与军事压力双管齐下，要将苏联耗得筋疲力尽，没了往日的意识形态狂热，并从宣扬意识形态转为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

基于此种认知，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对俄政策将重心放在对俄罗斯的内部改造上。美国决策者深信，只有从内在体制上演变俄罗斯并将其改造成真正的西式民主国家，才可能逐步切断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与传统的俄罗斯及苏联的政治文化纽带。美国这种想法往往还同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理念及风格联系在一起，因此，培植一个“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成为美国对俄政策的目标。

克林顿时期，美国曾用一种不切实际的姿态吹捧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演变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并与互联网联网”。而小布什时期，美国对普京个人的评价也大起大落，先是认定“这是个可以打交道甚至值得信赖的人”，后又发现普京原来并未摆脱俄罗斯传统帝国文化的影响，与其说是“俄罗斯的第一人”，还不如说是“后苏联时代的最后一人”。这种对个人风格及其理念的好恶反映了美国对俄政策制定背后的历史联系观。

第二，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先看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一般而言，美国在制定和推进其全球战略时，依据实力、意图、价值观、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多个综合性指标，将各主要力量按亲疏标准划分为朋友、盟友、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敌人等六类。根据这一划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定位中始终在“伙伴—竞争对手—潜在敌手”三者之间游移，而其中的转换，依美国战略取向、俄罗斯发展方向及国际格局发展变化三大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定。

克林顿时期，俄罗斯一度被视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小布什时期，俄罗斯重新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有滑向“潜在敌手”的危险性。同时，美国不同部门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也不尽一致，像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部门，始终没有放弃将俄罗斯视为“潜在敌手”，而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俄罗斯的判断则相对温和。小布什执政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俄罗斯事务办公室被并入欧洲事务办公室。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在布什政府看来，俄罗斯已不是一个需要专门对待的“大问题”。

分析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定位的状况还有一个标准，即依据所谓美国对外在威胁的分类。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在其著名的《预防性防御》一书中，将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威胁依其严重程

度从“最危险的”到“最不危险的”划分为三类，即对美国及其盟国生存构成威胁的“甲类”威胁、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利益但没有威胁到生存或生活方式的“乙类”威胁、对美国利益和安全有间接影响但无直接威胁的“丙类”威胁。[注]根据这一标准，俄罗斯处于“甲类”和“乙类”威胁之间。在佩里等人看来，俄罗斯虽不可能像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但其潜在的破坏能力远高于中东和朝鲜半岛等“乙类”威胁。

再从地缘战略层面看，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以美国自身为大脑或灵魂，以美洲大陆为躯干，以欧洲和亚太为两翼，以欧洲的北约和亚洲的美日同盟为两大支撑，对欧亚大陆实行合围。因此，美国全球战略往往被简化为欧亚大陆战略。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如果不控制欧亚大陆，美国不过是“两洋中的一个大岛屿”而已。而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几乎就是一部“美国欧亚大陆战略报告”。

因此，苏联虽然解体，但在美国战略家眼中，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因其天然的地理存在，即构成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自然障碍”。更何况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转型缓慢，在军事上仍是可与美国展开全球抗衡的唯一国家。凡此决定了俄罗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独特分量。

美国战略家有一个重大命题：如果欧亚大陆上的俄、中、印三国有任何一国试图挑战美国，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都还任重道远；而如果三国，甚至两国结成反美战略联盟，美国全球战略则将功亏一篑。美国对俄政策的基点之一就是使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防止俄与中、印走得过近。

第三，俄罗斯在美国塑造“转型国家”中的特殊作用。苏东阵营瓦解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诸多国家被美国统称为“转型国

家”。其中中东欧地区的诸多国家，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等，均在其列。但最主要的“转型国家”是俄罗斯、中国、印度三国。[注]根据美国的判断，这三个国家都是大国，都有核武器，发展方向都不明确，对美国都构成某种威胁。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三国顺利走向民主化，并确保中国强而不斗、俄罗斯弱而不乱、印度崛而不起。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足以影响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因此，如何经营好这些“转型国家”成为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政府的一道难题。

由于俄罗斯是苏联的直接继承者，而且与东欧、中亚诸多“转型国家”存在深厚的利益联系，因此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具有示范作用和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对于美国改造“转型国家”的战略而言，俄罗斯的改造可谓成败攸关，十分关键。正因如此，美国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不得不小心谨慎，既要压制，也得安抚；既希望其继续“大而不强”，又不希望出现大乱。其中政策度的拿捏，让美国执政者颇费周章，也使得美国对俄政策一直起伏不稳。这是观察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第四，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俄罗斯虽然不再具有苏联那样的实力地位，却依然具有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力。其与中国、印度特殊的历史联系，与欧洲国家长期的对立关系，对东欧、中亚、高加索地区特殊的影响力，加之所处的特殊战略位置，使美国在规划对俄政策时，不能不将其置于美欧俄、美中俄、美印俄等三角关系框架中去运筹。其中，美欧俄三角关系是美国处理对俄关系的一个大背景。

在美国战略家们看来，美欧俄三角关系的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欧洲帮助美国在俄美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协助俄罗斯融入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俄罗斯最终加入欧盟；最坏的可能性是俄罗斯继续同美国和欧

盟对抗。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希望看到的则是第一种可能性。而对于第二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北约，美国态度犹疑：既认为这是从军事安全上全面控制俄罗斯的绝好机遇，又担心此举“要么会把这个大西洋联盟变成一个小联合国式的安全组织，要么变成一个泛亚洲尤其是泛化的西方工业民主国家的联盟”，最终使北约的存在变得没有实质意义。对于第三种可能性，即俄罗斯加入欧盟，美国虽表面不好反对，实则非常担心此举会造成大西洋两岸的分裂。诚如许多美国战略家们所预言的那样，倘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比欧洲与美国的纽带还要密切的话，哪怕是与后者相近，也会触发跨大西洋关系的一场巨变。因此，美国一方面表示“欧盟和北约的继续扩大并不预先排除俄罗斯最终参加的可能性”，(注)另一方面则不断提高俄罗斯加入的前提和要价，使俄罗斯实际上仍被排除在北约的核心决策圈和欧盟之外。

美国从美欧俄三角关系角度制定对俄政策的另一背景，则是冷战后美欧矛盾的逐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欧俄之间的任何靠近都将引发美国方面的无限联想。冷战后，美欧矛盾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冷战结束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美欧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北约《华盛顿文件》发表，美欧暂时弥合了彼此的矛盾，双方在北约东扩、北约功能的转型、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挑战等方面达成了新的战略共识。这一阶段，美欧关系远高于欧俄关系。

第二阶段从1999年到2002年伊拉克战争。美欧矛盾进一步从经济分歧和政治冲突深化到战略冲突和价值观的分歧。其结果，欧俄关系开始越走越近，伊拉克战争时期法、德、俄三国居然联合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痛定思痛，美国决策者开始意识到，俄

罗斯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美欧关系的命运，美欧俄三角关系处理不慎，恐将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个阶段即从2002年至今，是美欧关系的重新调整期，也是美欧俄三角关系的重塑期，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布什政府对俄用强、对欧怀柔，期望重新掌握美欧俄互动的主动权。

总之，冷战后美国在经营美欧俄三角关系时，形成了几个基本政策支轴。（1）根本目标是将俄罗斯消化于美欧跨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借此强化美欧关系而不是使俄罗斯成为美欧关系的障碍。（2）为此，一定程度地接纳俄罗斯进入美欧体系，使“七国集团”变成“八国集团”，使北约“19+1”机制变成“20国机制”。（3）上述动作有一定限度，亦即，使俄罗斯从属于美欧关系而非成为完全的对等角色，更不能成为美欧关系的牵制因素。一旦出现此类动向，美国的对俄、对欧政策即会随机应变，加以调整。（4）从长期看，美国在欧俄之间搞平衡面临更大难度。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拉近欧俄关系，而俄罗斯要实现全面复兴，也必然把战略视角转向欧洲，欧俄关系发展势头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另一个“三角关系”是美中俄关系。由于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所留下的历史记忆和战略遗产，美中俄三角虽然不能再支撑整个国际格局，但对于欧亚大陆格局的影响力仍独一无二。因此，美国对俄政策往往是与其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的担心有两个：一是中俄两个欧亚大陆大国完全按照自己的节拍和目标实现复兴和崛起，从而同美国主导的西方政治、经济、价值体系形成冲突；二是中俄联手，共同形成抗衡美国的“同盟关系”或“准同盟关系”，这无疑将使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全球战略目标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并不惧怕俄中联盟，因为随着中俄各自的发展，它们之间复杂的双边问题也将应运而生。“两个大国，彼此相邻，同时作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强国而崛

起，当它们看到共同的威胁时，双方可能暂时处于同一立场；当这种共识消失时，它们则必须处理一系列复杂的难题。”[注]但是，对于美国执政者来说，其政策基点不可能建立在相信中俄无法结成反美统一战线的判断上。

因此，美国追求的目标也相应有两点：一是通过“建设性接触”（克林顿时期的政策）或“带保险的融合”（小布什时期的政策）等手段，塑造或改造中俄两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二是居中制衡，利用自身实力及战略优势，在中俄之间“打楔子”，防止中俄走得过近，使中俄各自同美国的关系高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中手法，则是交替使用“冷俄热中”或“冷中热俄”两手。

除了美欧俄、美中俄等两对重要的三角关系外，美俄印三角也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美国的一个目标是，尽快完成美印关系的历史性和战略性转变，使印度逐步脱离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安全纽带依然深厚的“俄印特殊关系”框架，进入美国主导的“新南亚战略体系”，从而至少使印度在美俄印三角关系中扮演有助于美实现全球战略利益的建设性作用。此外，东欧、中东、中亚、高加索等“第三方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亚、高加索地区及中东地区，在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俄政策制定中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

目标与框架

美国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M·戈德盖尔（James M. Goldgeier）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将其关于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的新著，毫不隐讳地定名为《实力与目标》。[注]它含有两层意思：成功的对俄政策，第一取决于美国的实力，这是基础；第二取决于正确、得当的战略目标，这是条件。与美国的对华战略或对华

政策不同，在美国各种战略文本中，很难清晰地发现美国对俄战略或政策的基本目标。不过，在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的论述中，这一目标相当清晰，那就是将俄罗斯改造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积极参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注]；或如有学者所言，使俄罗斯变成“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西方伙伴”三位一体的国家。[注]从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俄政策的实际作为看，美国对俄政策目标大体有三个支柱，即所谓“三化”：民主化、西方化、后帝国化。

民主化包括市场经济、选举政治、多党制、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民族自决等多个组成部分。由于苏联的解体被美国解读为自由对专制、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美国对俄政策的根本点即是将俄罗斯进一步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国家”。诚如小布什所强调的那样：“所有俄罗斯的邻国以及俄罗斯自己，都将受益于民主价值的传播。一个稳定、繁荣、民主的俄罗斯将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注]民主化是美国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方面的基本要求。

西方化是美国对俄罗斯制度、军事、安全方面的目标，即将俄罗斯逐步融入美国欧洲跨大西洋共同体，使其成为美欧民主阵营中“温顺的一员”。美国有三个基本判断。第一，因为其传统倾向和昔日的骄傲，俄罗斯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成为北约的一员，但是从长远看，俄罗斯会逐渐意识到，成为北约成员国将带来更大的安全感，特别是随着远东地区人口不断减少和中国潜在威胁的增大。第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将完全被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包围，对该地区的特殊安排，将迫使俄罗斯考虑加入大西洋联盟的问题。第三，俄罗斯希望与美国和解，不仅会因此获得地缘政治及物质上的收益，而且能加强对中国的地位，有助于带来其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投资，并能使其对以前的控制地区施加更多影响力，同时还能使美国陷入与伊斯兰世界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从而转移伊斯兰世界对俄罗斯的敌意。[注]

“后帝国”化则意味着，一方面，俄罗斯必须断绝帝国念头，以普通民族国家的认同规范自己的内外政策。布热津斯基的设想是，最终将俄罗斯作为一个“普通中等欧洲国家”纳入大西洋联盟体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为解决西亚和中亚地区不断增加的冲突建立坚实而广泛得多的基础，才会从根本上结束欧洲国家之间千百年来连绵不断的惨烈冲突。为此，美国必须同欧洲一道，审慎地支持俄罗斯迈向民主和后帝国的战略努力。同时，与俄罗斯的合作必须与在前俄罗斯帝国控制的区域内巩固多元化地缘政治的努力同步，从而“使俄罗斯恢复其统治的企图永远不能得逞”。[注]

另一方面，俄罗斯必须成为欧洲的一员，而不是所谓“欧亚国家”。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在使俄罗斯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防止其重蹈历史覆辙”。[注]因为一旦俄罗斯重蹈覆辙，“这种复辟不是回到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回到一种更为传统的带有强大军事影响力的独裁主义”，而这样一个“新的旧俄罗斯”会更加可怕。[注]

如何实现上述根本目标？美国实际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主张奉行“弱俄”政策。“宜将剩勇追穷寇”，趁俄罗斯没有缓过劲来，进一步从军事、地缘上孤立或削弱它，以免养虎遗患，后悔莫及。这一派被称为“力量制衡派”。另一种则主张维持俄罗斯的基本国力和社会政治稳定，并帮助其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认为一个市场经济、民主导向的俄罗斯才是真正和平的俄罗斯。相反，如果一味削弱俄罗斯国力，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反弹，最终殃及美国国家利益。这一派被称为“政权改变派”。[注]

不过，美国决策者在具体推行对俄政策时，往往并没有对这两种策略做截然区分，而是将两种策略融合在一起，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如果说克林顿政府的对俄政策基本体现了“政权改变派”的立场，那么小布什政府的对俄政策则更多代表了“力量制衡派”的声音。

冷战后10年，美国对俄战略的基本方向正是以上述三大目标为衡量标准的。经过美欧对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不断挤压以及对俄政治外交的不断“修理”，以及普京上台后俄内政外交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美国一度看到了改变俄罗斯的希望。普京的这些举措包括：政治上，由专制转向民主；经济上，由计划转向市场；战略上，由扩张转向收缩；外交上，由（与美）对抗转向（同美）合作；安全上，与北约从敌对关系转向伙伴关系。尽管小布什上台之初美俄关系一度紧张，但美国对俄罗斯的上述积极变化是心有灵犀的。

另有几件事让布什政府进一步转变了对俄态度：一是布什与普京的首次会晤。布什形象地说，从普京的眼睛里看出“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二是“9·11”后普京第一个打电话给布什表示慰问，并积极参与美国的反恐；三是俄罗斯对美军历史性地进驻中亚表示容忍。

凡此，使美俄关系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取得了突破：（1）俄罗斯被纳入七国集团，使G7变成G8；（2）将北约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由“19+1”变为“20”，使俄—北（约）理事会不再只具象征意义；（3）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在市场经济方面俄罗斯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4）与俄共同削减战略核武器，并表示要共同研发导弹防御系统。

这些积极变化表明，经过后冷战时期10年左右时间的磨合、斗争、交融，美俄关系大体实现了三个超越，即超越冷战、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全面战略对抗。由此，美俄关系完成了部分质变，达到了双边关系当时所应具有的深度、高度与广度。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俄不再是战略对手，双方正在构筑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注]这一基本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也表明这一时期美国对俄战略逻辑是清楚的，总体是成功的。

战略的反复

在美国政府的精心塑造下，美俄关系的基本格局大体确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根本矛盾不复存在。实际上，俄罗斯实现复兴的根本目标，如力争成为欧亚国家、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守地缘战略底线不动摇等，与美国对俄战略目标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冲突。由于美国挟冷战获胜的余威，俄罗斯受国力衰落的掣肘，美俄之间政策互动的总体特征是美攻俄守。在决定美俄关系的基本状态方面，美国始终占据相对强势和主导的地位。可以说，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俄罗斯对美国单方面的退让或忍让基础上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无原则地一味退让。

因此，美俄关系新框架虽可一时掩盖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却无法将其彻底根除；虽能给对方带来一定的期待，却无法根本改变对方的政策立场。相反，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经历不期而遇的考验而幻灭之后，更容易产生对抗情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美俄龃龉的引爆点。如果说伊拉克战争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各大国的利益，那么其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伤害则更直接，更具战略性。它不仅直接挑战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利益，而且冲击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并损害俄罗斯同伊拉克及其他中东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此战使俄罗斯更清醒地意识到，美俄之间的战略矛盾不会因反恐合作而逐渐消弭，反而可能因反恐差异而更加凸显；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不会见好就收，而会得寸进尺。在俄罗斯战略界头脑中，更多了一层对美国“战略连贯性”的警惕：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标志着美国拔掉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后的“堡垒”；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使美军堂而皇之地进入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则预示着美国将强势占据俄深具影响的中东地区。如此一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几乎每隔两年就被实质性地蚕

食一次。因此，对俄罗斯来说，伊拉克战争具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战略指标意义。

伊拉克战争好比一个盖子，不仅揭开了美俄在国际政治理念、国际秩序安排、国家战略利益等诸多领域的巨大差异，而且将先前掩盖的其他各类结构性矛盾彰显无遗，集中体现在两国大战略目标的对立上。布什政府“反恐不忘谋霸”，在借重俄罗斯反恐合作的同时，从未停止对其战略包围。如果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反恐色彩掩盖了其谋霸目标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后其超越反恐的大战略目标开始凸现，尤其是布什第二任期伊始提出要在全球推进自由民主，并将重点放在中亚和中东，其对俄罗斯核心利益的侵害使俄感同身受。

普京“重振大国雄风”的战略目标则决定了其反恐合作、战略退让只是手段，追求经济复苏、国家安定、战略独立、民族复兴才是根本。这一根本目标因俄境内连续不断的恐怖事件的刺激而越发坚定，其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就在所难免。俄罗斯强化军力、集权中央、打击分裂，必然就与美国对其所期望的战略目标相悖。美俄战略目标、战略利益的短兵相接，显露出双边关系的本来面目。由此，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接连开始复发。

在政治领域，冷战结束后两国一度和缓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矛盾突然升温。俄罗斯方面，自普京2005年4月25日首次提出“主权国家民主”概念，此前俄采取的一系列强化中央权威的措施逐步理论化、系统化，“主权民主”大有上升至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的态势。而“主权民主”的实质在于俄罗斯人民“自主决定应该如何发展民主和保障自由，俄作为主权国家将自己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注]为此，普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加强中央权力、合并联邦主体等，其中2005年12月23日俄通过的《非政府组织法》，直接针对西方的用意十分明显。这些做法不仅与美国一直追求的对俄“民主化”改造目标格格不入，而且同小布

什第二任期抛出的旨在强力向全球推进自由民主的所谓“新布什主义”针锋相对。

于是乎，普京的“主权民主”在布什政府看来无异“民主倒退”“民主回潮”。对此，不仅美国媒体群起攻之注，而且一些重量级、严肃的智库也对此口诛笔伐。注更有意思的是，布什、切尼等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公然指责。2005年2月2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峰会上，布什利用新闻发布会之机公开表达对俄罗斯“偏离民主轨道”的担心，普京则严词回击，毫不退让。注“民主回潮”“民主倒退”几乎成为美国谈论俄罗斯的中心话题。不仅如此，美国还采取实际行动予以警示。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亚地区轮番上演的“颜色革命”。

经济领域，普京的新经济路线违背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一方面，普京大力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尤其是对涉及战略资源的俄罗斯寡头集团重拳出击，让美感到忧心忡忡，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在逆转先前进行的重要的经济改革”，正在对“去共产主义的改革”进行再改革。注另一方面，普京打出“能源复兴”的口号，将能源作为一张战略牌，切中了面临能源危机的西方世界的要害。美国称普京是“能源危机时代的幸运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际原油价格每加仑不过20美元，1998年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年收入不足400亿美元；2000年普京上台时，油价涨至28美元，当年俄油气岁入达到750亿美元。2005年9月18日，俄罗斯突然单方面叫停“萨哈林–2”油气项目，使得西方三家公司面临严重损失。

美国对普京的“能源牌”颇有无所适从之感。针对普京的经济政策，美国一方面利用舆论施加压力，一方面延缓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2006年俄罗斯原本想利用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东道主的身份争取美俄签署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期望落空，美国也从此前的许愿转变成对俄的指责与施压。

外交领域，美俄针锋相对，有时故意制造麻烦。美国采取北约东扩与“颜色革命”两招防止俄罗斯卷土重来：前者从外部对俄罗斯战略空间进行遏制性挤压，后者从俄罗斯的战略边疆内部对其进行战略性肢解。[注]俄罗斯则针锋相对。一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和实质性影响，杜绝美国实力进一步蚕食的可能性。二是同时与美国的主要敌人发展关系，增强手中抗衡美国的砝码。俄罗斯的做法包括：同伊朗发展核能合作，率先“认可”朝鲜的核武国家身份，同委内瑞拉签署10多亿美元军售合同，打破美国武器禁运，打算同白俄罗斯建立联盟国家，举行针对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还宣称将“动用核武器”应对外来威胁。三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大力加强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盟等东方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外交关系，使“东方外交”有声有色。特别是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及俄中2005年8月联合军演，提升了俄罗斯在对美外交中的分量。四是正式厘清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05年10月12日宣布，俄罗斯不追求加入北约和欧盟。

地缘战略领域，美俄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顺势在中亚地区暗中策动“颜色革命”，拉开了新一轮美俄地缘争斗的序幕。对此，普京政府不再采取战略收缩的策略，而是坚守底线，守中带攻。2006年年初，俄罗斯突然决定关闭输往亲美的乌克兰的天然气，几乎引发一场外交危机。据美方估计，欧洲25%的天然气供应来自乌克兰，未来10年，这一比例甚至将高达75%—80%。[注]美国显然深谙普京的“醉翁之意”。因为“间谍事件”，俄罗斯同亲美的格鲁吉亚政府更几乎走到战争边缘。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要求谴责格鲁吉亚逮捕俄军人的提案遭到美国反对，美国参议院甚至通过一项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决议草案。

战略安全领域，冷战后出现曙光的美俄削减战略武器的努力近乎失败，双方同时加大在战略力量方面的投入，开始新一轮较量。美国加大对俄罗斯在战略力量方面的优势，并试图以此占据对俄总体外交

的强势地位。继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后，2003年，美宣布解除小型核武器研究禁令。2004年，美国导弹防御体系正式开始部署。美国一方面加紧新型战略核武器的研制，以取代目前主要由冷战时期生产的战略核力量；另一方面加快战术核武器的生产，以适应新型战争的需要；与此同时，加大对俄核讹诈力度。

《外交》杂志2006年第3/4月期发表《美国核优势的崛起》长文，称美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力量均势已经被打破，美国具备一次性先发制人摧毁俄核武库的绝对优势。针对美国的核讹诈，俄罗斯一方面进行有力回击，一方面实质性加大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力量的建设。2006年3月30日，普京总统回击称，俄拥有应付敌国攻击的足够核弹头。4月3日，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发表讲话表示：“俄军拥有足够的实施战略遏制的能力，完全能够保障国家的安全。”4月13日，俄导弹设计中心负责人索罗门诺夫宣称，俄“白杨–M”“圆锤”导弹未来15—20年内能突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为应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普京决定部署新一代进攻性战略武器。据《简氏情报文摘》报道，普京还在认真考虑单方面退出美俄1987年签署的限制发展射程在500—500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条约》（ISRM），以报复布什单方面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注)

一度从普京的眼里看出“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布什，至此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看走了眼。

“三管齐下”新战略

从美国对俄基本政策目标及目前所采取的实际动作看，美对俄战略将是“耐心接触、坚定防范、悉心经营”三管齐下。

“耐心接触”是冷战后美国对俄战略既定方针和主旋律。由于美国认定俄罗斯的转型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会给俄罗斯一定的喘息之机。普京内外政策的反复使美更加认识到改变俄罗斯的艰难性，从而在奉行接触政策时会更加耐心。

“坚定防范”是美国对俄政策的另一面，也是“耐心接触”得以进行的保证。为此，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规划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不会见好就收，而会余勇追寇，直至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防范之所以冠以“坚定”二字，是因为美国不会因为俄罗斯的合作而放缓既定步伐。美国在北约东扩、全球军力调整上体现出“以我为主”的战略姿态，在中亚“颜色革命”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均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悉心经营”是指将“西化”目标锁定普京之后俄罗斯的新一代政治家和新一代俄罗斯人。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当俄罗斯的帝国历史和全球地位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而不是一种资本时，这一代人将成熟起来，从而必然创造出一种不同的全球风貌。下一代领导人很可能包括西方大学的毕业生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他们会普遍希望俄罗斯不仅要喜欢西方，而且要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注]为此，政治上交流、经济上利诱、文化上培养将同步而行，长期不懈，力争“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乌克兰危机”与美对俄政策失序

奥巴马上台后，在延续过去对俄战略的同时，尝试运用“巧实力”缓解美俄关系，一度信心满满地宣告将“重启”美俄关系。然而“乌克兰危机”的突发，打乱了美俄“重启”的节奏，反而致使美俄关系跌入冷战后的最低点，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对俄战略的失败。

国际预言家们未曾料到，一场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危机几乎改写欧亚地缘战略格局。地理上属于欧洲的乌克兰，地缘上却仍被视为俄罗斯的“属地”，美欧全力帮助乌克兰“脱俄入欧”，俄罗斯只好绝地反击。如此这般，美欧纳乌“加盟入约”的如意算盘落空，普京也从残酷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更加看清楚西方政治家们的冷酷嘴脸。双方于是撕破脸皮，俄罗斯被逐出八国集团，能源、军工、金融遭遇严重制裁。西方如梦方醒，俄罗斯虽显虚弱，但要从其口中夺食无异与虎谋皮。

说白了，乌克兰危机背后凸显的，是美欧与俄罗斯之间对于“后苏联空间”地缘板块的争夺，延续的仍是美国对俄战略之“后帝国化”的逻辑。对于“乌克兰危机”背后美俄博弈的结果，有人说俄罗斯虽吞并克里米亚却丢掉整个乌克兰，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有人则称没有了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像个鸡肋，美国人吃也不是扔也不是。

实际上，就乌克兰谈乌克兰，美国战略并无不当。一方面，美国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与欧洲联手，对俄罗斯祭出经济制裁狠招，令俄罗斯经济形势越发恶化，达到了惩戒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始终在使用军力协助乌克兰问题上头脑冷静，没有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甚至也在极力避免冷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当局完全贯彻了奥巴马“巧实力”外交哲学。

但如果超越乌克兰而从美国对俄战略的演进角度，以及从国际格局的视野看问题，美国则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不仅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俄战略取得的基本成效一笔勾销，而且使欧盟在俄罗斯问题上同美国产生裂痕。

更重要的是，美国选择同时与俄、中两强博弈，导致俄中关系走近，美中、美俄关系趋紧，使冷战后首次出现俄中关系高于美中、美俄关系的新局面。这恐怕是美国战略界最不愿看到的局面。正因如此，奥巴马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遭到共和党的普遍非议。奥巴马的“巧实力”究竟是“四两拨千斤”还是“弄巧成拙”？后人自有评说。

1. Zbigniew Brzezinski, Geostratigic Triad Living with China, Europe, and Russia, The CSIS Press, Washinton,D.C.,2001, pp.56-57.
2. 基辛格1999年9月在“21世纪前夕的中美关系”会议上的讲话，法新社华盛顿1999年9月14日电。
3. Condoleezzsa Rice, “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0, pp.57-60.
4. 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杨韵琴译：《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5.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 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6. Zbigniew Brzezinski, Geostratigic Triad Living with China, Europe, and Russia, p.56.
7.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著，郝平、李岩松等译：《美国与亚洲——斯卡拉皮诺北京大学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8. James M. Goldgeier &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2003,Washington, D.C.
9. Zbigniew Brzezinski, Geostratigic Triad Living with China, Europe, and Russia, p.71.
10. James M. Goldgeier &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 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2003, Washington, D.C., p.1.
11. Anders Aslund, “Putin’s Decline and America’s Response”, Policy Brief, 41, August 2005,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2.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9–111页。
13.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14. 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1世纪的外交》，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第82页。
15.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美国与亚洲——斯卡拉皮诺北京大学演讲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16. James M. Goldgeier &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U. S. 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2003, Washington, D.C.p.5.
17.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September, 2002.

18. 王郦久：《俄罗斯：在稳定中探索加快发展之路》，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5—2006），时事出版社，2006年4月，第47页。

19. 比如，有媒体称“帝俄的幽灵正在回归”。Anders Aslund, “Putin’s Decline and America’s Response”, Policy Brief, 41,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2005.

20. 智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当属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笼的关于俄罗斯的专题报告。该报告的中心结论是：俄罗斯正在偏离民主化轨道，走向错误的方向。

21. “Bush and Putin on Democracy, Political Debate and Iraq”,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2005.

22. Marshall I. Goldman, “Putin and the Oligarch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4.

23. 吴大辉：《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的三重诉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

24. “After the G-8: The Future Orbit of U.S.-Russian Relations”, Remarks by David Kramer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July 21, 2006.

25. “End of Russian-US Arms Control”, Jane’s Intelligence Digest, 22 September 2006.

26. Zbigniew Brzezinski, Geostratigic Triad Living with China, Europe, and Russia, p.66.

第十一章 阴谋还是阳谋：美国应对中美变局的尝试

如何应对中美变局？美国并非没有动脑筋。历史上，美国对付主要战略对手是有一套的。可以说，通过热战，击败了德国；通过冷战，搞垮了苏联；通过金融战，制服了欧日。如今，面对中国这个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却一时乱了方寸。因为中国既拥有类似苏联那样的国土规模和军事潜力，又拥有日本那样的强大经济实力，还具备欧盟那样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个“三合一的对手”。同时，这个主要战略对手同美国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各种利害关系和利益捆绑，并坚持奉行对美建设性合作方针。

对于这样一个新型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在既有战略工具箱里找不到现成的工具。像对付苏联那样对华搞全面遏制，无疑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得不偿失；像对付日本那样搞金融战，无奈中国早就对此提高警惕，美国的阴谋成了阳谋，如何能够奏效？美国只好在实践中摸索，在互动中寻找。对美国来说，这一过程是痛苦的。而对中美关系而言，这一过程则是必需的。

美国对华战略的迷思

面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系走向破裂甚至对抗，是大国兴衰历史定律的必然。他们总爱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比。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与德意志帝国的相似度超出一般人的认识，区别只是，“相比德国对英国，中国对美国的海上霸权会构成一种更严峻而顽固的挑战”(注)

，而英德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海上实力”。同时，中国比当年的德国更理智、更审慎，更适应自己的战略环境并擅长管理国家财富和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言下之意，中国是比德国更难对付的对手。随着中国利益走向海洋、太空，走出亚太之外，以及相应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逐渐强大，中美难免走上军事冲突的边缘。

还有学者拿出“二战”前日美交恶的案例，认为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无法克服战略上的互不信任，有时反而成为走上战争的重要推力。因为“二战”前的日美经贸关系异常紧密，恰恰是由于此，一旦美国启动禁运法，则日本经济不堪打击，于是只好铤而走险。

乍看起来，上述例证不无道理，但细加推敲，则发现漏洞百出。姑且不论中国与德日的国家性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政权结构不同，重要的是时代条件已大不同以往。全球化条件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英、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而多极化条件下的中国崛起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一起实现群体性崛起，遑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亦大多在经历新一轮政治觉醒、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威胁多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致命性疾病、超大规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新安全问题，同样分解着传统大国竞争的矛盾。

在论及中国海上实力扩展的时候，与其说中国在复制德意志帝国的老路，不如说中国更像美国崛起时代老罗斯福大力倡导建设现代海军的努力。事实证明，美国的强军计划并未直接引发美英当年的军事冲突，美英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与权力转移，确能给未来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颇多启示。

面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美国朝野纷纷抛出各种不同的应对方案或政策建议，有的从过时的冷战思维出发，主张乘中国将强未强之际重新修正对华大战略，改变过去以接触为主纳中国于西方体系的做

法，加大对华遏制力度，例如布莱克威尔和泰利斯；有的从中美关系发展的角度主张中美尽快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为未来关系发展设定新的框架，例如兰普顿；有的从历史的经验出发，建议模仿当年美英之间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在中美之间签署一个新的《太平洋宪章》，确认中美共治的新秩序，如布热津斯基；有的主张干脆构建一个中美“两国集团”，例如伯格斯滕；有的则从世界发展大势出发，指出中美的未来在于“共同演进”（co-evolution)，例如基辛格。

对于如此眼花缭乱的新主张、新建议，奥巴马政府一时无所适从。而在这些建议或主张背后，真正做过长时期深入思考，而且持之以恒加以推动，同时一度影响过奥巴马对华战略思维的，当属时任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战略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构想。从该构想出笼的过程及所体现的思想中，可以窥出美国战略界面对中国崛起的真实心态。

“战略保证”的提出及意义

“战略保证”概念作为国际关系术语并不新鲜，但真正引起中国学者乃至官员、媒体广泛关注，始自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2009年9月24日以美国高官身份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题为“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设想”的著名演讲中，斯坦伯格围绕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这个中心话题，提出“战略保证”新思维。因提出者身份的重要性（常务副国务卿）、发表场合的特殊性（国务卿克林顿的主要智囊机构）及出笼时机的敏感性（恰逢奥巴马总统访华前夕），新概念一经提出，即在中美两国引起关注并迅即产生重大影响。

正如中美关系中的许多术语一样，“strategic reassurance”一开始即存在翻译与理解上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使用的译法是“战略

性保障”，中国官方曾译作“战略性保证”，学者们的译法则五花八门，用“战略再保证”“战略相互保证”“战略保证”的都有。事实上，reassurance的本意是“使放心”“使安心”的意思，简言之，就是彼此做些事情让对方安心。美国华文媒体曾将其译作“消除战略疑虑”，似更贴切。不过，综合而论或约定俗成，一般采用“战略保证”这一译法，因为它更具国际政治色彩。

“战略保证”是美国单方面让中国做出保证，还是有中美相互保证的意思？还是看看斯坦伯格自己怎么说。斯坦伯格称：

战略保证取决于一项关键的相互约定，或许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条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已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的登场……中国也必须向全世界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作用将不以其他人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维护这项条件必须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战略保证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强调并增进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同时直接消除导致相互不信任的根源，不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在经济上。(注)

斯坦伯格有意强调“战略保证”是一项“相互约定”，约定什么呢？简言之，就是美国及其盟国一起欢迎中国崛起，反过来，中国则保证崛起将不以牺牲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为代价。在这一核心思想指导下，斯氏提出，战略保证既取决于各种形式的对话，更取决于具体的行动。

具体而言，这些行动大体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美保持配合与协调，而不是唱对台戏，包括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朝核、伊核等问题。

其二，在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务实面对并增信释疑。由于斯氏是站在美国立场、面对美国听众谈问题，因此在这一层面，倒像是美国敦促中国单方面做些事情来打消美国及西方的疑虑。这包括四个方

面。（1）军事现代化问题。中国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有权保障自身安全，但其实力和行动也要求增强自身的责任，向其他国家承诺发展军备不构成威胁。（2）资源竞争问题，尤其是中国的资源重商主义问题。美国和中国在保障稳定的、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美国不会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同时还迫切希望争取中国的帮助，以便今后建立正常运转的市场并增进共同的能源安全。与此同时，中国必须表明，中国将作为一个建设性的参与者做出努力，不会为保障自己的能源需求而损害他人的利益。（3）双边经贸问题。中美双方都要防止特定的分歧引发贸易战或保护主义的蔓延。（4）人权问题。一个尊重法制和国际惯例的中国可以打消别国的疑虑。

其三，战略保证不只存在于中美之间，还应扩及第三方，尤其是美国的亚洲盟国，要让他们同样相信，中国的作用日益强大，不至于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斯氏在演讲中最后总结说：

我们准备接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对此表示欢迎。中国也同样有必要表明，中国将履行自己的义务，使美国、亚洲邻国和全世界相信，我们不必对中国的影响扩大有任何疑虑，北京方面也认同我们有关地缘政治的新构想，要求以双赢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再陷入你死我活的争斗。有了这一战略保证和建立以互信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共同承诺，我坚信我们不仅能成功地采取共同行动，而且能够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这对我们大家都大有裨益。(注)

由此，“战略保证”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系统的新对华政策理念和框架。

为什么斯坦伯格会突然提出“战略保证”新思维呢？表面看，这是带有浓厚斯坦伯格个人色彩的东西。作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布鲁金斯学会前副主席、奥巴马竞选团队外交政策主要顾

问，斯坦伯格长期周旋于政府、智库“旋转门”之间，既懂政策，又谙学术，由此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具有战略思维的高官。作为“半个学者”，斯坦伯格自然希望留下思想痕迹，体现自身价值。纵向看，意在延续并超越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思想；横向看，则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职能部门争夺对华政策话语权和主导权。为此，他在演讲发表时间、地点的选择上煞费苦心。“战略保证”之提出未像“利益攸关方”那样事先征求跨部门意见，也从另一侧面凸显出个人色彩确较明显。

但显然，斯坦伯格选择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任主席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抛出此概念，也绝非仅代表个人的意见，因为该中心同时也是国务卿克林顿的主要智囊机构。因此，该思想至少体现了国务院的主流看法。再进一步看，虽然奥巴马总统未公开使用过该词，但从其访华后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仍能读出“战略保证”的精神实质。正如有分析所说：“奥巴马没有接受‘战略保证’之名，却接受了‘战略保证’之实”。比如，《联合声明》中公开强调：“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这正是“战略保证”的精髓。又如，《联合声明》重点强调“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这是“战略保证”的前提。再如，《联合声明》首次公开将“建立战略互信”作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而这正是“战略保证”的应有之义。

可见，“战略保证”确实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斯坦伯格个人，而带有奥巴马团队对华战略新思维的意味。一方面，“战略保证论”与2005年“利益攸关方论”有内在联系。两论的中心思想都是如何接纳中国崛起，所不同者，“利益攸关方”更多强调的是双方应合作“做什么”，而“战略保证”则旨在规范双方“不做什么”；“利益攸关方”体现出佐利克作为经济学家的特点，“战略保证”则显示出斯坦伯格曾经作为国际

政治学者的特色。美国前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迈克·格林称，“利益攸关方”是对双边关系的定位，“战略保证”则是处理双边关系的手段。而美国华人学者李成则认为，“战略保证”更像一种策略，因此实际上比“利益攸关方”还退了一步。

以“战略保证”的推出为标志，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带有如何应对作为“老二”的中国的性质，即开始将中国作为紧随其后的主要战略竞争者看待，并正式从大国权势转移的视角看问题。

“战略保证”论的缺失与内在矛盾性

同“利益攸关方论”一样，“战略保证论”试图解决的，仍是如何面对并接纳中国崛起的问题。二者都试图超越历史上大国兴衰的悲剧，而希望寻找一条规避冲突、和平共处的新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战略保证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中国倡导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有相通之处。它既是对中美关系发展新阶段的思考，也是对奥巴马上台初年相对积极的对华政策的总结和提炼。

奥巴马执政初年，美国对华政策确实出现某种新气象。政府换届未引发中美关系惯常出现的颠簸，反而更进一步，继续发展；“积极合作全面关系”新定位与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得以迅速确立；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成为美国近50年来首位将初访放在东亚和中国的国务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时隔近20年访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行；奥巴马上任初年实现访华，中美签署《联合声明》，全面规划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与路径……这样一种积极互动态势不仅令全球聚焦中美关系，也在中美两国催生一股乐观主义情绪。这正是“战略保证论”出笼的一个重要背景。

然而，自2009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围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谷歌事件、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等事件，中美关系突现寒意，而人民币汇率问题热度再起，则有将中美关系引向全面紧张之势。何以短短数月中美关系风云突变？这是如有学者所说“换届摩擦期后置现象”，还是中美全面竞争时代开启的标志？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重新审视“战略保证论”，显得别有意义。中美关系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至少凸显出“战略保证论”存在四方面缺失或内在矛盾性。

其一，“战略保证”这一构想的精神虽得到奥巴马政府呼应，却未在美国取得广泛共识，因此似乎让人将信将疑，进一步退两步，可信度不高，这限制了其影响力。迄今为止，除斯坦伯格、坎贝尔等少数高官多次提及外，该思想主要停留在学者层面，而且即使如此，学界也并不十分热衷，批评者或不认同者占多数，比如有美国学者公开批评说，“‘战略保证’仅仅是‘绥靖主义’另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注]，“只会使盟国感到紧张”。[注]这与“利益攸关方论”一出笼即广受热捧有明显不同。基于此，中方对此思想也未有积极呼应。它更多被视为一种思想试验，而试验的结果显示，其还带有不成熟特征。

其二，“战略保证”虽暗含相互保证之意，但仍处处透出以虚换实、以上对下、压中国做得更多的意味。这一点凸显了中美关系中的两个天然软肋：（1）美国在思考问题时，习惯于从霸权心态和世界领导地位出发，因此在别国看来是口惠实不至的东西，在美国自己看来则已是在做某种让步。如“战略保证”中美对华之“保证”主要就是两句话，“我们已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的登场”，“我们准备接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美方希望换取的，则是中方对美方一项项十分具体的承诺。这种地位或要求的不对等显然已经难以规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

（2）美方所做的“保证”或“妥协”，在它看来似乎仁至义尽，如奥巴马执政初年不见达赖、淡化人权问题、高规格举办首轮战略与经济

对话等，希望以此换取中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支持，如阿–巴反恐、金融脱困、气候变化合作等等。但在中方看来，美方所“让”其实原本就是美方“应做的”。换言之，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最起码要求和最基本前提，而美方要求中方做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其中许多涉及国家重大外交、安全与经济利益。因此，中方对奥巴马的“善意”或“战略保证”的用意虽心有感知并表示赞赏，但并不等于在战略层面对此领情。双方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很快就导致分歧突现、摩擦再起，最终双方都感到气馁、郁闷。中方抱怨美方过河拆桥，美方指责中国变得傲慢。凡此使得“战略保证”之意义显得空泛乏力。

其三，“战略保证”尽管带有为中美关系长远发展谋出路的战略考虑，但仍然充斥着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冲淡了其应有的价值和分量。比如，斯坦伯格在演讲中向中方提出的种种要求，几乎全是美国目前急需得到中国帮助的领域。尽管美方一再强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也符合中国利益，应对朝核、伊核对中国更加攸关，但很显然，这些更关系到美国霸权的命运。中国国内一度流行的一个观点“当前美国更需要中国”，并非空穴来风。一旦将战略保证落到如此功利化的地步，其原有的战略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其四，“战略保证”之言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之行并不同步，其所体现的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精神从一开始就遭到玷污。具体而言，就是在对台军售和美国总统见达赖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依然故我，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这显然同中方理解的“战略保证”本意相悖。反过来，它强化了中国对美外交长期信奉的一个中心思想：两国关系的未来归根到底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之所以口惠而实不至或说一套做一套，原因正在于中美实力对比虽发生变化，但远未出现根本性变化。

中美战略关系的前景

显然，“战略保证论”的内在矛盾性之所以难以克服，乃在于它虽然口头承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却无法真正做到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按照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所说，中国核心利益包括“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三个方面，而“战略保证”与此都犯相。尊重中国基本制度，也即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对华“西化”战略。而诚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阿伦·弗里德伯格所说，“政治自由化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与中国接触中重要的潜在政策目标”，丢弃它无异于抽掉美国对华政策的灵魂；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就意味着必须根本调整对台军售与会见达赖政策，而目前似乎看不出美国有任何迹象这么做；尊重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应该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如此纠缠不休。连中国核心利益都无法确保，何谈相互战略保证呢?

2009年年底与2010年年初中美关系突现紧张，不仅给那些原本反对“战略保证论”的美国人以口实，批评奥巴马和斯坦伯格等人“太幼稚”“对华太软”，结果自取其辱，而且同时也让奥巴马团队开始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框架和手法。尽管新的政策框架还未成形，但几个新的判断似乎正在形成。

第一，中国的实力地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再进一步，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强国越发现实；而中国在反制对台军售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硬朗做派”则显示出中国有关键时刻挑战美国的战略意图。“实力+意图”共同决定着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

第二，中国和平崛起虽有可能，但和平崛起未必就不对美国构成挑战。如果说“利益攸关方”“战略保证”等思维框架仍主要基于如何规范中国的内外行为使其只能和平崛起，那么现在美国则在集中思考如何防范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围绕此，美国知名战略家扎卡利亚一口气问了五个“怎么办”。

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进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而且不实行僵化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注)

这5个“怎么办”，有可能成为下阶段美国对华战略集中思考的问题。“战略保证”虽有意直面这些问题，但实践证明尚无法涵盖所有领域。

与此同时，经过中美关系自2001年以来长达8年的稳定发展期及后来急转直下的考验，中国也开始全面审视中美关系的既往经验教训并思考未来发展方向，即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中美关系长期战略稳定。中国既不具备冷战时期苏联那样堪与美国进行全面军事抗衡的综合实力，实现所谓“核恐怖平衡”状态下的稳定，也无法像目前欧盟、日本那样基本顺从美国的领导地位，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保持一致，实现所谓“共同价值联盟”式的稳定。除非中美努力探寻并初步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不对等综合国力条件下的战略稳定模式，否则中美关系未来10年的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甚至战略风险。基于这一前提，让我们冷静、客观、全面评估2009—201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进而对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做些思考。

应该说，2009年中美关系能够实现平稳发展并高潮迭起，绝非偶然。总结起来，大概有四方面原因。第一，是中美关系30年发展的历史惯性和发展逻辑使然。30年正常化的关系发展，使中美关系积淀起日渐深厚的基础，包括巨大的双边贸易额支撑的经贸基础、广泛的国际与地区合作形成的战略基础、全面的交流机制累积的政治基础等，

由此形成一个必然结果：中美关系只能进，不能退；合则两利，斗则双输。

第二，是中美两国逆向发展态势及美国对华需求日渐增高的客观现实使然。中国的崛起大势所趋，美国是否陷入衰落虽无定论，但美国霸权呈现衰势则是不争事实。在这一大背景之下，面临“一场危机、两场战争”的烂摊子，及世界权势东移、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形象受损、地位下滑的现实，美国对华战略倚重必然加强，这种倚重未必心甘情愿，但却不得不有意为之。因此，对华政策抓大放小、淡化矛盾与冲突点也就理所当然。

第三，是奥巴马团队战略观、世界观、对华观使然。一心创造历史的奥巴马，上台伊始即提出“巧实力”战略观与“多伙伴”世界观，并因此全面调整对外战略思维与做法。对华战略显然也呈现出若干新气象，包括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公开表示不谋求遏制中国、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以此换取中美战略相互保证，确保中国崛起不仅不挑战美国利益而且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正面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美国对华政策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积极动向，不只是权宜之计，也带有某种战略性意义。

第四，是中国积极把握机遇、推进中美关系的战略主动使然。2009年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政府不仅把握了国际局势变动的战略机遇，也抓住了奥巴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动向，进而在对美工作上加强谋划并提早动作，在战术运用上善于凸显合作面、控制消极面。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

很显然，观察2010年中美关系走势，首先必须全面审视以上几个基本因素还是否存在，或者说是否依然起作用。总体看来，2010年中美关系有四个未变。

其一，美国对华战略倚重未发生根本改变。奥巴马的变革实践表明，美国金融危机势头虽得到初步遏止，但经济危机的风险并未根除；股市虽有所上扬，但房市依旧低迷；经济虽出现正增长，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奥巴马政府主要精力势必仍将放在拼经济、保就业、促发展上，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重大波折并不符合美国利益。更重要的是，一度被奥巴马政府有意淡化的反恐问题因阿富汗问题陷入僵局、也门事件突发，而再度跃升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位置。也因此，控制中美安全冲突、加强两国反恐合作成为奥巴马政府不得不继续坚持的对外战略大局。一句话，美国对华战略借重的势头并未减弱。

其二，中美关系的基础总体仍未动摇。两国经济摩擦的深度与频度虽在上升，但相对中美贸易总量及经济合作格局多元化的势头，毕竟只是大格局下的小问题；谷歌事件等所体现的中美政治较量虽针锋相对，但两国总体政治对话与交流势头仍呈升势；双方在气候变化、伊核、朝核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本来就很正常，不会根本冲击两国战略合作大局。

其三，奥巴马团队总体对华态度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对中国有期待太高进而落空的遗憾甚至不满，尽管在谷歌等问题的处理上有强词夺理的一面，但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所讲的那样，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大局是得到两国元首共同认可的共识，理性对待分歧是双边关系成熟的标志，发展美中关系仍是美国的最高利益。

其四，中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对美关系的意志依然坚定。对台军售等事件的批评与反制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松动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也绝不意味着中国减缓与美国在重大国际与区域问题上合作的力度。知难行易与迎难而上正是中国30年发展对美关系的思想基础与行为基础，“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一点未来也绝难动摇。

中美关系3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矛盾分歧或问题风险并不可怕，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原本就是合作面与分歧面的复合体。关键在于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限度，从而不要盲目乐观；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节奏，从而不要躁动超前；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空间，从而保持信心。

---

1. 《霍姆斯：中国是美“有力对手”》，载《参考消息》，2011年4月7日。
2. James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4, 2009. http://www.state.gov/s/d/2009/129686.htm.
3. James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Keynote Address at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4, 2009. http://www.state.gov/s/d/2009/129686.htm.
4. Kelley Currie,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Reassuranc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2, 2009.
5. Robert Kagan and Dan Blumenthal, “Strategic Reassurance That Isn’t”,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0, 2009.
6.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第十二章 大战略：规划中国未来30年

美国在规划美国的大战略，中国也在规划中国的大战略。问题是，中国有大战略吗？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支持者称，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三步走”战略，中国政府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等，都堪称中国特色的大战略。否认者则认为，中国外交疲于应对、缺乏统筹、有欠系统，证明中国缺乏大战略。[注]更有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有较成体系的经济战略或发展战略，却很难说有什么国际战略或大战略。

事实上，上述争论在学理上有一定价值，在实践上则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战略的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国际知名人士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傅高义、李光耀等，都曾对中国的大战略赞赏有加。[注]之所以引起争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缺乏类似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样的大战略文本。同时，由于中国崛起的特殊阶段面临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中国的战略应对有时显得乏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观。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及随后习近平等多位党政领导人围绕此发表的讲话，堪称理解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的绝佳文本。[注]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大战略的轮廓，而且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未来30年的大战略方向。

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

所谓大战略，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到美国战略思想界人士如乔治·凯南、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等，都有各式各样经典的解读。但总体看，西方学者所指的大战略，多与战争、军事相关，或与国家安全战略等同。发展到今日，美国战略界关于大战略的设计，往往是以捍卫美国霸权地位为出发点，进而确立所谓国家利益分层、面临的威胁分类、战略策略手法运用等基本架构，带有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

这些有关大战略的理论、方法、架构对于理解和制定中国的大战略虽有裨益，但简单的复制或嫁接难免南橘北枳。[注]毕竟，中国拥有非常独特的战略文化，中国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极其特殊。事实上，跳出西方人的思维，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和内涵去看，大战略可以简单理解为：超越部门利益和党派利益，打破内政外交界限，对一国未来发展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理念、方针、政策的集合体，它应该具备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条件、战略理念、战略布局等基本要素。

以此为标准重新审读党的十八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现上述要素不仅十分齐备，而且各自的内涵也阐释得非常具体。也正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可谓跃然纸上。

从战略目标看，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构想，即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两个时间段各应实现的目标。随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思想。综合言之，新时期中国大战略所确定的目标分近、中、远三个阶段。

近期目标，即到2015年，大体实现“十二五规划”所确立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要将改革开放30多年业已形成的经济发

展方式或经济模式来个重大转变，由过去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两条腿转向投资、出口、消费三根支柱，由过去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能源消耗等粗放式增长转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创新驱动、节约资源、区域协调等“科学发展”，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经济结构、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等内容，因此这一转变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注]“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注]不啻为又一次改革开放，其任务之巨、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中期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周年的2020年（也可理解为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人民民主、文化软实力、人民生活水平、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其他综合性指针均有显著提升。对这一目标，报告特别强调要“如期”完成，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大战略的中心任务将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展开，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

远期目标，则是到建国一百周年的2049年（也可理解为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既是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是中国大体实现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也就意味着“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梦”概念的提出，使得中国的大战略目标不再是单纯的量化指标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这样的宏大内容，而是同每个中国人的个人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强调每个中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注]这

样一种更具人情味的表达，有助于凝聚人心、汇集力量，使中国大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加现实可期。

从战略环境看，要实现上述三大目标，中国面临两类环境。一类是静态的环境，即报告所提三个“没有变”：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注]

重新强调这三个“没有变”，其现实意义在于，在中国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提前5—10年超过日本一跃而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前后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世界第一之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应该戒骄戒躁，以冷静的头脑和平常的心态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诚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那样：“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注]

其意义还在于，尽管中国正面对且还将面对一系列内外冲击（如钓鱼岛、黄岩岛争端）或诱惑（如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思想，绝不能有丝毫动摇”。[注]这对排除一度甚嚣尘上的左右两种思潮干扰、聚精会神实现大战略目标无疑具有定海神针之效。

另一类是动态的环境，即报告所强调的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下中国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均前所未有。[注]这是以辩证的思维揭示出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的“一体两面”。第二个层次，强调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这是从认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角度得出的重要结论，即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前提下机遇仍然大于挑战。第三个层

次，则强调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这是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这三个层次的判断环环相扣，核心是如何理解新时期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围绕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或论证。注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必须牢牢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以来，人们普遍认为20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10年中国不仅抓住了，而且用得很好。但进入第二个10年以后，尤其面临美国战略重返、周边乱局不断、西亚北非变局、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左右思潮泛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再，挑战大于机遇，主张不要再提战略机遇期，否则容易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以致误国误民。

其实，这是对“战略机遇期”概念非常狭隘的理解。“战略机遇期”概念的精髓，不在于具体量化（也无法量化）机遇与挑战的比例，而在于看这些挑战是否实质性阻滞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与和平发展战略。事实证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战略主动性仍操之在我，并未动摇，所不同者，只是运筹战略的方式方法发生变化。

10年前，中国强调如何抓住机遇。在2001年突发“9·11”事件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国内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焦点是：美国是真反恐还是假反恐？美国出兵阿富汗是否意在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最终，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了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反恐联盟这一边。这一决策的依据是，在反恐与反霸两对矛盾中，反恐是主要矛盾；中国固然应该谨防美国借反恐谋霸，但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更应该是参与国际合作反恐。可见，抓住机遇也着实不易，它取决于正确的战略判断和果断的战略决策。

5年前，中国强调创造机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并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关键时刻，中国及时启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结果不仅成

功避免了中国金融、经济危机，而且使中国成为世界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这一创造出的机遇，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从今往后的若干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恐怕主要依赖“转化”二字，即要善于从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转化出对中国有利的战略机遇。

实践证明，在当前东海、南海的乱局危局中，中国已经转化出若干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比如，全中国人民的海洋意识空前增强，中国政府的海洋维权意志和决心空前提高，中国各层级的海洋维权能力实质性提升，中国海洋维权协调机制明显得到改善。凡此虽未必会立即转化为推动主权、海权矛盾的解决，却为最终解决或控制这些矛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正是我们理解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的要旨所在。

战略理念

面临上述战略环境，中国究竟靠什么去实现业已确立的战略目标呢？报告将中国拥有的战略条件浓缩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随后，习近平主席在系统阐述“中国梦”思想时，将实现中国梦的条件具体化为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注]，体现的还是一种自信。

中国今日之自信是否意味着明日依然自信？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认为资源枯竭和人口红利丧失将使中国高速发展难以为继，股市、房市泡沫则可能使中国成为下一个金融经济危机的中心。这种担心既非空穴来风，也不是简单的恶意抹黑，它们也正是中国政府和学者们集中思考的大战略问题。

对此，政治家和主流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红利，并表达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再深的水也得蹚”的精神去推进改革的政治意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则强调中国“新的人口红利”。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虽在逐渐丧失，但中国正从廉价劳动力时代进入技工时代，可以以拥有较高技能但低于发达国家技工价格的人力来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注林毅夫教授则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基本规律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20年没有问题。注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新一轮开放也将释放“开放红利”。注

总之，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积累了较大产能，基础设施状况大为改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而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储蓄率较高，劳动力总量仍然很大，后发优势依然明显。中国同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化、全球化的“中程”，又站在信息化的前沿，凡此使得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前景仍然光明。

在追求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如何始终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不动摇？这也就是新时期中国大战略所应秉持的战略理念。报告将其概括为“八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之所以将其称为中国的战略理念，是因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以上八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放弃，是因为它们共同支撑着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五个“五位一体”

人们在提到中国新时期的战略布局时，往往谈到报告中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注]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之鸿进一步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也概括为“五位一体”，分别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注]于是就有了两个“五位一体”。

但从大战略的视角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主要涉及中国的内政，党建“五位一体”主要涉及党的自身建设，也属内政范畴。实际上，细加审读，报告中有关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国防战略和对台战略的论述，也都分别可用“五位一体”加以概括。由此，内政、外交、国防、对台、党建等五大方面内容所构成的五个“五位一体”，便支撑起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的总布局。以下重点就外交、国防、对台三方面做一些解读和分析。

外交方面的“五位一体”，指的是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公共外交。其中前四个方面延续的是十六大报告的用法，公共外交则是新增加的。与此前略有不同的是，报告不再简单使用“大国”的提法，而改以“发达国家”。简言之，对外战略“五位一体”的布局似可概括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公共外交是补充”。

在这一总布局之外，新时期对外战略体现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思想。一是“命运共同体”意识。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思想自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正式提出，并最终以十八大报告的形式加以强调，凸显了新时期中国领导集体新的全球价值观。[注]

二是“合作共赢”思想。合作共赢既是“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导，这一思想近年来逐渐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在2012年7月7日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开幕致辞中，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注]这是合作共赢思想最形象的概括。转换成十八大报告的语言，即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原则或旗帜由过去的“和平、发展、合作”6个字扩展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8个字。

三是重申“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外交的重要体现。在应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外交实践中，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这一特色：中国政府既对朝鲜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919”共同声明的相关言行进行批评，参与联合国授权的相应制裁，又珍视中朝友谊，不因核问题而偏废中朝政治、经济、人文整体关系；既希望与美韩等国共同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大局，又反对美韩借机谋求朝鲜政权更迭、加大在东北亚军事部署、人为拉抬紧张局势的错误做法。尽管国内学界、媒体围绕此轮朝核危机展开大辩论，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偏离上述政策主轴。这正是以是非曲直为准绳决定立场和政策的应有之义。

四是正式提出愿与发达国家一起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自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提出愿同美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以来，新型大国关系多被理解为新时期中国对美外交的指导思想及中美关系新框架。十八大报告则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延从中美关系扩大为同所有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对新型大国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它所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国际环境，中国愿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包容互鉴的新精神处理同所有大国间的关系。换言

之，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普遍性。而落实到具体外交实践中，中美、中俄、中印、中欧、中日等双边关系又各具特色，需探索不同类型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样，就把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了有机结合，可谓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一大创新。

五是在论及多边外交时，专门提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4个机制，表明了中国新时期多边外交的着力点和工作重点。

六是首次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提升到外交总布局的重要一环，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

国防方面的“五位一体”，可以概括为“思想建设、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军民关系、军事外交”。其中思想建设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魂。中国既要坚持几代领导集体军事思想为指导，又要适应新要求履行新使命，强调“听党指挥”“军人核心价值观”“军事文化”建设。

能力建设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魄。报告明确指出，由于中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因此要求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从速度和规模的角度谈能力建设。(注)报告同时指出，要“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以及应对海洋、太空、网络安全的能力，并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这是从功能和领域的角度谈能力建设。更重要的是，报告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注)这是从目标和任务角度谈能力建设。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能打仗，打胜仗”。凡此不仅给未来中国国防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也首次权威、正面响应了国际社会有关“两岸和平稳定条件下中国国防现代化为何还要保持高速增长”的质疑。

制度建设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神。既要着眼紧跟世界潮流的新军事变革，更要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还要根除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形成的军队懈怠、纪律松散等所谓“和平积习”。[注]对于上述三个方面，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12月8日和10日在广州战区考察时，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三个牢记”，即“牢记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注]其后，在2013年3月11日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进一步将上述思想浓缩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12个字，其中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核心，作风优良是保障。[注]

军民关系可以比作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之血。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不仅是中国军队作为“人民子弟兵”的血脉所系，也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旨在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建设“军民分离”的二元结构状态，扬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零和博弈的观念和理论，树立两者兼顾、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新观念和新理论。[注]其路径是“需求牵引，国家主导”，其目的则是“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入融合的发展格局”。[注]

军事外交则好比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形。长期以来，对外军事交流或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或者进一步退两步，处于亚健康状态。以中美军事交流为例，往往时断时续，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两国战略博弈日益深刻、战略互信十分欠缺的背景下，两军关系如不尽快走上正常化，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掣肘显而易见。报告强调将“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显示出新时期中国对外军事交流更具自信心和主动性，不仅有助于破解中国面临的诸多安全困境，而且对于增加透明度、树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际新形象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台方面的“五位一体”，分别指两岸经济合作、人文交流、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及整体关系。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基础良好、前景广阔，重大问题细化实化、真抓实干。两岸政治关系上，报告指出要“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军事关系上，指出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两岸整体关系上，提出“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注

综上所述，十八大报告既是有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宣言，更是全面规划未来10—30年中国发展的大战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和国家利益拓展，大战略的谋划不仅必然，而且必需。现在，中国已经明确了未来的战略目标，也设计出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布局，但是能否将大战略转化为实际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还取决于战略统筹与协调能力、战略运筹与执行能力、战略包装与宣传能力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取决于国家综合实力与战略意志力，取决于对内外局势的准确判断和正确决策。

很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正是中国内外战略未来努力的方向。过去30年，中国是唯一没有犯重大战略失误的大国。未来3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仍然取决于中国大战略的成功。

大战略布局

从十八大报告全面规划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经历了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上台执政两年多的内政外交实践，中国新时期的全面战略布局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战略布局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六”。

所谓一，是指一个梦想，也就是“中国梦”。关于“中国梦”，各种解读五花八门，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甚至难免庸俗化的特点。但实际上，“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就是八个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既是国家的梦想（国家富强），民族的梦想（民族复兴），也是13亿中国人个人的梦想（人民幸福）。国家、民族、个人梦想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梦”有别于世界其他各种梦的最鲜明特点。

所谓二，是指“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实现中国梦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到建党一百周年的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既是具体的，如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要比2010年翻一番；又是抽象的，是指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既是紧迫的，从现在到2020年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在许多国家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又是可行的，可行性在于这个目标被分解成300多个具体的分目标，每个分目标都有时间表和进度表，确保如期保质完成。第二步是到建国100周年即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根据小平当年的设计，就是指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习近平主席那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梦”梦想成真。

所谓三，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既来源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比较，也立足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科学的论证，不是盲目自信，而是有坚实的基础。另一个层次则是三个自省，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实现两个百年的征程中，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要长期面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个最主要的、根本性的矛盾。三个自信是中国实现战略目标的精神支柱和主要动力，三个自省则是确保中国发展不偏离航道、不迷失方向的根本保障。

所谓四，是指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一切以此为行动的指针和准绳。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双轮驱动：一个轮子是全面深化改革，因为改革是中国实现初步崛起的法宝，改革同样也将成为中国继续崛起的源泉；另一个轮子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才可能使改革具有正确的方向性和可持续性。靠什么去驱动这两个轮子呢？中国的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需要靠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此第四个全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只有确保执政的共产党廉洁、高效、服务人民，才可能使中国改革和法制的两个轮子滚滚向前。由此，构成所谓“四个全面”的整体布局。

所谓五，是指“五位一体”的工作布局。其中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内政工作；包括思想建设、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军民融合、军事交流五位一体的军事战略布局；包括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五位一体的外交战略布局；包括经济交流、政治交流、军事交流、民间交流、两岸和平稳定的制度安排五位一体的对台工作布局；还包括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工作布局。

所谓六，是指对外战略的六大举措。一是带有鲜明新时代特征的战略理念。包括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总体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正确义利观、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等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外交思想。其中核心是合作共赢与命运共同体。二是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引领的大国外交布局。三是以“亲诚惠容”精神为方针的新的周边外交布局，其中最大的手笔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建设。四是以“正确义利观”为方针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新局。五是以“主动塑造、奋发有为”为特点的多边外交布局。亚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博鳌论坛、香山论坛等等，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传递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焕

发新的活力。六是“直面争议、以我为主、强势维权、有序推进”，处理新时期以海上为主的领土、领海等主权安全问题。

“一二三四五六”新布局，给中国的对外战略带来新气象和新格局。其中，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欧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印关系全面企稳回暖，中非中拉关系全面得到提升。由此，近百年来中国首次具备背北面南、坐西向东的有利战略态势，为中国倚陆向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同时也应看到，中日关系跌入低点，中朝关系持续冷淡，中越、中菲关系陷入僵局。而香港“占中”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亦显示，中国崛起的“灯下黑”效应正在显现。当然，最值得担心的，还是中美关系的前景。如果中美关系稳，则上述问题大体可控并能够化解；反之，则上述问题可能更加复杂难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把握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对外战略牵一发动全身的最重大战略性课题。

中国战略需要处理的十大关系

中国的大战略设计显然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群策群力，汇聚集体智能。但无论如何，以下十大关系是大战略设计必须考虑的重要前提。

一是“第二”和“第八十”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维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排在第八十位左右。“横看成岭侧成峰”。世界多国倾向看中国的总量，中国自己则更多强调人均，各有各的道理。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角度看，人均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各国力量对比看的是总量；但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看，人均意义重大，不仅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参数，而且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

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始终将两个参数同时装在脑子里，既要有崛起大国意识和战略自信，又要始终不忘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战略自律；既要客观理性看待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责任的期待，关键时刻敢于出头、出面、出手，培育责任分担意识，又要量力而行始终不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历史重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兼顾双重身份、平衡两种意识，是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培植理性健康国民心态的必要前提。综合言之，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和“有全球影响的区域性大国”界定当今中国，似更贴切。

二是利益扩展与战略跟进的关系。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积攒的巨大能量的释放期。不可避免地，中国的利益由本土走向海外，由陆地走向海洋、太空，陆、海、空、天、网无处不在。但战略设计、战略规划甚至战略能力显然落后于利益扩展，跟不上形势变化的节奏和需求，往往是商人走在政治家前面，游客走在外交官前面，领导人走在专家学者前面。

其结果，利益虽然快速扩展，但利益的保障却相当吃力。由于缺乏中国的全球战略、亚太战略、中东战略、非洲战略、拉美战略，每遇大事，仓忙应对时居多，从容塑造时甚少。例如，利比亚战乱期间，中国上演“世纪大撤侨”，赢得国内国际好评如潮。但回国人员的安置与安抚、在利比亚经济利益的维护等后续工作，仍千头万绪。中国全力推进“一带一路”，但对与此相关的60多个国家的国情有多少深度调研？一路上风险如何规避？这些都是必须直面的紧迫性问题。也因此，中国的大战略规划不仅必须提上日程，而且需要快马加鞭。

三是新问题与新能力的关系。如前所述，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多为过去几十年少见的新问题，这给中国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比如，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既有经济与政治的关联，更涉欧洲、美国的互动，关系金融制度变革和国际体系变迁，既要理论，更需实证，

属典型的跨学科、跨领域问题，需要群策群力、集体务虚，靠单打独斗、闭门造车难免失之偏颇、流于肤浅。再如西亚北非变局，相关专家屈指可数，对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别的研究也存不进则退之虞。

有时国人抱怨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其实反躬自省，中国人对埃及又了解多少呢？既然了解不多，只好人云亦云，有时跟着西方媒体的报道跑。其他诸如气候变化、国际海洋法、网络安全、资源能源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学习新知识、掌握新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现在是体现这种能力，并将学习能力转化为行动能力的时候了。

四是“关键”与“首要”的关系。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有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的提法，这显然是对中国外交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一种平衡，自有道理。但是，随着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及随之而来的大国战略重心汇集亚太，中国的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已经相互交织，“关键”和“首要”已经高度重叠。尤其是中邻（中国与周边）关系与中美关系，已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稳定与推进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是中美必须在亚太地区（即我周边）形成良性互动；发展中邻关系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妥善处理其中的美国因素。

总之，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和中邻关系中的美国因素需要综合起来通盘考虑，谋划新时期的中美邻三边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大战略设计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五是“官”与“民”的关系。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特点，是官（方）民（间）脱节、官媒（体）脱节和军民脱节。这一特点或现象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崛起、互联网泛滥的必然产物，不独中国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这一问题。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官方上百种对话机制，高层交往之频、官方互动之深，在过去和

现在的大国关系中是罕见的。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官方决定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重大问题上多能保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立场和姿态。

但这样一种政治意愿显然未能转化为民间的政治共识，往往官方说一套，民间做一套，官方做法不被民间理解，彼此民间相互对立。对中国外交而言，其直接后果是外交决策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利益集团、媒体民意、社会思潮的干扰或绑架，难以做到果断决策或者决策难以得到顺利贯彻落实。由此导致要么仓促决策、要么难以决策、要么有人叫好有人叫骂，甚至出现国外觉得中国外交“太硬”，国内则感觉“太软”的强烈反差。

凡此对于国际、周边形势异常复杂严峻的中国而言，绝对不是福音。中国外交在做好外宣的同时如何做好内宣，寻求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和理解，如何在加强统筹的同时加大协调，增进政策推进的效力，也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工作。

六是原则与政策的关系。中国是个讲外交原则的国家，其中不干涉内政原则、不结盟原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一个中国”原则等，广为世人所知。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在上述一系列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并在实际运作中遵循这些原则。但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偏废，必须全面辩证地理解。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如何既坚守原则又与时俱进，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不干涉、不结盟等原则，比如符合“联合国授权、所在国欢迎、有助地区和平稳定”等条件的介入算不算干涉？能否思考对某些新问题的“创造性介入”？能否考虑与俄罗斯等国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以应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同盟力”愈加强势的现实？等等。

凡此争论才刚刚开始，但毋庸置疑，随着中国对外利益的扩展、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期望值的加大、国际热点问题的增多以及国内政治思维的新变化，上述原则与政策的关系问题将日渐成为必须面对的外交课题。

七是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从未像今天中国这样深度捆绑在一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陆海邻国分别与所对应的国内各个区域板块发生关系、产生联动，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同新疆，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印度、缅甸局势与西南，均互为联系。中国利益的外溢与外部风险的内灌近年来屡见不鲜。从经济金融角度看，欧债美债危机同中国经济发展、金融风险高度利害攸关，中美之间更几近形成“金融恐怖平衡”。

从战略安全角度看，西亚北非变局、网络安全威胁等，使中国的安全防卫已突破传统的地理边界。中国外交部近年来试行外交干部到地方挂职，抽调地方干部充实外交团队，是连接内外工作的有益尝试。但如何从战略大局高度使内政与外交相协调，避免出现两张皮、两套话语体系的错位，依然任重道远。随着中国崛起效应的扩散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外交的做大做强必须以国内政治的昌明、国内体制的变革为依托。

八是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目前最经典的辩题，辩论的焦点是“韬晦”更多一点还是“有为”更多一点，似乎各有道理。但随着辩论的深入，对此的认识也逐步接近客观和理性，包括：韬光养晦是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哲学和思想精神，而非简单的外交政策选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特色的外交韬略和外交涵养；韬光养晦不意味着不积极作为，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即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

从今往后，中国外交可能更应追求的是积极作为、奋发有为，但在积极作为中也应保持韬光养晦的精神，追求积极但低调的作为，不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九是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关系。对此，国内认识高度不一致：有人认为中国虽面临挑战，但总体的战略机遇还在，因此应该坚持“战略机遇期”的提法不动摇；有人则认为现在是从战略机遇期向战略挑战期过渡的时期，应清醒而果断地丢掉战略机遇期的幻想，直面战略挑战的考验。事实上，机遇与挑战本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随时可以发生转变，正所谓“祸福相倚”。

据此，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以来，有关战略机遇期，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抓住机遇，第二阶段是创造机遇，目前正进入的第三阶段则是从挑战中转化机遇。片面强调挑战而忽视其中可以转换并可以被创造的机遇，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因此，下一阶段的中国外交尤应注重创造力、转化力建设，善于主动塑造和引导，由被动地抓机遇变成主动地找机遇。

十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中国经历了自我封闭、被炮舰打开大门、睁眼看世界、试图学习世界、通过自力更生屹立于世界、通过改革开放再度融入世界等各个阶段，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总是一种奇怪的两个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几乎没有形成对立中的统一局面。

今天，中国已经彻底融入世界，世界各国与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已经成为观察任何国内国际问题的必要前提。如何重新思考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由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级大国的关键。

---

1. 汪铮：《中国有外交政策吗？》，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3月20日。Robert A. Manning, Banning Garret, “Does Beijing Have a Strategy: China’s Alternative Futures ”, On The Horizon, March 2013.再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撰文对中国是否有大战略表示疑问，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共赢”“和谐世界”“韬光养晦”只是政策宣示，还无法让人从中清晰把握中国的大战略。参见Kevin Rudd, “Beyond the Pivot: A New Road Map for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3, pp.10-11。

2. 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傅高义、李光耀等在近期出版的新著中，无一例外表露出对中国大战略的认同和赞赏。比如基辛格曾以“围棋”和“国际象棋”形象地比较中国和西方大战略思想的差异。他不无欣赏地写道：“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做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指毛泽东）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9页，前言，第XII页。再如布热津斯基曾以“六个战略目标”概括中国的“大周边战略”，认为“中国人这六个目标中的每一个，既可以灵活且耐心地去实现，也可以激进地去实现，究竟以何种方式，要看中国是否想破坏美国在东方的地位”。[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李光耀对中国大战略的论述参见：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The MIT Press, 2012. pp.4-13。傅高义的论述参见：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11。

3. 中国有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做了深刻分析。杨洁篪：《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丰富与创新》，载《国际展望》2013年1/2月卷首语。

4. 近年来，中国借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关国家利益的分类，强调所谓中国“核心利益说”，引起国内外不少歧义或困惑，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6.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见http://www.gov.cn/2011ch/content_1825838_2.htm。

7. 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载《党建》，2013年第4期。

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

10.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1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关于战略机遇期，在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报告中也做出了同样判断，报告称：“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3. 王在邦：《试论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王缉思：《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国际环境》，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1期。

14. 习近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载《党建》，2013年第4期，第4页。

15. 厉以宁：《经济观察报》，2012年12月31日。

16. 林毅夫：《中国经济能走好自己的路》，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4日。

17. 王志乐：《以新一轮开放“倒逼”中国改革》，载《经济导报》2013年第8期。此外，诚如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所言，开放的精神是“邓小平最大的遗产”。《邓小平最大的遗产是开放的精神》，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3日。

1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12页。

19.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20.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载《求是》，2013年第4期。

21. 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2012年7月7日）。

22. 2013年，国防预算支出增长10.7%，达到7201.68亿元人民币，虽然同2005—2009年增幅15%—20%相比大幅下降，同2012年的11.2%和2011年的12.7%相比也在放缓，但增速仍超过两位数。

2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页。

24. 《“和平积习”是当前最大的敌人》，载《解放军报》，2013年1月20日。

25. http://news.sina.com.cn/c/2012-12-12/161525795630.shtml.；林平忠：《用“三个牢记”托起强军之梦》，载《解放军报》2013年1月24日。

26. 《习近平提出解放军12字强军目标》，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3-12/0630718260.html。

27. 于川信、甘学荣、陈华胜：《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理性探讨》，载《战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2013年第1期。

28. 《习近平提出解放军12字强军目标》，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3-12/0630718260.html。

29.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第四部分 迈向新型大国关系

第十三章 中美关系“新常态”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形成了以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个《联合声明》为基础的基本框架，也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基本结构。在这种框架和结构基础上，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明文化、发展阶段、地缘环境如此不同的大国，既未发生热战，也未发生冷战，成功运行了30多年，这已经堪称大国关系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当前，中美关系就正在出现有别于以往的重大甚至根本性变化，处理不好，两国关系的未来势必出现重大波折。

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

经过中美关系研究者相对长时期的探索，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已经大体明确且较少争议，大体包括所谓“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性合作”两个方面，它们构成中美关系中相对稳定或相对不变的东西。

关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人们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既然矛盾是结构性的，就难以或根本无法拆解，因此中美之间走向冲突或敌对只是时间问题，例如米尔斯海默等学者就持这种看法。也有很多人不认同，认为所谓“结构性”是个伪命题，是给定的概念而非符合事实，因此中美关系没有克服不了的矛盾，最终完全可能走向合作共赢。

之所以在这里仍愿意探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因为它较为简洁明快地提供了认识中美关系的一种方法和框架，从学理意义上说

有一定价值。关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合作，则尚少有人做学理上的探索。但事实上，中美之间之所以能不断向前推进，必然存在结构性合作因素，在此也一并提出来供进一步探讨。具体如下表所示：

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构

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合作**
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差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	基础：利益深度交织（经贸、安全利益等）
文明、文化差异（东方对西方）	条件：新的时代特征（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等）
地缘政治竞争（主要集中于西太平洋地区、欧亚大陆地区，新近也表现在太空领域）	保障：复合型机制（首脑会晤、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人权对话、经贸磋商、防务磋商、反恐合作……）
“崛起”与“守成”大国的潜在冲突	限制：多国同时崛起而非中国一家崛起
台湾问题上的矛盾	动力：相互需求

其实简而言之，所谓“结构性”，意指比较固化、难以轻易化解或拆解，也不是完全能够凭主观意愿在短时期内改变的东西。“结构性矛盾+结构性合作”并存的基本框架，基本决定了中美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防范又借重、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总体格局，也总体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软硬两手和中国对美战略“两手对两手”的基本态势。正是基于对中美关系这一总体特性的把握，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在其名著《同床异梦》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中美两国都能够对冷战后最初10年间的外交做些改进，但两国相处得再好，也总会呈现出合作与对抗掺杂各半的特征。”[注]这一论断颇似国内流行的“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这一经典结论。这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

先看结构性矛盾。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那些长期形成、严重掣肘两国关系发展、单凭主观意愿难以轻易化解的问题。就中美关系而

言，包括以下五个问题。

一是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的矛盾。也即是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和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经典论著中反复提及的命题。尽管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角度看，崛起国同霸权国的天然冲突难以避免是个伪命题，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似乎证明了其合理性，而那些试图破解这一命题的学派和学者长期处于下风，最终使大国崛起必然挑战霸权国、后兴大国必然打乱国际秩序等论调具有经久的影响力。

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始，美国及西方一些学者即套用这一“定理”或“范式”分析中美关系。但因对中国崛起前景将信将疑甚至不看好，冷战后十多年西方政要、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更多是心理上、理论上或逻辑上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各种“中国崩溃论”的相继破产，中国崛起骤然从“将来时”变成“现在进行时”，中国崛起的挑战也一夜间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又因金融危机而放大，一面是美国经济发展“停滞了三年”，一面是中国经济崛起、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成世界第二“提前了五年”。一进一退之间，中美力量对比的相对差急剧缩小，由此使中美关系的性质从“超”与“强”关系升格为“老大”与“老二”关系，中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首次具有了真实的意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开始成为中美关系流行语。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或与之相关，如何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已历史性地提上日程。

二是地缘政治的矛盾。作为被两洋环绕的海洋国家，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即将西太平洋和欧亚大陆视作全球地缘战略的两大支柱。前者是确保实力的根基，后者是霸权扩张的平台。作为身处欧亚大陆腹地、面向西太平洋的中国，自然与美国构成某种地缘政治矛盾。美国战略界一些人士（如罗伯特·罗斯等人）反复强调中国是“陆权国

家”，美国是“海权国家”，试图以这种给定的或强加的利益划分告诫中国，只要中国井水不犯河水，中美在地缘上就可相安无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埋头经济建设、聚焦国内发展，美国忙于收拾冷战残局和布局美欧俄三角关系，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尚不突出。

但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及国家利益的相应扩展，矛盾随之而来并呈急剧上升之势。在欧亚大陆地带，由于俄罗斯、印度及中亚国家的分解效应，中美矛盾冲突显得并不十分突出，但美国对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如鲠在喉，对中国与中亚、南亚一些国家的油气管道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警惕。随着美国反恐战略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以及美印关系的大幅提升和美蒙关系的暗中发展，中美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博弈似才刚刚开始。

相较而言，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较量更加直截了当和剑拔弩张。因为中国的崛起首先意味着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意味着从“陆权国家”向“海陆兼备国家”正名，因此中国崛起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布局的冲击力显得更为真切和紧迫。奥巴马执政伊始，即高调宣称重返亚太，在东南亚、东北亚各国间巧借矛盾、善用机遇、合纵连横，明显强化对“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战略部署，强硬宣示“航行自由”以坚守“近海侦查”权，积极介入南海争端以期渔翁得利，中国虽非这一切动向的唯一所指，但其指向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

中国在亚太强势崛起，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美两强并立之势正在改写百余年来亚太地缘格局，如何构建中美亚太长期稳定战略框架，也已成为中美关系必须尽快思考的大战略问题。而太空、天空、网络、极地等全球公地的竞逐也提前成为中美议事日程的重点。

三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矛盾。其矛盾的由来及矛盾的深刻性、持久性论者甚多，不拟展开。这里所要强调的是，“9·11”事件后一度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所掩盖的“两制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

主义制度）与“两化斗争”（西化、分化），目前呈逆势上扬态势，只是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在发生变化而已。

从内容看，那种非此即彼的“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较量越来越转变为“发展模式之争”。金融危机后美国模式遭到全球诟病，而所谓“中国模式”则逐渐受到重视和欢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过招虽不像两制斗争那么剑拔弩张，却更加深刻。从形式看，借助脸谱、推特、谷歌等网络手段推进“网络自由”，成为美国对华民主化战略的新趋势。

由此观之，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形式和内容的变异而更加复杂。近期中东、北非乱局再次燃起美国政客们的民主化战略冲动，势必将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更加激烈。

四是所谓“文明的冲突”。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代表，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乃至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亨廷顿甚至断言，未来世界冲突将很可能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结合之间。这虽危言耸听，却反映了西方战略思想界根深蒂固的认识。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诸如达赖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单纯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上找原因还不全面，文化差异是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中国人喜欢先谈战略问题，似乎只要双方认识一致，一切问题均会迎刃而解；美国人则偏好就事论事，凡事先做起来再说，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这些应该可以从文化差异中找根源。

五是台湾问题。自杜鲁门“台湾地位未定论”抛出之日始，迄今半个多世纪，两岸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美台非官方实质性关系有进无退，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两国三方的互动日趋复杂，台湾问题从原本不是“问题”已然固化为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明显缓和，台湾问题搅动中美关系全局的分量有所下降。但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破坏性依然存在，其与中美两

军关系的捆绑性、同中美整体关系的关联性似乎与日俱增。在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拉近的背景下，对台军售作为体现美台特殊关系的纽带作用、对两岸关系实现突破的“干扰作用”显得更为突出。随着中美战略博弈走向深层次和全方位，美国必然还会不时打台湾这张牌。随着2016年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问题是否再成中美关系的焦点，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合作”因素也不容忽视。巨大的经贸利益及由此形成的深度相互依赖格局，形成了中美之间合作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等“五化”并存，形成了中美合作的时代条件；而两国之间搭建的近百种制度化交流渠道，则是中美合作的保障；两国彼此巨大的相互需求，则构成合作的基本动力。

除上述因素外，中美之间还存在另一个比较特殊的重要因素，即文化心理方面的相互吸引和相似性。一是民族构成的相似性。费孝通先生将以汉族为主体、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称为“多元一体格局”[注]；美国移民问题专家则一般把美利坚民族定性为“一体多元”。[注]换言之，中美两个民族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是由文化和价值观（有时体现为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的相似性决定了两国在民族精神方面有共通性。

二是历史、文化情结的缠绕。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将近一个半世纪里，传教士、商人、“门户开放”“庚款”“飞虎队”等，构成了中国人对美国历史记忆的主线。其间虽有美国与西方列强共同欺凌中国的历史，但较之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美国多少显得“没有坏透”。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对中国的孔子崇敬有加，美国精英分子对中国文明怀有敬意[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曾对美国的文化、制度、革命精神情有独钟。中美之间真正的对立，诸

如朝鲜战争、美国扶蒋反共、越南战争、对华遏制、“89制裁”等，主要源自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矛盾而非历史文化冲突，是政治因素作祟的结果。这一特点造成中美关系有别于中日、中俄、中欧等其他大国关系，其中有两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是中国人讨厌、痛恨美国对华干涉、制裁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单边主义作风，但在主体意识上并不仇恨美国人。二是中美关系具有很快、很强的修复能力。1989年至今，中美之间历经众多恶性事件，但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程度有其历史局限性。指望中美关系在近期内发展到美欧甚至美日关系的程度恐怕不太现实，1997年、1998年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尝试的失败很能说明问题。而“结构性合作”因素的存在，则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很难激化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中美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奇妙的状态中蹒跚前行。

基本规律：起伏不定，螺旋上升

回顾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雨历程，“起伏不定，螺旋上升”八个字可以大体概括其基本规律。“起伏不定”指两国关系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而是阶段性出现紧张甚至冲突，但又不致失控，每到危机边缘又都缓解回稳，柳暗花明；由此，两国关系再接着往前走。猛回头，发现中美关系爬坡过坎儿到了新的高度，正所谓“螺旋上升”。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年底中美签署《建交公报》直至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其间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任总统，中国经历毛泽东、周恩来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和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果断决策，中美关系的正常化道路从一开始就体现着起伏不定这一鲜明特色。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的一波三折以及围绕苏

联、越南等区域和全球战略安全问题的针锋相对，使建交历程波谲云诡，其过程足以构成当代国际关系经典教科书。

其后，从1979年建交到1982年《八·一七公报》，双方围绕对台军售问题的斗争依然复杂深刻，最终美国虽以公报的形式明确表示了对台军售质、量递减原则，但旋即又以所谓“六项保证”这一国内文件的方式予以抵消。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依然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但好景不长，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导致双方关系跌至谷底，几近断交边缘。虽经邓小平和老布什总统努力而使关系总体未完全破裂，但此后中美走上所谓“三年一大事、一年几小事”的曲折道路，其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而又起死回生、转危为安的独特历程，在当代大国关系中是极其罕见的。

历史经验

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发展历程，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历史新篇。其间两国关系虽起伏不定、充满波折，但总体保持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轨迹。从中方角度看，至少以下几条经验值得记取。

第一，始终坚持发展双边关系与共同肩负全球责任并重，在二者的平衡中谋求中国国家利益。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毛泽东、尼克松见面是从谈哲学问题和世界格局问题开始的，从此赋予中美关系超越双边、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鲜明特质。换言之，中美发展关系既要着力解决经贸、台海、人权等属于双边范畴的结构性问题，还要着眼应对反恐怖、反扩散、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过分纠缠双边博弈而忽视全球利益，或者过分强调国际合作而忽视两国根本矛盾，都不足取。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应该说较好地实现了两方面的平衡。

第二，始终以经贸关系为基础，将扩大共同利益这一“增量”作为推进中美关系的着力点。中美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将这样一种充满复杂矛盾的关系往前推进，必须依靠不断探索并经营共同利益。经贸关系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从而形成今天这样一种深度相互依赖关系。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贸关系确实起到了稳定中美关系这条航船的“压舱石”作用。

以此为基础，中国始终抓住机遇，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既在维持全球和地区稳定，保持世界经济繁荣等传统问题上进行合作，也突破意识形态窠臼和历史障碍，在朝鲜半岛、苏丹、伊朗等敏感问题上展开合作，还挖掘诸如气候变化、新能源、清洁能源等问题上的合作之道。正是通过这些合作，中美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互为“利益攸关方”。这种注重共同利益的探索和经营、将共同利益转化为战略利益的政策选择，既需要意志力，也需要解放思想；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迄今为止，这一努力是富有成效的。

第三，始终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原则和“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策略方针，从中国整体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高度处理对美关系。中国对美外交原则方针的确立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几乎同步，因此，对美外交从一开始就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服务于到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需要，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需要。中国发展是大局，对美外交是小局；中国发展是目标，对美外交是手段。小局服从大局、手段服从目标，这是基本逻辑。中国现阶段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发展、是强国，这是基本任务。中美实力对比是美强中弱、差距巨大，这是基本现实。因此，韬光养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选择；不是无条件妥协，而是大智慧运用。

中国在台海危机、“炸馆”、“撞机”等一系列恶性突发事件中能够保持冷静头脑，恪守“斗而不破”底线，在坚守国家利益和外交原则的同时不失灵活，通过稳定中美关系维护国家发展战略大局，正是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和方针的结果。同时，在与美国合作的过程中始终坚守政治底线思维，奉行“和而不同”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未曾松动，美国对华“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在中国从未得逞。

第四，始终将对美外交视为重中之重，把握机遇，全力投入，统筹协调，细致工作。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对美关系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之效。将对美外交视为重中之重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对美国实力地位和美国对中国的利害攸关度综合评估后的必然结论。重中之重就意味着投入大、工作细、协调足，还意味着善于抓住并把握机遇。过去30多年，中国抓住了联合抗苏、合作反恐、协调应对金融危机等重大机遇，也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危局中化挑战为机遇，强化了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遏制台湾“急独”方面的合作。由此，极大缓和了中国国际压力与周边安全环境，也使中美关系乘风破浪，向前推进。

“反常态”？

如果将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比作心电图，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心电图上显示的曲线属于相对平稳的正常升降，虽有起伏，但大体可控。而有两个时段，中美关系的“心电图”上要么出现长时段的直线，要么出现剧烈的大起大落，这意味着关系肯定出了问题，蕴藏着大的风险。

从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突发，到小布什2009年年初离任，这个时段中美关系保持了大约8年的和平稳定期，而没有出现以往那样每隔两三年即会出现一次的重大反复，这个时段就属于“长时段的

直线"状况，放在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看，确实显得有些反常。

这8年中美之间当然也有不少波折，但未出现类似"撞机""炸馆"这样的恶性事件，相反，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还出现两次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积极表态。一次是2003年12月9日，小布什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面对全球媒体表态称，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他认为台湾陈水扁当局正在策划的"入联公投"就属于单方面改变现状之举，对此美国坚决反对。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就"台独"发表公开反对意见，是1998年克林顿对台"三不"政策表态（事实上已名存实亡）的具体化。其政策意义在于，从此，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不再是中方担心美方公开支持"台独"这样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而是诸如美国对台军售这样的具体问题。这是历史的进步。

另一次是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著名的"中美关系往何处去？"的公开演讲，提出中美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正面看待并准备接纳中国崛起，并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长期打交道。这在美国对华政策史上具有某种分水岭式的意义。正是受此种思想影响，其后诸如"中美共治""两国集团"（G2）等概念开始不断在美国战略思想界涌现，中美关系呈现出少有的平稳积极面貌。

何以会出现上述"反常"现象？主因是2001年"9·11"事件的突发。"9·11"事件使美国被迫将战略重点放在全力反恐上，相应地，中国威胁或挑战被人为调低。不仅如此，美国还需要中国加大反恐合作。其结果，中美之间原本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被反恐合作所掩盖，由此造成一个错觉，以为中美关系从此进入战略稳定的新阶段，双方战略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某种乐观情绪。2008年8月8日，在欧洲一些国家因西藏"3·14"骚乱而干扰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部分西方政要对华态度游移不定甚至决定抵制北京奥运之时，小布什总统携一家五口如约

而至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并在中国驻留三天三夜，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普遍好感，使上述乐观情绪达到顶点。于是乎，一个上台之初高呼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并声言将“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的美国总统，离任之前居然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

这种乐观情绪显然也感染到了2009年年初上台执政的奥巴马。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就任刚满月即访问中国，并在访问期间有意淡化人权议题，高谈中美“同舟共济”。紧接着，两位华裔内阁成员（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联袂访华，在中国公众中掀起一股新热潮。再接着，曾经以反华著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时隔近20年访华，使两国议会交流热络起来；最后，奥巴马总统在就任不到一年之际对华展开正式访问，开创了美国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访问中国的历史。凡此种种，在中美关系史上是罕见的，正所谓有点“反常态”。

奥巴马政府2009年如此积极甚至有些“反常”的对华政策表现，也事出有因。大体可从三方面寻找答案。第一，奥巴马上台之初，不巧赶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因此摆脱经济困境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环顾天下，能助其脱困的国家寥寥无几。因此希拉里在访华期间避谈人权宗教，大讲“同舟共济”，无非是想将中国拉过去，借中国之力帮美国脱困。有意思的是，这一年美国好莱坞大片《2012》上演，片中少有地出现世界末日来临竟要靠中国人制造的挪亚方舟拯救的镜头，多少反映了彼时美国人的心态。

第二，奥巴马还有一项重任，就是尽快结束伊拉克战争，抽身中东泥潭。因此奥巴马主张将反恐战线从中东回归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出所谓“阿巴战略”。如果说此前美国的反恐战略仅需要来自中国的政治支持和道义支持的话，那么此时奥巴马则需要作为阿巴邻国的中国给予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支持，甚至提出想在中国新疆开辟新的空中走廊。为此当然要对中国放下身段。

第三，作为倡导“无核世界”、主张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生代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还有一个需求，那就是希望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展示合作，借中国之力抵挡来自欧洲的压力，体现美国新的领导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非常现实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对华表现得异常谦恭，并且做出了两项令美国国会议员们大加挞伐的事情：一是该年度没有对台军售；二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居然避而不见，这也是自老布什以来美国第一个在首都不见达赖的美国总统。可以说，2009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积极姿态。

但“福兮祸之所伏”。结果，以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转折点，到2010年年初，中美关系从奥巴马总统上台初年的“高开高走”，突然转向围绕谷歌、对台军售、达赖、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严重对立，然后逐渐实现关系转圜，但紧接着又在黄海、南海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之所以出现风云突变，在美国看来，是中方不仅几乎没有满足美方的上述三项期待，而且表现出少有的“傲慢”，令奥巴马政府感到气馁和愤懑，于是采取连环措施予以反击，以显示美国不会对华示弱。

而在中方看来，则是奥巴马政府太过势利，在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需要中国时满脸堆笑，而一旦金融危机在2010年稍有好转则马上露出霸权主义的真面目。此后，双方的认知差距渐行渐远，都倾向于从负面看待对方的行为，致使中美关系的“心电图”上呈现出大起大落的另一种“反常态”。

事实上，这些“反常态”背后，凸显的是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面和博弈面开始盖过合作面，战略博弈出现以往未曾有过的若干新特点。

一是全面性。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

集，频度很高。既涉及台湾、西藏等中国核心利益（军售、达赖），又触碰网络安全敏感神经（谷歌事件、“网络窃密”问题），还事关中国长远发展（人民币汇率、气候变化），并有引发两国走上军事对抗之虞（东海、南海）。它表明，中美关系已然成为一种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各种问题环环相扣，靠反应式应对或逐一解决已很难，而需要统筹兼顾，从大战略高度去通盘处理。

二是深刻性。此番争斗发生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大时空背景下，也因此使得今天的中美竞争不同以往，被赋予“大国兴衰”“权力转移”“老大对老二”的特殊含义，显得更为深刻。

三是危险性。在中美较量中，不仅直接触及南海、黄海等军事摩擦敏感地带，而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正面交锋，冲击中国金融安全脆弱领域；对台军售问题不仅未能实现妥协，反而强化了各自立场。凡此都有引发两国关系震荡的风险。更何况，上述问题相互牵连，彼此影响，更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四是长远性。中美关系呈现出来的这些新特点显然只是新时期两国关系内涵和外延变化的开始，它预示着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不仅将继续处理以前的争议，还将直面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新常态

上述四个新的特点表明，中美关系在2005—2010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首先，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以及在此之下两国关系的背景和主题的新变化。中美关系的主题已从过去相对分散的意识形态、人权、台湾、经贸等议题逐步聚焦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如何应

对中国崛起这个中心议题。中国选择怎样的方式实现崛起以及美国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矛盾。

简单回顾一下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联合抗苏”，主题虽然集中，但双边关系的内涵并不丰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意识形态和人权领域的斗争，美国对华搞“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中国反“和平演变”、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构成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6年中国大陆在台海进行导弹试射、1997年李登辉“两国论”出台、1998年克林顿对台“三不政策”出笼，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国际秩序之争开始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美国要搞单极霸权，中国坚持走多极化发展道路，单极多极的较量如此剑拔弩张，以至于出现了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两国军机在南海上空相撞的恶性事件。

大体从2004年开始，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再次出现重大变化，中国迅速崛起与美国因应中国崛起开始成为核心议题。从2004年美国大选中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有意避免热炒中国问题始，到2005年年初至年中长达半年多时间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泛滥，再到佐利克“9·21”演讲提出所谓“利益攸关方”概念，以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美国官方文件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再到2008年大选提前炒作中国问题等等现象表明，中美关系应该说出现了某种有别于以往的新气象。

最根本的一点是，美国对华关注重点由“中国问题”转向“中国崛起问题”，“崛起”已经和“中国”构成一个联合词组，成为媒体、学者、官员有意无意间谈论中国的新焦点。兰普顿将这一现象解读为美国对华关注的范式由过去“虚弱的中国”转向现在“强大的中国”[注]；另有美国

媒体形象地称，美国人的中国观正从“世界的中国”转向“中国的世界”。[注]这一变化也可以从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变化中寻找端倪。如果拿最近一个时期的“中国威胁论”与以往比，可以发现，它具有更加全面、深刻的特征，已从以往相对零散、情绪化十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式的炒作，上升到相对理性、广泛参与、焦点突出、带有极强政治和政策意涵的某种战略警示，核心内容则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利益的冲击”以及“中国将如何使用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其他议题如意识形态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国际秩序问题等，开始居于相对次要或从属地位，逐渐功能化和战术化，中国如何顺利实现和平崛起以及美国如何成功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真正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战略问题。这是观察今天及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切入点。

其次，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明显上升，这种战略重要性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冷战后，中美关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一直居于“重中之重”的位置，美国政要也一再强调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过，由于美国忙于处理同欧日盟国关系的转型问题，以及将相当大精力投入美俄关系的调整，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在美国整个对外关系和全球战略中显得并非最突出。

对中国而言，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长期限定在双边层面。这种状况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利益深度相互依赖、安全利益的加深、战略利害的凸显而发生了某种阶段性变化。老布什2005年11月在北京公开强调：“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世界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注]胡锦涛主席与小布什2005年在北京和2006年在华盛顿两度正式会晤时均表示，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注]赖斯、内格罗蓬特、佐利克、保尔森等美高官也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没有任何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更重要

了。换言之，中美双方高层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中美关系已越来越具有牵动国际战略格局的意义。

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在2005年以来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动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从联合国改革到全球经济、金融、能源市场的变化，从反恐、反扩散领域的合作到朝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的应对，从美欧日之间的战略协调到中俄、中韩关系的全面发展等，世界大事都多少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相关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决定展开超越双边一般功能性议题的“战略对话”（美国称之为“高层对话”或“全球对话”）。美国抛开“战略对话”只能在盟国之间搞的顾虑以及中国主动提议展开“交心式”的坦诚沟通，正是两国关系战略重要性明显提升的必然结果。此外，中美两国也开辟了战略经济对话（SED）管道，力图将双边经贸问题提升到战略高度来应对。尽管仅凭战略经济对话无法消除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但这一机制构建的本身说明，作为两个大国，经贸问题再不能简单地锁定在商务、财政部门了。

2006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变革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新构想[注]，决定加大对中国的外交力度，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美中关系战略重要性的提升。这种重要性当然也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警惕达到了新高度。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毫不掩饰地指出，在所有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中，中国“最具潜力同美国展开军事竞争”[注]，而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还只是隐讳地提出亚太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拥有惊人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注]，1997年的报告则将俄罗斯同中国并称为两个潜在对手。[注]显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反击极端伊斯兰主义、反恐防扩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两大重点。

再次，中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在同步发展。从广度看，中美关系已从过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层面逐步拓展到战略安全层面、地区或全球层面以及非传统安全层面。中美战略对话的开展，两国在反恐、防治艾滋病、环境保护、防治禽流感方面的实质性合作，两军关系的恢复，两国科技文化交流的全面展开以及正在拓展的能源合作及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等[注]，表明中美交往领域的空白点越来越少。而经贸关系的日渐深化，也使得双方都承担不起听任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双方因而不能不想办法化摩擦为动力，化威胁为机遇。正如小布什所说，“美国有些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担心，但我不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也是机遇”。[注]从深度看，中美各个领域的对话、交流、合作都在逐步机制化。

除交流机制走向深入外，美国对华战略越来越注重中国的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司法体制、政治体制、宗教体制、社会体制等深层次议题，更加强调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对美外交也越来越注重从政府到国会、从联邦到地方、从官员到学者再到普通民众。“中国文化节”在华盛顿的成功举办，表明中美两种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也将深入开展。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似乎也在寻求一种新的“有限合作”模式，那就是在防止台湾走向独立、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双方有意识地强调彼此的共同利益，并已经展开了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被证明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注]

最后，即中美关系发生的第四个重要变化，是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呈现出某种新的框架或某种新的思维。以佐利克“9·21演讲”为核心，以布什、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政要的一系列言论和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为标志，美国官方在认真思考“美国对华战略”如何朝“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方向调整。

其基本思路是：第一，在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上，“中国崛起论”逐步超越“中国崩溃论”。美国《新闻周刊》知名编辑扎卡利亚从过

去500年国际均势的变迁角度对此做了精辟分析。他认为，17—19世纪是欧洲的崛起，19世纪下半叶至今是美国的崛起，21世纪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的崛起。[注]这一论述在美国很有影响，美国主流越来越认定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难以阻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部分官员和学者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不再担心，只是这种忧虑更多是建立在相对客观的分析之上，或是对“中国崛起论”过热的一种降温和纠偏，与此前“唱衰”中国的“崩溃论”有本质不同。[注]

第二，在对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度上，相对理性的“中国责任论”逐步超越情绪化十足的“中国威胁论”。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可被视为一道分水岭。这样说并不表明“中国威胁论”没有市场，恰恰相反，“中国威胁论”恐怕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始终。但是，从美国政府主流的对华态度看，美国已经逐步超越简单化地将中国视作威胁进而以“基于威胁”为总前提规划对华战略的阶段，开始相对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方向，以所谓“责任论”来敦促、规范、约束、限制中国的内外政策行为。

第三，在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上，“有条件接纳论”逐步超越“全面遏制中国论”。“条件”就是中国的发展必须符合美国的基本期待，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美国所提出的基本“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军事责任、外交责任、战略责任等等。具体而言，美国就是要求并敦促中国政治更加民主、经济更加开放、军事更加透明、外交更加负责、战略更加明确、对台更加灵活。为防止中国不负责任，美国同时做好另一手，给“接纳”中国“上保险”（此乃所谓hedging strategy[注]的本意），包括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加速同日本的军事一体化步伐，谋划同日、韩、澳等同盟国的多边安全网络，历史性地发展同印度、越南、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外交关系，加大美欧之间针对中国的战略协调，深化同台湾的军事情报合作，鼓噪搞所谓美日印澳“民主价值同盟”等等，鼓吹“铸造法制之下的自由世界”[注]，等等，目的是迫使中国只能按美国划定的轨道实现

崛起。但必须强调的是，“有条件”也好，“上保险”也好，都是从属于“接纳”中国这一战略主干，即使反映五角大楼想法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不得不使用国务院系统发明的“利益攸关方”提法，表明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的大政方针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变化的原因

上述变化表明，经过正常化以来30多年的交往、磨合、竞争、合作，中美关系正在螺旋式上升的曲线中悄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复杂性、复合性是其总体特征。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难以“一言以蔽之”，彼此既是可以合作的伙伴，也是必须提防的对手。竞争、合作的态势又因不同的领域而有所不同，简单地用“好”与“坏”来描述两国关系的状态已然不够。这恐怕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跟以往中美关系的起伏相比，究竟有哪些新因素导致此番波折具有全新特质？最根本的不同有两点。第一点，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恰与国际体系变迁相结合，致使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被严重放大。诚然，受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美国国力受到较大影响，而中国经济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使得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之势超出中美两国的预期。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中美实力变化往往同西方世界整体沉沦、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世界权力重心加速东移等国际格局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给人留下美国等同于西方或老牌大国、中国等同于东方或新兴大国的印象，造成中美全面战略较量的假象。于是，积极论者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以合作的方式规避冲突、共同引领世界转型；消极论者则渲染中美“战略对抗”，认为中美提前进入战略摊牌期，“新冷战”难以避免。

第二点，是两国战略心态的微妙变化恰与两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相结合，使得双方的心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影响彼此的战略判断。实力对比的变化投射到国民心态上，呈现出美国自信心下降，敏感性、脆弱性上升，中国自信心加强，自豪感、自傲感上升的特点。而这一变化又同两国国内变化相互影响。

美国方面，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反映在外交上，则强化了国民心态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则是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解读，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

中国方面，随着社会矛盾愈益激化，社会力量日趋多元，对外用强、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从积极意义上讲，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重大领域对美“不能示弱”；从消极意义上看，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因此喜欢一拥而上，与美斗狠。更重要的是，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甚至美国研究也从“开发民智”的初衷变成被媒体和“民智”所开发。[注]

以上两点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分，有多少是虚拟的成分，需要冷静评估。既需要挤出水分、客观分析，如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要有科学、理性认识，对“中国崛起论”“美国衰落论”等要有事实做依据；又需要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两国关系出现逆转的原因及过程要细致研究、逐一排查，防止简单从大战略高度得出粗线条结论；还需要剔除观念和心理上的虚妄和误区，回归常态，类似两国“谁更需要谁”这类情绪化的辩论就并无帮助。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期，气候变化、恐怖威胁、能源危机、资源短缺、极地变异、人口变迁、流行疾病等全球性挑战已然盖过国与国之间的传统竞争。中美双方应抓大放小，暂时搁置双边矛盾与分歧，集中应对更大的全球性议题。这应该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牢牢把握的关键因素。

---

1. [美]兰普顿著，计秋枫译：《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年之中美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导言。
2.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3. 即以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为主体、整合其他少数族裔形成的既松散又有凝聚力的民族体。
4. “修辞立其诚——资中筠先生访谈”，《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15日。
5. David M. Lampton, “Paradigm Lost: The Demise of ‘Weak China’”，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5.
6. 陈雅莉：“牵台湾一发，动中美全身”，[美]《华盛顿观察》（网络版），2005年第46期，2005年12月28日。
7. 乔治·布什在第二届中美关系研讨会“中美关系：外交、贸易、科技”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昆仑饭店，2005年11月14日。
8. “中美关系越来越具全球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21日；“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人民日报》，2006年4月21日。
9. Secretary Condoleeza Ric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Remarks at Georgetown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January 18, 2006. http://www. state. 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
10.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12.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1997.
13.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两国签署《中美教育交流合作协定》。同年秋天，美航空航天局局长访问北京探讨中美太空合作事宜。
14.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
15. 陈水扁2006年5月“过境”美国遭遇尴尬即为一例。但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合作是“有限合作”，双方战略性合作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16. Fareed Zakaria, “Does the Future Belong to China”,Newsweek, May 9,2005.

17. 官方较具代表性的言论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局资深顾问祁锦慕2006年2月2日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所做的听证，参见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0277.htm；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参阅Minxin Pei,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6，以及围绕此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组织的学术争论。参见“Tales of Two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6。

18. 关于“hedging”一词的中文含义，目前国内尚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大体有“对冲”“牵制”“打楔子”“留一手”“两面下注”等不同译法。“两面下注”最为流行。但笔者认为，既然hedging是作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的补充，就不应译为“两面下注”。其具体译法似应根据不同的背景而灵活运用，不应求其一致。

19. 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Co-Directors,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Paper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9, 2000.

20. 王缉思：“对美国研究的几点浅见”，《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第3页。

第十四章 亚太共处：中美关系试验场

中国迅速崛起，美国战略重返，中美两强并立亚太，正在改写亚太地区百余年来的战略格局。中美能否和平共处，如何良性互动，不仅攸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且决定着中美战略关系的未来。

亚太百年变局

长期以来，所谓“亚太”指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美国的决策机构里，主管亚太的官员往往是东亚问题专家，中国也常被视为东亚关系的一部分。但今天，亚太已名副其实地变成了“大亚太”，俄罗斯南下、印度东进、澳大利亚北上、美国重返，使得亚太地区的外延在扩展，亚太实际上已是一个涵盖范围从中亚、南亚到东亚，包括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印度洋、太平洋的广阔地域。[注]就全球区域板块而言，亚太地区不仅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大国最为集中、经济最具活力、争端最为复杂的战略区域。

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的内涵正在发生历史性变迁。这一变迁首先表现为美国重新加大对该地区的重视，并全方位加大投入，以期强化对本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长期自诩为“亚太国家”，但冷战后相当长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因忙于全球战略扩张、深陷中东泥沼，多少疏于亚太经营，以致亚太身份相对模糊。奥巴马上台后，倾力而为者，先是为美国的“亚太国家”身份正名，再是高调宣示重返亚太，然后全面布局“亚太再平衡”新战略，摆出一副将长期以此为战略重心，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全面经营的态势。[注]也因此，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目前终于成为现实。美国高调重返，将打乱亚太既有战略布局，掀起新一轮亚太力量重组和战略调整。

几乎与这一进程同步，亚太地区另外两个主角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状态也在发生历史性转变。自2008年始，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世博、国庆60周年大庆，可谓喜事连连；日本则惨遭地震、海啸、核泄漏，所谓祸不单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这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亚太地区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仅预示着亚太地区日本主导或美日共同主导的既有格局正在被改写，而且意味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现在进行时。这一变化引发的中日两国心态、战略、关系状态的相应变化，以及带动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区域内各种力量的不同反应，从另一方面深度影响着亚太战略格局的演变。

一些长期对该地区涉足不深的大国，包括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也看准亚太在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纷纷加强战略谋划、加大战略投入。俄罗斯介入“六方会谈”，参与东亚峰会，成立远东部，拓展同越、印关系，“南下”势头明显。印度奏响“东进”序曲，提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概念，发展重心明显转向大亚太地区。澳大利亚也将未来的希望放在大亚太的篮子里，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秘鲁等拉美四国组建面向亚太地区的所谓“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甚至欧盟也明确提出要将经营亚太作为未来战略重点之一。

大国力量之变和战略之变自是影响亚太格局变动的关键，而一些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变化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亚太不只中印在崛起，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系列中等国家也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复兴。东盟作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国家集团，以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地区领导人峰会、东

亚峰会等为平台，“四两拨千斤”，作用和影响达到历史高点。而缅甸、朝鲜等国家也都在进入政治经济微妙转型期或过渡期。作为亚太地区曾经的边缘性力量，中亚国家学者提出所谓“中（亚）东亚”概念，希望实现中亚和东亚的深度捆绑，搭上亚太地区复兴的快车。

如此多的力量同时将目光投向亚太，并争先恐后抢占机遇，或者崛起、复兴，或者回归、重返，或者加速变革，使得“太平洋上不太平”。亚太地区能否像过去30年一样，继续保持和平、稳定、繁荣的面貌，抑或从此走上冲突、对抗甚至战争的不归路，成为未来10—20年国际政治领域最重大的关切。

中美战略博弈成主线

在亚太地区众多力量变异或战略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回归，中美战略博弈这条主线日渐清晰，正在成为亚太战略格局中的最主要矛盾，其他如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等，均从属于这对矛盾。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崛起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并至少从三方面挑战其亚太主导地位和全球霸权地位。其一，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崛起，伴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可避免地给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带来资源、能源压力，构成经济上的挑战。其二，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伴随着各方面发展的巨大成功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给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带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挑战。其三，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的崛起，伴随着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扬，以及由此可能诱发的

以非和平手段解决主权和领土争端的可能性上升，给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带来军事安全上的挑战。(注)

这三大挑战大体构成美国战略界人士思考未来对华战略的起点。悲观论者认定这三大挑战只会加强难以减弱，鼓吹尽早对华采取战略对冲甚至军事遏制，以防患于未然。乐观论者则倾向于务实迎接中国崛起，加强美中对话与合作，摈弃零和思维，寻求亚太共处。

而在中国战略界看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至少从以下几方面挑战中国的战略利益。安全层面，美国决意在未来10年将军事力量的重心挪至亚太，并毫不讳言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由此展开的“空海一体战”“濒海战斗舰”“无人战斗机”等针对性极强的军事规划和军事准备，直接冲击中国的近海防御军事体系。在环中国周边进行无节制、无间歇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极大地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在冲绳、关岛、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进行的新一轮包括反导、雷达、先进战机、濒海战斗舰、无人机等大规模军事部署，给中美军事安全关系的未来投下了阴影。

外交层面，美国强化同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泰国等盟国关系，并力推双边同盟走向三边甚至多边。利用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越南、印度、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笼络同中国长期友好的缅甸、柬埔寨，严重影响中国的睦邻外交，使中国同周边一些国家关系出现新的紧张或矛盾。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毫无疑问，2009年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突生龃龉、陡现紧张，同美国“再平衡”战略所为大有关联。

经济层面，美国“借壳上市”、拼力打造的TPP，不仅扰乱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既有节奏，也给中国东亚经济战略布局带来了全新挑战。

战略层面，由于美国全方位的战略重心东移，不可避免地将加大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及战略动作的防范，两国战略互疑可能进一步加深。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仍将持续，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注]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经济发展呈几何级加速度发展，1986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人民币，2001年突破10万亿，2006年突破20万亿，2008年突破30万亿，2010年突破40万亿并首超日本。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

中国在10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换言之，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即使超越不了美国，也将极大接近美国的规模。这一规划同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美很可能在2020—2025年左右大体吻合。这一大趋势意味着，如果说1979—2009年这30年时间里亚太格局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力量之争，那么，自2010年之后的10—20年，亚太格局的主要博弈双方将发生在中美之间，主要体现为两国经济实力对比有可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一个国家如果首先获得了经济实力，然后就会获得相应的地缘政治实力”（尼尔·弗格森）。[注]不独如此，2012年，中国首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继续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大国，科技能力和军事能力也都有长足发展。

这一结论同样从美国未来20年的战略取向中得到验证。那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大趋势只会加强，难以逆转。从美国冷战后的战略轨迹和战略逻辑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即主动谋划

这一进程，1995年、1998年分别发表两份《东亚太平洋战略报告》，1999年正式提出所谓“战略重心东移”说。小布什上台之初，也曾雄心勃勃地要将欧洲、中东多余的军事摆设撤回到亚太。无奈“9·11”事件打乱了这一进程，导致美国多少疏离亚太事务。

奥巴马推动美国战略向亚太转向，其实是承接了冷战后美国几任总统想完成而未未完成的任务。原因无他，在于自科索沃战争后，欧洲冷战遗产收拾殆尽，“西线无战事”；北约同俄罗斯实现了和解，欧俄关系处于可控状态。更重要的是，亚太地区不仅残留冷战遗迹，而且从多方面挑战着美国的战略利益，既有中印崛起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也有盟国离心对美国控制权的威胁，更有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对美国利益的排挤。因此，强化对亚太地区的经营，是形势使然。再从美国目前面临的内外处境看，内部经济复苏、国力振兴是第一要务，奥巴马提出制造业回归、出口倍增等宏伟计划，能助其成功者，环顾天下，唯有亚太。外部从伊阿撤军、战略收缩，撤向何方、收往何处，亚太是最理想的场所。

自1776年宣布独立到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近代发展史是一部自东向西、走出欧洲走进亚太的历史。自1898年到1991年，美国现代史则是一部卷入欧洲事务、争夺世界领袖、战略重心主要锁定欧亚大陆西侧广大欧陆地域的历史。自1991年开始，美国开始享受“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时刻”，虽有意东顾，但野心膨胀，最终在地缘战略上徘徊于欧亚之间，并被迫深陷中东、南亚泥潭。2008年金融危机突发，加之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拖累，美国已然不是当年的美国，世界也已不再是当年的世界。蓦然回首，美国发现经济复苏、霸权维系、战略归依的真正落脚点是广阔的亚太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既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和适应美国发展需求之必然，也是美国200多年历史的又一次大循环，具有某种历史性意义。也因此，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是一

次简单的策略性的战略转向，而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连接军事安全与政治经济、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

奥巴马连任，使得美国继续强化亚太战略布局成为必然，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仍将持续。根据既有西方占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解释和世界历史上大国兴衰的既有案例，两强对立，必有一伤。

那么，因中国崛起与美国重返而形成的中美亚太战略博弈，究竟是会走向新冷战甚至诱发热战，还是有可能规避冲突、实现共赢，迈向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呢？这是未来10—20年亚太和平稳定繁荣的核心命题。

中美亚太共处的可能性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中美完全有可能在亚太避免战略对抗和新冷战。这是一系列重要因素共同决定的。

首先，中美在亚太地区不存在主权、领土、领海争端，也没有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这是两国能够和平共处的重要前提。当然，美国尽管没有主权诉求，却有海权主张，并希望保持在海上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一点与中国的迅速崛起及由此带来的海上利益扩展形成对冲。但相较于主权、领土、领海争端的对抗性和不可调和性，主导权和海权矛盾可以通过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有效的战略对话逐步加以控制和化解。事实上，这也正是中美两国建立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等对话机制的初衷所在。

以美国南海政策为例。概而言之，其政策主张包括：没有主权诉求；在主权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也不选边站；支持多边谈判解决争端；反对采取军事手段或武力胁迫方式解决争端；敦促各方尊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航行自由与进入自由；商业利益不受影响；为盟国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维持亚太海上安全与商贸秩序等。

美国上述政策主张在三方面同中国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一是航行自由问题。美国强调，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及美国在世界其他海域的一贯做法，美国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可以开展类似在公海一样、包括军事侦察在内的一切活动，追求所谓“绝对的自由”。中国虽同样支持航行自由，但反对美国展开具有明显敌意的“抵近侦察”等军事活动。

二是解决方式问题。美国主张中国同南海各主权声索国采取多边对话方式解决主权争端问题，并敦促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中国则强调双边解决，不仅因为既往成功的经验，而且因为与相关国家的争端不尽一致，双边解决更符合实际。

三是军事干预问题。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为美国军事介入中菲领土争端提供了法理依据，一旦中菲发生军事冲突，美国是否介入、何时介入、如何介入，成为中美之间必须应对的问题。

这三大矛盾中，所谓“多边解决”原本只是美国的一种政策倡议，既不具实质意义，也难以做到强制性。军事介入最危险，但从美方的总体态度看，极力避免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仍是政策首选，问题虽然严峻，但可以通过危机预防加以控制。最核心的矛盾是所谓“航行自由”问题。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也非截然对立。中国并不反对航行自由，所反对的，只是美方高频度、多层次的军事侦察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对华战略敌意。如何在都支持航行自由原则的大前提下，

就航行自由的具体内涵及各自理解展开沟通和讨论，是下阶段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博弈的重点。

其次，中美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美国有军事安全优势，中国有经济文化优势，且彼此优势短期内无法替代或转化，两国很难在亚太形成所谓“两极格局”。从经济意义上讲，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除菲律宾外美国亚太四个盟国中的最大贸易伙伴。诚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正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如果现有趋势不发生改变，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进一步得到巩固。”[注]即使美国大力推动TPP和双边FTA（自由贸易协定），短期内也绝难替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

而从安全意义上讲，以美国为核心，以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美泰五大同盟关系为依托，以美台、美新等准同盟关系为辅助的安全体系由来已久，相对成熟与稳定。相较而言，中国与包括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在内的多个东亚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除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外，同区域内国家并无任何军事安全条约关系，奉行的是以“结伴不结盟”为特征的新安全观。即使中国军事现代化超常规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也无法取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全面军事优势。这就意味着，中美在亚太地区难以形成全面的竞争，亚太相关国家也无法在中美两强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能是各取所需，左右逢源，在安全上更加倚重美国，在经济上更多依靠中国，在政治上更多依靠自己。这样一种特殊的二元格局有助于避免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两极格局，也将迫使中美共同思考建设相互包容、和平共处的亚太新格局。

再次，中美不仅是亚太区域性大国，也同为世界性大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中美在全球其他区域及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些重大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气候

变化、资源能源、世界经济再平衡、反恐防扩、朝核伊核、地区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深入的合作。这种全球性责任和全球性合作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矛盾冲突，使矛盾的烈度、强度、深度、广度都相对有限。这是两国能够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的重要补充。

最后，中美之间已然形成的深度利益捆绑和未来10年两国将主要解决国内议程，是两国能够和平共处的内在动力。2014年，中美贸易额突破5500亿美元规模，这一数字仅略低于中国同欧盟28国的贸易总额。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包括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内的上百个双边对话交流机制。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已触及几乎所有重大领域。未来10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国的重要课题是实现经济复苏与国力重振，双方国内议程决定了，彼此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彼此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这一战略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不可或缺的。

更重要的是，尽管两国不同部门、不同利益集团、网络媒体乃至民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或对立，但两国高层之间对发展中美关系仍然拥有高度的政治共识。毕竟，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当今世界，领导人的思维、战略界的观念也都在与时俱进。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很快得到美国高层积极呼应的时代背景。

从更深层次看，中美都是带有很强“例外论”的国家，彼此民族性和发展道路有诸多相似性和相近处。两国面积对等，纬度相近，隔洋而居，相互打量。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很年轻；美国历史不长，但美利坚合众国却已20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美国特色资本主义亦是欧洲资本主义在美洲大陆嫁接的结果，均具有“转基因”色彩。中美有过历史碰撞，但无太深历史积怨。有过兵戎相见，但教训深刻彼此铭记。

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严重，但文化吸引和民间交流异常活跃。美利坚民族“一体多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凡此种种，使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很像：都有大国抱负和使命意识，都很讲原则又不失变通，都善于学习和勤于变革，也都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凡此意味着，中美两国都有开创历史先例的勇气和意愿。这是中美亚太和平共处的内在动力和源头。

中美亚太共处路线图

尽管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全面对抗的可能性较低，但两国要真正实现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共处也并非易事。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构建新型亚太关系。奥巴马总统虽对此有积极响应，但总体而言，美国战略界对此表现出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毕竟，作为长期的世界霸主和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力量，要放下姿态真正接纳一个新兴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并与之共舞，需要艰难的心理调适和战略调整。而这一过程似乎才刚刚开始，未来如何演变还有待观察。因此，中美要真正形成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依然任重道远。

但是，中美谋求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路径是清晰的。关键看两国能否登高望远，把握大势，共创历史，为老问题寻求新答案。亚太地区文明众多、情况异常复杂，中美共处很难形成“中美共治”。亚太各国肩负清除冷战遗产、推进安全与繁荣的多重任务，中美和平共处也绝非单一性框架。加之中美在亚太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合作，而是合作与竞争共存。因此，中美亚太良性互动应是多层次、复合型的动态稳定，是互不排斥、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发展，是双赢与多赢、兼顾第三方利益的新型亚太关系。

具体言之，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有赖于对所谓“一二三四五”等五大问题的处理。

所谓“一”，指的是对亚太地区主导权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破解。关于中美亚太主导权之争，美国方面直言不讳。美国政要不仅反复强调美国在全球“绝不当老二”，而且在不同场合表示将竭尽所能确保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美国既要当世界领袖，也要做亚太“老大”。相反，中国官方不仅从未表达过要做亚太地区领导的想法，而且多次正式声明期待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在2011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明确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两国领导人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21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

尽管如此，美国似乎更多关注的是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亚信峰会上的讲话，并将其简单化地理解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进而认定中国在搞所谓“亚洲版门罗主义”。换言之，所谓中美亚太主导权之争，更多是美国基于捍卫其主导地位的单方面战略臆断，抑或是国际观察家们根据常识得出的结论。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指出：“21世纪将会是一个在亚洲争夺主导权的竞赛，因为这里是增长所在……如果不能在亚洲保有一席，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世界领导者。”注

然而，中美亚太主导权之争绝非空穴来风。历史地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898年美国全面涉足亚太地区之前2000年，中国一直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以朝贡体系为特征的主导地位。很自然，今天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容易被解读为中国正在接近重新获得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而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事实上即开始在东亚确立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实际主导性力量。

冷战结束后20年尤其是“9·11”事件后10年，美国因忙于中东反恐，导致其亚太主导地位客观上出现松动。而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迅猛发展，在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影响力明显加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崛起被解读为重获亚太主导权，奥巴马推动的美国战略重返则被理解为强化对亚太的实际主导权，中美博弈自然就演变为亚太主导权之争。

破解主导权之争，需要从两方面同时着力。一是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防止战略误判。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说：“与那些20世纪渴望全球权力但失败的国家不同，中国此时此刻的国际态势既非革命性，又非救世主，亦非摩尼教特征。”注 如何利用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等机制，准确而直接地传递中国的战略意图，十分重要和必要。而最终的结果，“美国应该默许中国在亚洲大陆拥有突出的地缘政治地位，默许中国成为主导亚洲经济的大国”。注 二是深化战略合作，寻求利益汇合点，通过具体的合作形成共同的规制。诚如基辛格所说，美国和中国应该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个共同事业就是构建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太平洋共同体”。这取决于中美两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注

所谓“二”，指的是“二”套体系的对接。一套体系是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美国亚太“轮辐安全体系”和以新安全观为指导的中国合作安全、集体安全框架，另一套体系是以TPP为推手的美国跨太平洋经济体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这两套体系同时存在却彼此没有交集，长此以往，迟早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负面影响。未来，中国与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体系能否实现如俄罗斯与北约目前这种对话合作机制，美国能否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参与到上海合作组织，美国是否真心接纳中国参与TPP，中国有朝一日会否加入TPP，凡此都是必须思考的战略性课题。

所谓“三”，指的是南海、东（黄）海、台海“三”大海域的危机预防。南海地区目前是中美竞逐的热点区域，不仅事关中美海权之争，而且深受越南、菲律宾等第三方影响。尤其是美国与菲律宾是条约盟友，中菲黄岩岛之争势必诱发美国介入，进而形成中美正面军事对抗。中美如何在广阔的南海海域形成新的行为准则，对抵近侦察、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等进行更明确的界定，规避对抗、冲突，成为当务之急。

东（黄）海地区涉及中日、中韩主权之争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历来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最为脆弱的区域之一。目前中日钓鱼岛之争已经牵动中美日之间的复杂博弈，美国摆出一副强力干预中日主权之争的姿态，增大了中美军事对抗的风险。朝鲜半岛的不确定性并未因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而减缓，朝鲜导弹试验的冲击性、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朝韩关系、朝日关系的下一步演变，都有可能牵引中美两国围绕朝鲜半岛的复杂互动。

台海地区目前相对风平浪静，两岸关系也步入和平发展的正轨，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看似有所下降。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台关系的发展丝毫不逊于两岸关系，而马英九“亲美友日和中”路线也为台美关系的发展埋下伏笔。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及民进党的再度执政，使得台湾问题的潜在不确定性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美亚太博弈深度展开的大背景下，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四两拨千斤”的战略地位反而更加突出。

所谓“四”，指的是需要重点经营的“四”对三角或三边关系，包括中美日、中美印、中美俄和中美澳。之所以强调这四组关系，是因为相对亚太其他区域力量，日本、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属区域大国，中美同区域大国之间形成三边战略对话，不仅有助于减缓各国对中美搞亚太“共治”的疑虑，也可调动各国参与中美共建亚太新秩序，实现共赢和多赢。这是实现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础。目

前，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构建美中日、美中印两个三边对话，旨在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大国合作体系，既以“二对一”的方式管控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又以中美合作牵制日印的离心倾向，可谓一箭双雕、用心良苦。尽管如此，推动这两个三边关系形成对话合作机制，未尝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只是中美俄、中美澳两对三边关系也同样需要加大重视，由此形成一种总体布局。

所谓“五”，指的是中美在“五”大地区多边机制（或准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它包括：中俄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同美国的关系，APEC中中美合作的方式，东亚峰会中中美各自的作用与战略协调，TPP和亚投行及中美今后是否彼此参与问题，以及中美如何共同构建广泛的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等。

上述五个方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和良性互动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将成为未来10—20年中美关系必须处理的重大战略性课题。而中美新型亚太大国关系之构建，将终结于上述课题完结之时。

---

1. 在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中，“亚太”指的也是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广大区域。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2. 201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明确指出：“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紧密相连，而亚太的未来依靠美国。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在继续领导亚洲方面具有重要利益。”Hillary Rodham Clinton speech in Hawaii, “Architecture in Asia-Pacific: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12 January, 2010. 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1/135090.htm.

3. 比如，2011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指出：“我们将认真监视中国军力的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和战略意图，以及它在太空、网络空间、黄海、东海和南海的主张。为保卫美国和伙伴的利益，我们准备展示我们的意志并使我们的力量去反击任何企图危害进入和使用全球公域和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或威胁我们盟友的行为。”参见：Joint Chief of Staf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February 2011. p.5。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5. [美]亨利·基辛格、尼尔·弗格森、法里德·扎卡利亚，[中]李稻葵著，蒋宗强译：《舌战中国：21世纪属于中国吗？》，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6.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7. 转引自：[美]阿伦·弗里德伯格著，洪漫、张琳、王宇丹译：《中美亚洲大博弈》，新华出版社，2012年，序言。
8.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9.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10.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6—517页。

第十五章 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如何应对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美国在思考，中国也在探索。如果说，美国囿于一贯的霸权思维，无法创造性地提出有关中美关系的新倡议，那么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必须率先就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我们的主张。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应运而生。“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政府主动塑造或引领中美关系的重大尝试。因此，对其做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展望，显得十分必要。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中美关系正常化30多年的历程显示，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文化、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大国，基本实现了和平共处，既未发生热战，也未出现冷战。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其实已经形成了某种有别以往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验的总结，包括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等论断、江泽民“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等尝试、胡锦涛“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等努力。

同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提出，也同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2009年1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在中美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

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战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2009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达赖、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

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例如在军售和达赖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一度认为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中美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见达赖。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

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

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

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1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TPP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半个月后，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

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

仔细研读希拉里的上述言论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此前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双方共同决定在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

习近平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戴秉国、刘延东也分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具体阐释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老大—老二”的关系，是既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

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国内生产总值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

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的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是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

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

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

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去40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目标，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感觉，形成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

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建设性合作的对美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是试图进一步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和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

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二战”后美国同欧日的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

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

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0多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0多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

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双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时代条件

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

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依存又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

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

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认知条件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遗憾的是，美方部分人士后

来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开始排斥，或者三缄其口，个中原因十分复杂，自是后话。但事实证明，美国高层最初对此是相当认可的。

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再次，中美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一步步走出来，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沟通框架

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国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与习近平副主席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上百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首脑热线、国防热线。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和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

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

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国防部长梁光烈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

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地方交流迸发出巨大能量。两轮下来，已有来自中国浙江、湖南、北京、辽宁、安徽、江西、山东、云南、江苏、内蒙古、湖北、河北、福建、贵州、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美国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关岛、夏威夷州、北卡罗来纳州、北马里亚纳群岛、加利福尼亚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伊利诺伊州等26位州长面对面交流，形成了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热潮，结出了互利共赢的积极硕果。自1979年10月31日我国湖北省与美国俄亥俄州正式结成中美间第一对友好省州至今，30多年间，中美两国已结成43对友好省州和200多对友好城市。美国成为与中国结成友好城市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统计，2005年至2014年，美国有42个州对华出口实现三位数增长，其中南卡罗来纳州、亚拉巴马州等5个州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0%。2014年，美国有39个州把中国列为前三大出口市场，31个州对华出口超过一亿美元，其中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位居美国各州对华出口前5名。与此同时，美国一些相对较小的州也从对华出口中受益，比如特拉华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内华达州过去10年对华出口增长均超过300%。这股地方交流的力量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

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美国盖洛普网站2012年2月的民调显示，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63%的人认为中美“虽不是盟友，但友好”。美国“百人会”2012年4月的民调显示，近8成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2014年双方人员往来近430万人次，两国在对方国家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50万，中、美分别成为对方国家第一、第二大国际学生来源国，目前已有超过10万名美国青年在华学习和一万多名美国学者来中国访问交流。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共同利益驱动

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500亿美元。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583.9亿元，中国已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05—2014美国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显示，2014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200亿美元，与2013年大体持平，过去10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19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目的地，目前仍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2014年美国对华出口主要涵盖交通运输设备、农作物产品、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化学产品等类别，还支撑了美国港口城市与出口相关的大量就业岗位。另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国新批设立美资企业1176家，同比上升10.8%。美国对华实际投资26.7亿美元，在对华直接投资中排名第六。截至2014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超过6.4万个，实际投入754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已批外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的8%和5%。2014年，中国内地对美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2亿美元，同比增长27%。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各类投资超过385亿美元，美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2006—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

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急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

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迎接纷繁复杂的热点问题的挑战，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上述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第一，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但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

略考验；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摩擦面加大。因此，如何尽快建立新的战略基础、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就显得格外紧迫。

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二十国集团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

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着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5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于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

三是着眼于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核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价值观是介乎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之间的中间地带，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第二，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

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到位。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建立并成功运行，取得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难以奢求的众多具体成果。

这充分说明，人文交流既因其低政治性而较少敏感，又因其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潜力无穷。2012年，习近平同志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也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重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目前，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习近平同志访问五角大楼期间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指明了军事交流在新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第三，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

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深化了不同层次的双边关系，也大力拓展了多边外交，但三边外交仍着力不够。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需。其目的，仍是要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有关对抗的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

目前，美国正在收缩战线、深化变革以尽快脱困重振，欧盟亦在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以图困中求变，俄罗斯坚守底线追求“伟大复兴”，各大国几乎均在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在这轮全球性大变革、大调整浪潮中，中国只能乘势而上，否则便会不进则退。

第五，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0多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0多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

其最大贡献是能够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而实现这种超越，既是因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是因为长期隔绝使得当时中美双方没有日常的短期问题，所有问题都是长远的和战略性的。今天的中美关系现实则既需要解决战略性问题，还需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日常问题，既要登高望远，还需脚踏实地。这对新时期中国的对美工作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40多年前的中美握手迎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翻开了两个文明大国携手共进的新篇章。40多年后，经历了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中美延续着“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态势，努力超越大国对抗的历史逻辑，书写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篇章，把“共赢”的福祉带给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

40多年来，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能否以合作、共赢的姿态走出一条新路是关键。

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中美关系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的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对于两国的领导人而言，这不是一道选择题，因为从中美和世界的福祉来看，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项。

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未来一条可行的路径，是从以往的求同存异，转变为今后的聚同化异。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有何区别呢？这必须首先从中美之间的同和异说起。

中国和美国，一个雄踞欧亚大陆，倚陆抱海，一个坐落美洲大陆，两面环洋。两国面积相近，纬度相似，遥遥相对，隔洋打量：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一个是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一个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但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看，美利坚合众国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已有200多年历史），一个是古老的东方文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60多年，仍相当年轻，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远不如美国）；一个是称霸世界半个世纪的既成大国，一个是综合国力发展最为迅猛的新兴崛起大国。一句话，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地缘环境等，均完全不同。

但进一步分析，这不同之中其实也有诸多相同抑或神似之处。中国56个民族和谐共处，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美国更是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汇聚之地，是以WASP为主体的“一体多元”大拼盘、大熔炉。这种相近的民族特性，决定了两国在文化品格上的诸多共性。

一是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或民族主义情绪，因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各不同民族“合众为一”的黏合剂。美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凭借的是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美国“世界第一”的自豪感，以及阶段性地渲染外部威胁甚至发动对外战争，自信心、自豪感和危机意识、霸权意识相互交织；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则来源于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传统，近百年抵御外敌形成的民族凝聚力，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崛起，以及对外部威胁和内部挑战的时时警惕，同样也是自信心、自豪感和危机意识相互交织。

二是都认为自己“例外”或“唯一”。美国“例外论”经久不息，自不待言，中国也始终强调自身“特色”或国情的“特殊性”。所不同者，美国总是因“例外”而自觉“高人一等”，中国则因自身特色而寻求被人尊重。

三是都很讲原则。这是“例外论”和“特色论”自然延伸的一种民族性。美国大讲自由民主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市场经济原则，进而每每强调所谓规则的重要性。中国的原则性丝毫不亚于美国，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不一而足。所不同者，美国往往希望将自身坚持的原则变成普世原则和普世价值，将原则作为干涉、打压或塑造别国的工具。中国则将原则视作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彰显自身特色的基础，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立场。因为原则立场很难松动，中美存在一些难以通融的结构性矛盾，但同样因为都很讲原则，彼此都视对方为值得尊敬的对手。

四是都很务实。美国尊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处理国际关系更多奉行现实主义。中国自古强调“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为人、处事、治国讲求“入世”，追求“实事求是”。这种务实态度使得中美在讲求原则的同时也不失灵活，较好地把握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

五是都有大国心态和大国抱负。美国有美国梦，中国有中国梦，梦想的前提或基础都是大国地位，美国期待霸权永续，中国追求民族复兴。

这种“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的交织，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两国民众彼此的情感也十分微妙。美国作为西方列强之一，曾参与瓜分中国，中美也曾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但中美不像中日，彼此之间没有很深的历史积怨。相反，清华园、飞虎队、乒乓外交、大熊猫的故事广为流传。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曾是美国的冷战对手，冷战后也仍被视为意识形态的异类，但美国战略界

多数认为，中国不是苏联，美中可以成为“利益攸关方”。中国看美国，既看作必须防范的对象，也视为必须学习和追赶的国家。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认知下，中美之间既是必须防范的对手，又是可以合作的伙伴，既竞争，又合作。而竟、合之选择，则全凭时空条件的变动和国家利益的变化。

如此多的“同”和“异”集于中美，使得这对关系的处理必须时时把握技巧、平衡、细致和耐心，因为一旦过于趋同，则难免丧失自我；而一旦把“异”放大，关系必然破裂。建交以来30多年，中美关系之所以在曲折中仍能不断向前发展，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求同存异”，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斗而不破，合而不同”。

在经历朝鲜战争中美走向敌对的冷战时期，两国之所以最终走到一起，是因为面临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由于这种“同”，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勇于破冰，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小球转动大球”，邓小平最终拍板，促成中美历经多年谈判而最终建交。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经贸、人权等问题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连美国对台军售这样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也可留到建交之后去处理，正所谓在求大同的时候也存大异。这种大开大合，展现出大智大勇，大胸襟和大视野。由此，中美关系这盘死棋走活，中国改革开放这盘新棋开局。

冷战后，苏东阵营解体，中国成为许多美国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社会主义“最后的堡垒”。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的中国人，也视美国为西化分化中国的罪魁祸首，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终结，对抗期再度上演。在这关键时刻和转折关头，两国领导人再次认识到求同存异的重要性，再次意识到斗而不破的真谛。这时的“同”不再是“共同的威胁”，而是“共同的利益”，尤其是经贸利益。美国高层和战略界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领导人也深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要继续推进，离不开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必须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

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其后，1993年江泽民主席访问西雅图，中美关系步入正轨。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谈判，中国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美经贸关系由此进入飞速发展期，中国崛起也迎来加速度。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两国领导人迅速将“反恐”视作中美之间的大同，展开全面的反恐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小布什政府调整此前对华强硬政策，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提出中美可以成为“利益攸关方”，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阻挡，表示愿意同中国展开全方位合作。中国领导人则审时度势，在中美反恐合作中争取主动，赢得战略机遇期，中美关系由此保持了大约8年的和平稳定。其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法、英、德、日，跃升为世界第二。

求同存异重在一个“求”字。“求”首先意味着准确判断形势，明确哪些是彼此真正共同的利益；其次意味着主动争取，一旦认清形势看准共同利益之处，即善于和敢于抓住机遇，变不可能为可能；最后则意味着要精心呵护来之不易的合作，不因一时一事而断送大局。人们常说“9·11”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但如果当时中国仍记恨美国的“炸馆”“撞机”，而对“9·11”事件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对美国的反恐行动作壁上观甚至落井下石，中美关系的局面很可能被改写。

求同存异还在一个“存”字。中美如此多的差异、矛盾或分歧，在无法化解或破解时，怎么办？办法就是先存起来，别让这些分歧阻碍两国合作大局，不让这些矛盾掣肘两国发展大计。“存”字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承认两国“异”的合理性。“赤橙黄绿青蓝紫”“万紫千红才是春”，对彼此的差异要理解或尊重。

“求”与“存”之间，体现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胸襟，展现的是战略家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在求同存异中抓大控小，在登高望远中砥砺前行。

如果说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发展的宝贵经验，那么展望未来，简单的求同存异已然不够，中美关系要继续向前，还需要进一步的聚同化异。

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纵深发展，中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交流越来越频，沟通越来越畅，理解越来越深，相应地，“同”的一面越来越多。比如，两国都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面临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问题的共同威胁，面临海空天网等战略“新边疆”带来的共同难题，面临维护和改革既有国际和地区秩序的共同任务，面临深化经贸合作、引领全球经济方向的共同责任。总之，“同”的清单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如何将如此多的“同”整合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础、正能量呢？这就需要在一个“聚”字上下功夫。跟过去相比，“同”显而易见，不用“求”自然在。但跟彼时“共同的威胁”或“共同的利益”相比，此时的“同”更多体现为彼此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显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这就需要将散见在各领域各角落的“同”聚拢到一堆，由若干“小同”变成支撑中美关系的“大同”。

习主席2015年9月的美国之行，就体现出聚小同为大同的用心。何为“大同”？对中美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言，没有什么比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引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对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而言，没有什么比携手深化经济相互依赖、共同助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走向复苏更重要的现实责任；对中美这对网络安全的冤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确定彼此网络安全行为准则、塑造全球网络安全秩序更紧迫的战略任务。其他如气候变化、全球发展、国际维和等，都是中美必须聚拢的“大同”。有如此多“大同”在心，何愁中美不能合作共赢，走向新型大国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实力对比逐步拉近，战略博弈日益深刻，中美之间的“异”也与“同”一样，水涨船高，越来越多。旧有的台湾、西藏、

宗教、人权、经贸等矛盾依然深刻，新发生的南海、网络、金融、军事等问题层出不穷。老问题因存留下来而未解，新问题因刚刚浮现而待解，新老问题交织，旧怨新仇叠加，如不及时化解，势必相互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比如中美关于台海问题的旧有分歧就很容易跟当前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形成联动，造成“三海共振”效应，这无疑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大问题。因此，将“异”仅停留在“存”上恐蕴藏风险，而降低风险的有效办法，是将其中一些可以化解的“异”尽量“化”掉。这里的“化”既有消化、化解的意思，也含转化之意。

比如，最近两国关于网络安全的斗争几近剑拔弩张，看似无解，但本着化异的精神去处理，则发现危中有机、否极泰来，最终，两国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协议，对中美对全球都是福音。以此类推，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何尝不会转化为就海上安全问题形成中美共识或行为准则呢?

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发展的法宝，聚同化异则是中美关系未来30多年发展的任务。如今，中美关系正步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伟大征程，在这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长征路上，既要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更要学会聚同化异的本领，这是中美关系走上更高境界的必然要求。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第十六章 中国再出发：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其意义堪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相比。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不仅创造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而且也推动了中美关系超出想象的大发展。那么，中国新一轮改革与新时期中美关系是将延续以往同步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还是会出现某种新变化甚或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大转折？这是决定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中国再出发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设定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描绘了“第一个百年”所应实现的分目标及300多项具体改革任务。这些任务或目标汇聚成一句话，就是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既然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注]，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一句话，这将是一场全局性、全面性、根本性的改革，不是小改，而是大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内外不少人士将此次改革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二次改革”。[注]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的范围和领域之广，决心和力度之大，

从陆续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组织机构设置中，从中央以空前力度铁腕反腐从而为深化改革扫清障碍中，从新领导集体积极进取、全面布局新时期对外战略中，均可见一斑。

新一轮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其阶段性或核心目标则是十八大确立的“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屈指一算，从十八大起到“第一个百年”的2020年（或2021年），只剩下五六年时间。要在五六年时间内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300多项任务，建成惠及13亿多中国人的较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谈何容易！且不论国内各种利益藩篱的牵绊，新一轮改革要获成功，必须以“四个继续保持”为前提。

一是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曾使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超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未来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看来“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因此中央提出换挡回落，保持7%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目标，并以所谓“新常态”概括之。“新常态”的积极意义在于，将推动中国经济优化结构，倒逼中国经济寻找新动力，从而实现全面转型升级。

但毫无疑问，新常态之下的中国经济也将同时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和不确定风险，尤其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挑战。如何在底线思维即“忧患心”和战略思维即“平常心”中保持平衡[注]，继续保持经济稳中有进，是关系中国新一轮改革成败的重大考验。

二是继续保持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条，是中国在保持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保持了政治社会总体稳定，不仅避免了像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解体那样的历

史悲剧，而且也成功应对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同样阶段政局动荡的难题，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中国改造论”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迸发出新的活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三个自信”应运而生。

但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新阶段，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越发深刻难解。诚如有学者所概括的，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与政府组织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经济高速发展与改革目标全面性之间的矛盾、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与责任主体的相对单一之间的矛盾等[注]日益突出，全面冲击着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以“东突”暴力恐怖主义为标志的新安全威胁，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舆论环境，以群体性事件为特征的新民众诉求，等等，全面考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维稳能力。

三是继续保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社会活力，都必须落实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来”。[注]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温饱，进入了小康，这正是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然而，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80多位的落差，区域、城乡、贫富之间日益累积起来的差距，民众对中国梦的美好预期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包括物质的、环境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追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是如何继续保持国际与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以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开局，以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

境为条件，以对外开放学习一切有益于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取向。面对国际与周边局势风起云涌，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始终坚持韬光养晦、斗而不破等基本原则，始终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善于抓住并运筹各种战略机遇，终使中国和平发展爬坡过坎儿达到新的高点，中国也由此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和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实力地位的提高与战略利益的扩展，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周边形势从未像今天这么复杂，内外两个大局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缠绕。中美博弈日益深刻，中日僵局一时难解，中越、中菲争端此伏彼起，国际安全问题热点频发，加之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国际能源形势的不稳定性，均考验着新时期中国的战略智慧、战略意志、战略能力与战略定力。

上述四个前提交互影响、系统联动，而对于领导新一轮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还将长期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四个前提加上四大考验，足见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说其中多数方面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的主动作为和积极进取，那么，能否继续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则主动权不完全操之在我，显得尤为关键。而在其中，唯有中美关系不仅能够全方位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也能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因而仍需高度重视和精心维护。

历史的启迪

回顾历史可知，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谓相辅相成、互为因果。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吹响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号角；三天后，12月16日（华盛顿时间15日），中

美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天后，也即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后十天，1979年1月1日，中美对外正式宣布建交；四周后，也即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历史性访美。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启动在时间上的高度契合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和历史必然性。诚如有学者所言："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它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注]可以说，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没有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而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难以顺利地展开。这种良性互动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结果，即中美关系不仅全面影响着中国国际与周边战略环境，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发展进程。

自此以后的35年，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中国和平发展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保持"波浪式前进"的总趋势，取得了超乎想象的大发展。经济上，两国经贸关系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格局。政治上，两国对话沟通管道日趋完备。社会文化上，两国交流机制丰富多样，成果显著。战略安全上，从朝核、伊核到苏丹、叙利亚，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反恐合作到抗击埃博拉病毒，从两军交往到网络对话，中美保持着全天候密切沟通。

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之所以同步启动且并行发展，最根本的一点，是过去30多年年两国对彼此战略的总趋势是相向而行的。从美国方面看，其对华战略几十年未变的一个基本思路或逻辑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体系的力量约束或规范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而塑造改变中国或中国自我改变的环境。中国对美战略几十年坚持的一个大方向，也是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

离、在参与融入改革既有国际体系而不是打破这一体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展自身利益，实现和平崛起。

实践证明，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相向而行的状态下，中美关系虽冲突摩擦不断，但总体保持既竞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格局。用基辛格的话说：“尽管两国的出发点迥异，八位美国总统和四代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微妙的双边关系时却显示出了惊人的连续性。双方始终尽力维护这一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使之不受历史纠葛和各自国内考虑的干扰。”[注]

但细加考察可知，过去30多年美国对中国的接纳，实际上是有条件、有目的、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首先，它是在中美实力极不对称的前提下，美国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对国力相对落后的中国的开放，既旨在借中国之力遏制苏联的扩张，又企图敲开中国的市场、改变中国的政治，进而将中国吸纳进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自由民主”的西方体系，服务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注]

其次，美国对华战略从来都是两手。以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标志，过去30多年的美国对华战略大体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称为“接触+遏制”，接触旨在改变中国，遏制旨在搞垮共产党政权。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改变论”在这一时期甚嚣尘上、此伏彼起，不是偶然的。然而事与愿违，历史的发展正好走向美国预期的反面。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强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不仅未被改造，反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活力。面对现实，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论”，主张美国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务实面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学会跟一个崛起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平共处。

因此，自此之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可称为“融合+牵制”，即努力将崛起的中国塑造成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变体制外的约束为体制内的整

合，并辅之以必不可少的防范和牵制，以此规范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方向，使崛起的中国依然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中国崛起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搭便车论”纷纷扬扬，盖因如此。

从中国方面看，邓小平以高超的战略胆识同时启动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在下一盘中国现代化的大棋。一方面，面对苏联、越南北南两线的双重安全威胁和战略压力，尽快推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符合中国战略利益；另一方面，拯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全面启动改革开放，更绕不开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市场。邓小平这种微妙而又大胆的策略，在他历史性访美的行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基辛格的描述，“邓小平访美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在于恐吓苏联。邓小平在美国为期一周的访问既是外交峰会，又是商业访问，外加巡回政治演说，还有为对越作战进行心理战”。[注]自此之后，中国一直将对美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经历了学习美国、防范美国、追赶美国等不同阶段，奉行“以两手对两手”的策略，既合作又斗争，既学习又防范，既追赶又自制，较好地保持了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大局，由此才确保中美关系在起伏不定中始终保持螺旋式上升的总体方向。

一句话，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几乎同步发展，总体都是成功的。今天，在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段，中美关系还能延续以往的轨迹吗？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中美关系部分质变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发现，中美关系已经或正在出现有别于过去30多年、具有一系列新特点的重大甚或根本性变化。

首先，两国实力对比出现重大变化，大体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十多年，美国深陷两场战争、一场危机，经济低迷、社会矛盾、政治极化相互影响，软硬实力遭到重创，过半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综合国力出现重大飞跃。

美国战略界在认识和评估中国时，看到的其实远不只是经济崛起，而恰恰是中国有别于苏联的复合型实力。[注]更重要的是，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国际大势产生共振，更放大了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态势。其结果，中美关系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超”与“强”关系变异为特殊意义的“老大”与“老二”关系，美国对华战略也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思考如何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博弈面明显增强，且更多地事涉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领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两国战略态势出现重大变化，亚太地区愈益成为两国竞合博弈的“战略场”。从中国方面看，奥巴马政府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次重大转向。如果说20世纪末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21世纪头10年美国战略重心在中东，那么，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美国的战略重心已明确转向亚太。美国的这一战略轨迹从克林顿执政后期已现端倪，小布什执政之初本欲实施，无奈“9·11”事件突发延滞了这一进程。

因此，奥巴马启动“亚太再平衡”与其说是在谋划“后反恐时代”的美国对外战略新格局，不如说是在承接“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地缘战略大棋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术

性“再平衡”，而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连接军事安全与政治经济、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全局性的战略重心东移。奥巴马总体外交在美国国内虽频遭诟病，但美国两党及重要战略界人士几乎都认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任凭乌克兰变局和中东乱局的干扰，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大基调似乎不为所动，只是策略手法略为调整而已。

这一重大战略转向虽非全部冲着中国而来，但其力量布局、战略投入及各种造势，对中国已经构成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战。[注]而从美国方面看，中国的对外战略也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近年来，美国有关中国正在放弃韬光养晦，对外更加强势、更加突出军事实力等论调不绝于耳。概而言之，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有条不紊地从陆地走向海洋、迈向太空，从亚洲走向非洲、走进拉美，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与军事建设并重，凡此对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甚至全球领导地位形成了挑战。

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被认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借钓鱼岛争端强化东亚军事部署，进而逐渐将美国排挤出“第一岛链”。中国加强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则被描绘为另起炉灶，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安全体系。[注]总之，在美国看来，如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呈收缩之势，那么中国的外交则在全面扩张。而事实上，美国所谓“收缩”更多体现在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中国所谓“扩张”也仅意味着在亚太地区捍卫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意志更加坚定。这一局面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短兵相接，展开正面的、全面的博弈，彼此既未做好完全的战略和心理准备，又缺乏现成的规则和路线图，能否在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共处，成为考验两国关系最突出也最紧迫的战略性课题。

再次，两国战略基础出现重大变化，支撑中美关系的既有战略基础逐渐松动，而新的战略基础尚未确立。稳定的战略基础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是共同对付苏联；冷战后10年，是全球化大潮下的经济合作；21世纪前10年，中美关系发展顺畅，则得益于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双引擎。

现在，这两大基础同时出现松动。一方面，美国虽仍然强调恐怖主义是头号威胁，但从其全球战略布局看，从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一面愈益凸显。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美经贸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互补性在减弱，竞争性在增强。奥巴马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中国则倡导自主创新、对外投资，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新变化如应对不当，有可能使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成冲突点或摩擦源。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对美反向投资潮，如2012年万达收购AMC娱乐控股公司，2013年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公司，2014年中国安邦保险集团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乃至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交所创造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上市活动等等，美国既乐见其成，又心态复杂。两国近年有益尝试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展开合作，以及在广泛的地区和全球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但一时难以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基础。旧有基础松动，新的基础待建，给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最后，两国决策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大。从外部环境看，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所谓“第三方因素”的干扰甚至绑架。近些年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苏丹、伊朗、缅甸、乌克兰、俄罗斯等。中美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引发彼此深度猜疑，而与它们之间的矛盾或过节也往往最终演化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摩擦。这是中美关系超越双

边而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新特征所决定的，在以往两国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换言之，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有时不完全取决于中美自身。从内部环境看，高层决策往往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网络媒体、民意舆论。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背景下，一向支持中美关系的工商界对华态度也有明显变化，经常在对华施压上叫得最凶。中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对决策的掣肘也成为显而易见的另类新常态。

上述四大变化加在一起，表明中美关系与过去30多年已大不相同，曾经成功指引或规范中美关系发展的既有框架[注]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迎接这一新变局？两国战略界和官方都在思考和探索。其中，美国战略思想界提出了种种构想，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大体有三类。

一类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等为代表，主张对华强硬。前者以其“进攻性现实主义”一贯的简单思维，认定中国难以和平崛起[注]，主张美国应联合盟友提早对华进行战略围堵。[注]后者主张美国奉行一种从未尝试过的“没有遏制的平衡”，包括“剥夺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机会、使中国的邻国融入反对北京的一个统一联盟体系之中、制定反对中国的集体防务战略，以及发动意识形态上的攻势，旨在剥夺中国国家及其政权的合法地位”。[注]

一类以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为代表，主张中美加强危机管控，彼此进行“战略保证”，确保两国关系长期战略稳定。[注]

一类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主张顺应时势，以大胸襟和大手笔展开中美合作，共创未来。前者主张中美双方“共同进化”，进

而共建"太平洋共同体"；[注]后者继提出"中美共治"（G2）论后，近期又倡导中美两国正式签署"太平洋宪章"，以此为基础带动他国共建世界新秩序。[注]

以上三类声音在美国各有市场，迄今仍在争论中。相较而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多是上述主张的中和，体现为遏制、规制、接触、防范、竞争、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有机统一，更像是应急性、反应性的政策拼盘，而尚未形成一套有别以往的新的对华战略框架。个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疲于应对经济复苏、政治内斗和国际危机，无暇思考长远对华战略；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囿于霸权逻辑，无法摆脱遏制、接触等惯性思维窠臼，因此也就难以提出符合新时代条件和中美关系新特点的新的对华战略思想。

相较而言，中国战略界、学术界对未来中美关系虽也提出过引人注目的新思考，如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的"中美利益和利害共同体论"、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的"中美两超论"、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西进论"等等，但总体看，均尚未形成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较成体系的新论述。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中美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倡议[注]，令人眼前一亮。这一思想随后在一系列场合被反复提及，最终形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轮廓。关于其从提出到逐渐丰富的过程，已有学者做过细致研究[注]，在此不拟赘述。

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认识，大体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习近平副主席提出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美方总体反应冷淡或不积极，尽管其间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主题即采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

仍未能充分调动起美方的热情。唯一例外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该概念提出后一个月即做出了积极响应[注]，但并未直接提及该概念。

第二阶段，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到2013年底，美方开始全面重视并态度积极。一方面是因为十八大报告正式采用了这一提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意识到这可能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谋划。这一年，先有即将卸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3月在美国亚洲协会演讲中全面阐述美方态度，并首次公开使用“中美新型关系”提法[注]，再有6月习奥“庄园会晤”就此达成初步共识，最后是11月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乔治敦大学首次阐释其亚洲政策时，明确表示要寻求践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

第三阶段，从2013年12月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到2014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美方态度趋于消极。这既因为美方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强力反弹，也因为中美围绕美表示将助日协防钓鱼岛问题上的紧张对立。但这一阶段，美国智库、学界反而掀起了单独或者与中方联合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高潮。[注]

第四阶段，从2014年11月北京“习奥会”拉开帷幕，美方态度转趋积极、理性、务实。经过过去两年多的观察、研究、磨合，中美双方终于在新的起点上重新思考如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共同为此做出努力”。[注]至此，中美高层就新时期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再次“对表”，为下阶段务实推进指明了方向。

路在脚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2013年6月“庄园会晤”到2014年11月中南海“瀛台会晤”，在中美关系复杂变异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最终就在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方面达成重要共识。[注]这一成果着实来之不易。与此同时，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多尼隆、哈德利等多位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内的美国战略界人士，也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更加认同，给予很高评价并寄予期望。[注]接下来，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往前走。”[注]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如何继续往前走呢?

第一，它需要两国领导人始终高瞻远瞩，持之以恒，加强引领。回顾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所走过的路，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握大势和大局，控制枝节和末流。迄今为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其说是一张现成的路线图，不如说是一个目标、一种愿景，是用以规范两国关系新阶段发展方向的一种精神原则，是中国新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思考、新期许和新承诺。

对于中美两国目前存在的将其庸俗化、狭隘化的趋向，唯有通过高层的引领才能正本清源，保持航向。这就要求两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注]，“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保持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注]这考验两国高层能否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和风云变幻的环境下，保持战略定力，拥有宽广胸襟，加大战略投入，发挥引领作用。对于深受国内政治环境变动的奥巴马政府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第二，它需要两国战略界、理论界、学术界群策群力，加强合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这座大厦提供理论支撑，增添丰富内涵。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是一脉相承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能否走得通和平发展道路。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显然缺乏足够的解

析力，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尚在形塑过程中，这其实为从理论上探讨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中美兼具经济相互依赖、核与金融恐怖平衡、多元一体民族的相近性、无主权领土争端、都有大国抱负和“例外论”情结等特质，有数百年大国崛起的悲剧做教训，也有30多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做借鉴，更有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新时代条件做背景，如何从学理层面将其归纳提炼，转化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有赖于中美两国学界沉下心来精诚合作。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共同的事业需要共同的责任和担当。

第三，它需要两国具体的实践去检验和修正，从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良性循环。经过多轮互动和两度“习奥会”，中美在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不再拘泥于这一概念本身，甚至不太在意是否一定用这个提法，而更注重把握其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精神实质，都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合作去体现新型大国关系之新意所在。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两国国防部签署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等，就是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有益尝试。

展望未来，通过共建FTAAP（亚太自贸区）从而破解TPP与RCEP平行推进的难题，进而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注通过搭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从而打破亚太两套不同安全机制之间的障碍，进而构建中美安全共同体；注通过加强应对埃博拉病毒、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从而冲淡两国地缘战略博弈，进而构建中美责任共同体——都是大有可为的方面和方向。

第四，它需要两国更加主动地塑造内外环境，从而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扫清不必要的障碍。从内部看，中美两国在未来几年都面临

深化改革的重任，如何培育健康、健全的民族心态，善于相互学习与借鉴对方，而不是简单夸大威胁、有意渲染矛盾，从而使中美关系为各自的国内发展服务，造福两国人民，是必须尽快提上日程的大事。双方在旅游和商务签证问题上的合作，就是非常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举措。

从外部看，若干“第三方”因素将继续从不同角度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何摆脱冷战思维的干扰，用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建构“中美+X”的新型三边合作框架，是未来值得大力尝试的外交方向。

总之，历史的演进将中国新一轮改革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再次联系起来，较之过去30多年，新时期的改革任务更艰巨，难度也更大；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更复杂，也更脆弱。但未来似乎在召唤：中国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志在必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中美关系继续前景的唯一选择，舍此别无他途。也正因此，我们相信，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构建，将再次创造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新的辉煌！

---

1.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求是》2014年第1期。

2. 《本轮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载《经济参考报》，2014年9月23日；David Shambaugh,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 Oct. 1,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10/01/20%china20%crossroads.html （2014年10月20日）。另，《经济学人》2014年11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2014年中国峰会主题即是“中国，二次改革”。

3. 相关观点主要源于《人民日报》2014年8月5日、6日、7日连载的三论中国经济“新常态”文章《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另，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还可参阅《人民日报》经济周刊“新常态，平常心”之系列报道，分别是2014年8月4日《新常态，新在哪》、8月11日《新常态，辩证看》、8月18日《新常态，新应对》。

4. 郑言、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5. 郑必坚：《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载《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6. 牛军：《“联盟与战争”：冷战时期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88页。

7.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序，第VI页。

8. 这一判断见诸美国政府历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例如，即使在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依然强调：“我们寻求避免将中国与外部世界全部隔绝。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仅具有全球与地区意义，而且对中国重新走上经济改革与政治自由化道路十分关键。”（1990年）以后历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均重申这一观点，如：“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我们同中国的联系必须是持久的”（1991年）；“我们正在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广泛的接触，这种接触既包含我们的经济利益又包含我们的战略利益”（1995年）；“中国纳入国际法规和准则体系除了将对它与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产生影响之外，还将对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997年）；“让中国更充分地汇入全球贸易体系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1999年）。此外，《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反复强调，“一个对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承担责任的稳定、开放、繁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定、开放、繁荣、尊重国际准则、承担建设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的责任，显然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1999年）；“我们欢迎中国走向强盛、和平与繁荣”（2002年）。

9.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57页。

10. 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在1960年苏联占美国的财富达到大约50%以后，直至苏联解体，苏联财富达到极限时大致只是美国的一半”，参见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60页。

11. 美国“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影响的具体内容，可参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编：《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时事出版社，2012年。

12. 《华盛顿季刊》2013年冬季号刊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的一篇文章，题为《没有遏制的平衡：美国直面中国崛起的战略》。

13. 中美关系的既有框架大体包括三个联合公报及1998年、2009年、2001年中美之间签署的三个联合声明。

14. 米氏咄咄逼人地质问：“我们凭什么期望中国会与美国的战略选择不同？难道中国的领袖们比美国领袖更有原则？还是他们的道德更高尚？抑或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没那么严重？或根本对国家生存漫不经心？当然不！中国定会效仿美国，试图成为区域霸权

国。”John J. Mearsheimer, “Say Goodbye to Taiwan”,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

15. John J. Mearsheimer,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2014年11月17日。

16. 美国《华盛顿季刊》2013年冬季号刊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一篇文章，题为《没有遏制的平衡：美国直面中国崛起的战略》。

17.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8.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第515—518页。

19. 布热津斯基：《太平洋宪章——大棋局的嬗变》，http://www.guancha.cn/bu-re-jin-si-ji/20141113285884s.shtml，2014年11月15日。

20. 2012年2月24日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午餐演讲。February 14, 2012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and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Luncheon Benjamin Franklin Room, State Department.

21. 倪世雄：《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3）》，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11页。

22. 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2年3月7日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的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谈到要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被普遍视为是对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回应。参见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

23. Thomas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remarks delivered at Asia Society New York on March 11, 2013. http://asiasociety.org/new-york/complete-transcript-thomas-donilon-asia-society-new-york .

24. Susan E. Rice, “America’s Future in Asia”, Remark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 2013.

25. 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和平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美国进步中心等都开展了相关研究。

26. 《习近平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

27.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主要共识和成果》，新华社北京2014年11月12日电。

28. 如基辛格表示：“我相信中国和美国有机会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现代技术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我们共同面对诸多问题的客观要求。”参见《中美关系或迎来新的“分水岭”——专访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参考消息》，2014年11月10日。另见Thomas E. Donilon，“Keynote Address: Obama in China: Preserving the Rebalance”, 5 Nov.,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4/11/05-obama-in-china-preserving-rebalance （2014年11月12日）。

29. 《习近平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2日。

30.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0日。

31.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第517页。

32. 相关方面的最新成果，参见C.Fred Bergsten, Gary Clyde Hufbauer, Sean Miner, Bridging the Pacific: 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ctober 2014。

33. 相关方面的最新成果，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太平洋足够宽广——关于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的初步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

结语 世界新秩序：中美合作，天下太平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几乎同时，看似偶然或巧合，实则道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未来则取决于两国能否相向而行，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这不是所谓“两国集团”或“中美共治”，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上所具有的独特分量，以及在未来秩序建构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使得中美关系较之一般的大国关系重要性似更胜一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在国际政治上往往成为欧日盟国的代言人，尽管它们之间也有深层次的矛盾或冲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东方文明的代表，虽无法代言整个发展中国家，却在非西方世界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也是新兴力量崛起的标志和象征。可以说，中美稳定则世界稳定大半，中美不冲突不对抗，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

但现实则是，中美两国不仅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缺乏足够的共识，而且对于中美关系本身的发展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就世界秩序而言，基于各自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战略观，中美存在巨大的认知差距。比如，对于何谓“战后国际秩序”，美国人显然将其世界主导地位、全球同盟体系都算在内。虽然中国多次表示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同盟体系，但不挑战并不表明欣然接受或认同，只是一种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考量而采取的务实主义态度。对美国而言，中国强调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往往被简单等同于“纠缠于历史的记忆”“敲打日本”“逼美站队”，而几乎忘却了70多年前中美并肩作战、共创联合国等并不久远的事实。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冷酷的现实主义态度。

再比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这原本是中国崛起新阶段基于内外两个大局和新的发展观、周边观而创造性、建设性地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种尝试，旨在践行“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体现中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被一些美国学者视为中国在享用既有国际体系的好处的同时，静悄悄地打造属于自己的新体系，旨在兵不血刃地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谋求中国主导的全球战略布局。

由此容易得出结论，认为期待中美合作共建世界新秩序，恐失之于过于理想和浪漫。于是，很多人就此打住，要么得过且过，指望沿着中美关系的老路继续往前走，幻想奇迹发生；要么悲观绝望，认定中美无法和平共处，注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此主张未雨绸缪，准备一场迟早要来的战略大较量。

问题是，中美之间难道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吗？中美真的不能携手共塑新的世界秩序吗？40多年前，有谁想到，一个连美国国务卿都不知情的秘密行动，最终居然改变了全球战略格局？10年前，有谁能想到，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如此悬殊、政治制度如此不同的背景下，居然能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5年前，有谁能想到，中国会如此深度地介入中东事务，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动达成伊朗核协议？可见，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是多么重要！今天，到了重新激发中美两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了。原因无他，因为时不我待。

且看中东秩序，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内斗不已，混乱不堪；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同伊朗之间死结越来越紧，埋下定时炸弹；沙特处在历史转型时刻，未来方向不明，伊朗核协议使伊朗危局暂时解除，但究竟会因此而滋生更大的地区报负还是会走上变革发展的新路，还需要观察。但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力量不会坐等一切尘埃落定，反倒加大利用乱局，建国、立业、捞地盘，期望攻城

略地，“拯救伊斯兰”。有人讲，中东开始进入类似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此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中东大乱，天下岂有太平日子?

美国战略界有一种声音，认为中东乱就乱吧，关我何事？谁关心谁就去承担责任，反正不要指望美国再去打头阵。这种声音之所以听起来有些底气，是因为页岩油气的大发展以及传统能源的产能释放，使美国摆脱了石油依赖、实现了能源独立，中东之于美国的能源战略意义大为下降。而反过来，美国认为中国将成为中东能源的主要依赖者，于是将了中国一军：“该你上场了！”

但美国似乎忘了，中东之乱，根在何处？中东之乱，所指为何？“9·11”事件过了不到15年，美国就开始好了伤疤忘了痛。当年小布什意欲从根上拔掉恐怖主义的土壤，动作虽然粗暴，但想法没有错。如今美国想扔下烂摊子一走了之，则又矫枉过正，迟早还要吃亏。

因此，中东乱局需要国际合作和中美合作。伊朗核协议的签署，正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而中美能在该问题上坐到一起，正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体现。事实上，在中东，中美合作的空间还很大。只要抓大控小，与其他大国精诚合作，中美可以共同为重塑一个稳定的中东做贡献。

再看欧亚结合部。乌克兰之乱不仅扰乱了俄罗斯复兴之路，也延滞了欧洲复苏之路，使美欧俄三角关系更加复杂。更令人担忧的是，乌克兰处于欧亚结合部的关键地带，一旦乱下去注定不是小乱而是大乱。对此，美国有舆论认为，乌克兰危机不足忧，危机可令俄欧相互牵制，对美国未尝不是好事；更进一步，乌克兰之乱会令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和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反受其乱，对美国还有益。但美国真正的战略家们心里清楚，乌克兰危机如果就此失控，不仅使美俄矛盾短期难解，而且很可能拉大美欧裂痕，对于美国的霸权地位而

言，这二者绝不是好消息。正因此，奥巴马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上的作为遭到普遍非议。

中东之乱与乌克兰之乱越发凸显出亚太和平稳定之可贵。作为全球战略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亚太地区的独特分量在今天尤其重要。但在东海南海联动、东北亚与东南亚同热的局面下，亚太和平稳定局面还能持续吗?

美国认为，中国是本轮亚太之乱的始作俑者，因为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开始奋发有为；不再搁置争议，开始强势维权；不再强调斗而不破，而是渲染好勇斗狠。中国认为，美国是亚太新一轮动荡之源，因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有意利用并挑动矛盾，到处煽风点火，不时拉偏架，把易解的问题变成难解的问题，把可解的问题变成无解的问题。

可以预见，双方这样的相互指责还会持续下去，相应的配套动作还会不断上演。问题是，没有人会成为这场博弈的赢家。如果美国心无旁骛地聚焦亚太，与中国死磕到底，美国不一定会输。但结果是美国即使赢得亚太，也将丢掉世界，美国将从全球霸主沦为区域霸权。更重要的是，美国即使集全力于亚太，面临天然的亚太大国及作为主场的中国，美国真的会赢吗？进一步说，中国真的是美国未来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威胁或挑战吗？美国“亚太再平衡”平衡来平衡去，就是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没有平衡好。于是，奥巴马一边迎接安倍访美，一边又提前7个月邀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一面在南海问题上加大威慑，一面在经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深化中美合作。

可见，不论是否愿意，中美必须合作。目前看来，由于中美关系的转型同亚太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变迁几乎同步，所以未来的合作必须采取三步走的战略。

首先，中美关系本身必须稳定下来，构建符合新时期两国关系特点的新框架，因为既有的以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个《联合声明》为基础的战略框架不能完全指导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抛出一套成形的战略或框架去应对中美新变局，而中国则率先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并大体确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总原则。

遗憾的是，美国对此要么闪烁其词，要么虚与委蛇，采取“不排斥、不跟进、不上套、不含糊”等策略，不情愿与新型大国关系对接。个中原因，既与高高在上的霸权心态有关，又同狭隘的战略思维有关，当然，也与中方未能全面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关。

既如此，未来双方要做的，是把脚放到对方的鞋子里，换位思考，重新理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始意义。对中国而言，在提出概念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具体行动去践行该思想，通过实际的合作来显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打消美国以为这是一种战略欺骗的错误认知。同时，对于一些美方的疑虑，比如如何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等，要有更科学更规范化的界定，避免授人以柄。对美国而言，则是学会不要太功利和太现实，而能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理解新型大国关系的用心良苦，同时提出自己的建设性主张，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注入正能量。

事实上，如果撇开表面的纷争和矛盾去看中美关系，从两军关系的发展到人文交流的拓展，从气候变化协议到10年期签证，其实已经体现出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以往的某些新意。本着水涨船高、共同演进、合作共赢的思想，将两国高层的年度交往制度化、将危机管控机制实心化、将工作层面的各种机制常态化，中美走向新型大国关系完全具有现实可行性。

其次，中美应学会在亚太共处，并探索构建符合中美两国及其他各方利益的亚太新秩序。习近平主席2012年访美前夕说，太平洋足够

宽广，完全容得下中美，原意是指中美可以找到和平共处的方法，而美国方面则狭隘地理解成中国想要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如果总是褊狭地理解中方倡议，亚太的未来当然是死路一条。

但亚太是开放的，太平洋是浩瀚的，人心不会总是一成不变。目前，不少学者致力于思考构建“亚太共同体”（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太平洋共同体”（基辛格）、建议中美之间搞一个“太平洋宪章”（布热津斯基）就是想破解中美对立的瓶颈，找一条中美与其他各国和平共处的新路。我所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目前也正全力打造“跨太平洋安全架构”理念，同样也是在想办法，找出路。而在经济领域，中国方面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清晰的路线图，那就是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为前提，以建立中美自贸区为中期目标，进而最终建成超越所谓TPP和RCEP的亚太自贸区。

最后，中美必须始终肩负全球责任，引领全球共同塑造世界新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搭建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开了好头，表明世界主要国家愿意坐下来共同思考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则为世界各国共建面向未来的气候秩序带来了契机。从抗击“非典”到应对埃博拉病毒，世界各国空前意识到合作应对全球致命性疾病的重要性。而斯诺登事件和形形色色的网络安全事件，则倒逼各国必须尽快搭建国际网络安全秩序。其他诸如海空、极地、环境、能源等等，都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方可应对。

这些新秩序的构建是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较少意识形态羁绊和传统思维束缚，却需要大国主动引领。中美两国是当然的利益攸关方，责无旁贷。至于战后国际秩序之存留部分，诸如《联合国宪章》所规范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过去400年来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中美也必须模范遵守并与时俱进推动变革。如果在重大问题上形成中美合作态势，进而滚雪球式地采取“中美＋X”模式逐一合作下去，则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的构建并非天方夜谭。